

陶 瓷 之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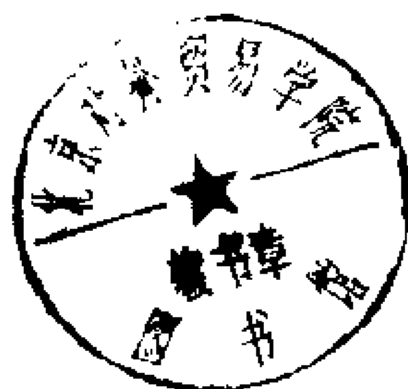
陶瓷之路

〔日〕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　高喜美译

蔡伯英　校

文物出版社出版



三上次男著
陶 磁 の 道
——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
岩 波 书 店
1972年4月20日第5刷发行

陶 瓷 之 路

〔日〕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 高喜美译
蔡伯英校订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5.125 插页：12
统一书号：11068·1270 定价：1.00元

目　次

一　遥远的埃及之地的中国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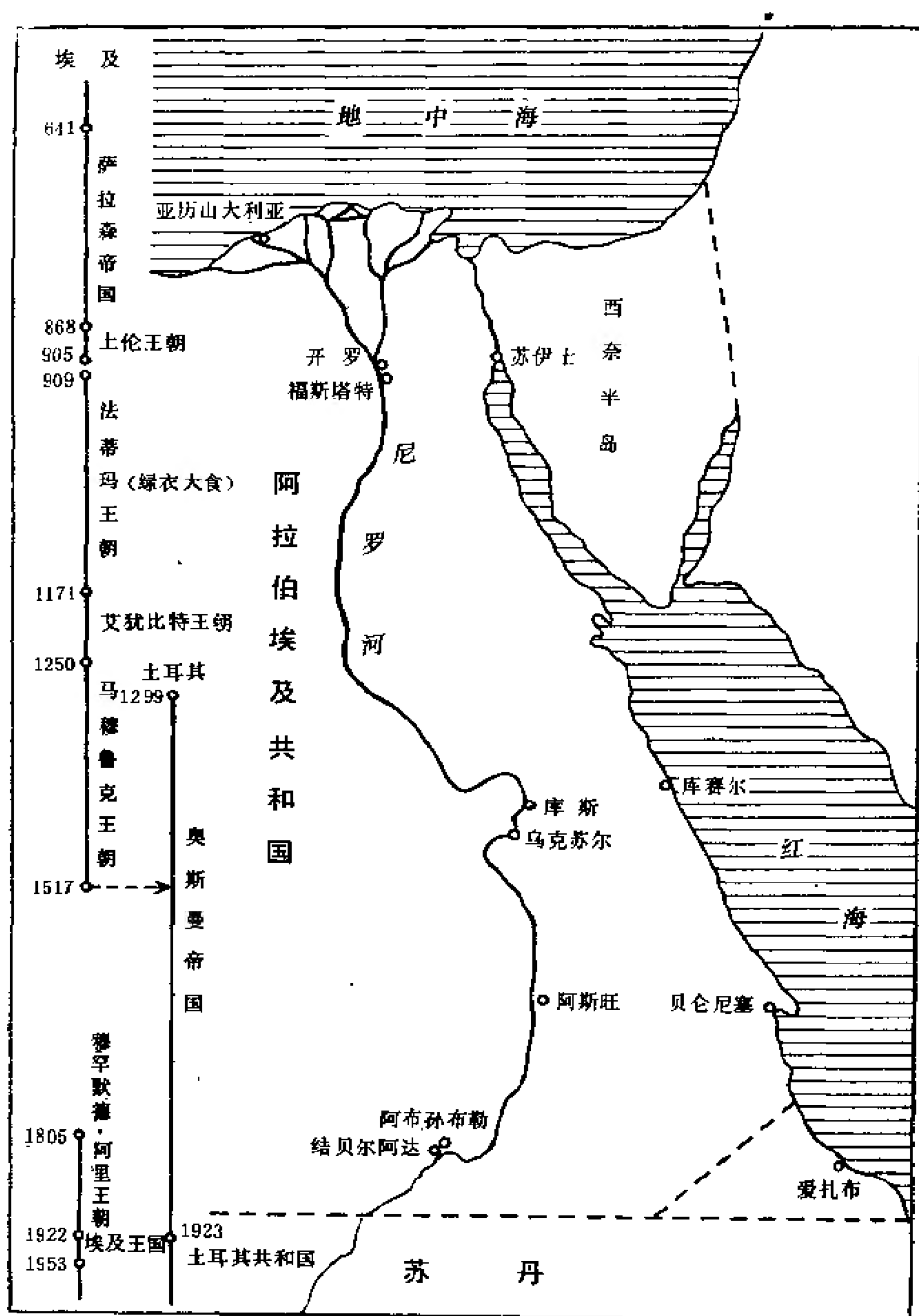
——风行在埃及的中国佳品

福斯塔特遗址

1966年2月初，冷风拂面，寒气袭人，在埃及还是冬季。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又来到一别两年的开罗南郊福斯塔特，站在这使人怀念的中世纪的城市遗址上。千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成排坚固的砖结构建筑，如今已变成了荒凉的废墟展现在眼前，一望无际。果真是一个雄伟的中世纪伊斯兰都市的遗址。

从1912年起，这里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发掘。挖出的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多数都围着坚固的砖墙。其内部构造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讲究的。一楼的中间有四角形或八角形带喷泉的小水池。水是由楼房上的水箱通过埋在砖墙中的陶制水管，流进水池。

以水池为中心的庭院，被小的房屋环绕着。庭院的一角，有通向二楼的楼梯。当夏季炎热的傍晚，可能一家人聚集在这庭院里，看着池中的喷泉谈笑风生地度过那美好时光的吧。在抹了厚厚一层灰泥的墙面上，可能曾有



埃 及
641
萨拉森帝国
868
上伦王朝
905
909
法蒂玛（绿衣大食）王朝
1171
艾犹比特王朝
1250
马穆鲁克王朝
土耳其
1299
奥斯曼帝国
1517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1805
1922
埃及王国
1953
1923
土耳其共和国
地中海
亚历山大利亚
开 罗
福斯塔特
苏伊士
西奈半岛
尼罗河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库 斯
乌克苏尔
库赛尔
红海
阿斯旺
贝仑尼塞
阿布孙布勒
结贝尔阿达
爱扎布
苏 丹

过各种装饰，如今有的地方残存的线刻花纹和壁画的痕迹仍隐约可见。这种房屋还带有地下室，其中一部分设有贮水槽。站在这里，将近千年以前的阿拉伯风光仿佛仍历历在目。

据记载，这里曾有过七层楼房。总之，这种建筑物无论大小，接连不断，说明遗迹的纵深是很长的。那里有官府，有商店、仓库，还有磨面厂和制玻璃、陶器的作坊。无怪埃及人自负地说这里是中东的“庞培”，确实是不无道理的。

再看楼群中间的道路也很有趣。这些道路弯弯曲曲，四通八达，有的甚至不知拐向何处。想当年道路两旁筑有高墙时，真可谓名副其实的“迷宫”了。据说，中世纪城市的道路，所以建成“迷宫”，不外乎是为了一旦敌人入侵时用来迷惑敌人，是根据军事需要设计的。只要身临其境以后，就会相信说得不错了。

沿路之上，相隔一定距离设有一水井。可能是附近的尼罗河的地下水通到这里，有的在4—5米以下还存着水。原来地上可能有井栏，如今早已消失。如果漆黑的夜晚，走到这里掉进去，准得丧命。据说这一带夜间野狗横行，狐狸也时常出没。白天有秃鹰不住地盘旋，可能是有可口的食物吧。在福斯塔特遗址，象这样的废墟竟连绵几公里，不禁使人赞叹千年之前的繁荣景象。当置身于这宏大的废墟之中时，你会感到：人类社会的演变原来如此吗？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历史？这不禁使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图版一：上）。

然而，当你站在高处的屋基址上向四处瞭望时，埃及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便会展现在你眼前，尼罗河谷的人民的不可估量的创造力，他们那种顽强的生存和物质的欲望，会使你深受感动。

遗址的东侧，耸立着一座白垩纪的石灰岩小山。将近五千

年前，为建造金字塔，曾在这里开采过二百三十万块大石材，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穆卡塔姆（Muqattam）之丘。在这座山丘上至今仍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以及驱使人民劳役的帝王的叱咤之声吧。

在北面的山丘上，耸立着使开罗自豪的伊斯兰时代的庄严的城堡，在那里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真寺庙堂和火箭式的尖塔并肩挺立，刺向天空。再往北面，可以看到重重的房脊和清真寺群。这就是一千几百年以来，百万以上贫富不等的人们，他们信奉着伊斯兰教，在这里活动、生活过的阿拉伯人的开罗市街。

向西望去，可以看到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在远处的沙漠上静静地卧着。

所有这一切，都是顽强的人类历史的缩影。的确象这样规模宏伟的历史遗址，在过去的任何时代、在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吧。

这个引起游客对历史的无限感慨的福斯塔特城市遗址，如今正是我们第二次福斯塔特调查团（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今后要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考古调查的现场。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调查从这中世纪遗址出土的非常多的中国陶瓷和当时埃及仿造的陶器。这些中国陶瓷是在相隔海陆约一万五千公里的遥远的东亚制造的，是靠巨大的船舶和骆驼的脊背，长途跋涉运到这里的。因此，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陶瓷贸易之路。

福斯塔特遗址的重要性

访问开罗的人，都要看看吉萨和萨卡拉的金字塔，去埃及

博物馆看看法老时代的王公贵族们的豪华文物；然而尽管他们知道开罗是现今伊斯兰世界一大中心地，而前来访问这个伊斯兰历史上不可少的福斯塔特城址的人（包括日本人）却异常地少。就日本人来说，这是因为在亚洲东端的日本，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这恐怕就是同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实践活动和文化贡献，从思维到感觉都有所感受的欧洲人的不同之点吧。的确，在欧洲的漫长的历史上，自七世纪以来在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中，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出现过的重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假如没有同伊斯兰世界的对比存在，欧洲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大中心就是埃及，而埃及的中心就是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就是现在的开罗的前身。

翻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可以看到阿拉伯军队于635年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于638年建立了库法城，征服了埃及以后又于642年建立了福斯塔特城。这是阿拉伯军队建设的第三个城市。因此，无论从伊斯兰历史上看或是作为本身成长的过程来看，它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城市。下文就简单涉猎一下这个城市的兴亡史吧。

福斯塔特的历史

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不仅是东地中海沿岸的重地，而且也是东北非的重地，同时又是通过红海连接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东西交通路线上的要冲。因此，它集中了这一地区的权力和财富，为历代所重视。

在拜占庭时代，埃及就是这个帝国的重要领土，他们在尼罗河畔建造了坚固的巴比伦城，牢牢地把埃及掌握在自己手

中。现今开罗南郊的科普特博物馆，就是建在过去的巴比伦城廓的遗址之上的。博物馆的一角，还保留着当时石头城墙的一部分。

七世纪初，当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半岛兴起时，他们就没有放过富饶的埃及。到了第二代哈里发的奥玛尔，便派阿姆鲁将军出征攻取埃及。那是641年的事。

642年占领了巴比伦城之后，阿姆鲁将军就在离旧城不远的地方营造了供奉阿拉神的礼拜堂（阿姆鲁的清真寺），并在旁边兴建了他的住宅。就这样把尼罗河的财富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

此后，阿姆鲁的清真寺曾改建了十次左右，每次改建都有所扩充，但最初只不过是四面围墙，芦苇屋顶的极其简陋的土庙而已。经过改建和扩充的清真寺，至今还留在开罗南郊。

由于这个清真寺和总督的住宅是统治埃及的中心，所以不久周围就陆续出现了官府衙门、住宅、市场，逐渐地成为城市。这就是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原意是“帐幕”，也就是军营的意思。有趣的是这个词语正好向我们说明了这个城市最初建立的情况。

福斯塔特城不断地向周围扩大。随着伊斯兰帝国在埃及的权威的巩固，这里成了南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经济中心，于是这里的街市也发展了，建筑也更加完善了。福斯塔特成了名副其实的尼罗河流域的中心城市。

以后街市扩大，产生了中心向北转移的倾向。于是在市街的北部出现了新的政治中心阿斯加尔城。后来，埃及从巴格达政权中独立出来，成立了土伦王朝（阿穆德伊本·土伦，868—905），又在现今开罗城堡东方以土伦清真寺为中心，建设了新

的政治中心地卡塔易。

后来，在突尼斯兴起的法蒂玛王朝占领了埃及，于是形成了以这里为中心的政治势力（969—1171），从而在卡塔易北面又建设了新的政治中心地加西拉（义为胜利）。这就是现今开罗名称的起源。

虽然政治中心地向北迁移，但福斯塔特城仍作为产业中心继续繁荣。街道纵横，四通八达，高楼大厦栉比鳞次地兴建起来。

可是福斯塔特城也遭到了不幸。和第二次十字军一起驻守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军队觊觎富饶的埃及，于1168年围攻了开罗。当时法蒂玛王朝宫廷内部矛盾重重，势力衰弱，不能击退十字军，他们生怕开罗南部的产业中心地福斯塔特落入敌手，便决定付之一炬。

据说，在福斯塔特的市街，布下了一万五千个油脂炸弹，把这座长期繁荣的城市烧成灰烬。大火持续了五十四天之久。走在遗址上，到处都可看到炸弹的碎片，这些都是烧制得很坚固的无釉陶瓷的石榴形炸弹。

由于采取了这种果断的焦土战术，才勉强防止了政治中心开罗的陷落，但是失掉了这重要的城市，法蒂玛王朝也完全丧失了力量，以至1171年沦于灭亡。

化为焦土的大片城市废墟，后来被沙漠刮来的风沙埋没了。在一米，两米，三米覆盖的沙土上，又加上北方新建街市所清除出来的废土，使得福斯塔特城长眠于地下，沉睡了千年之久。

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及其遗物

把福斯塔特遗址从沉睡中唤醒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埃及长期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再加上十八世纪以来进一步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纪，“阿拉伯人的埃及”这种民族意识逐渐高涨，他们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时代最古老的城市福斯塔特遗址，才得以重见天日。

于是从1912年开始了遗址的发掘调查，一直延续到1920年*。负责这项发掘工作的是埃及学者阿里·巴赫加特（Aly Bahgat），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他后来成了阿拉伯博物馆（今天的伊斯兰美术博物馆）的实际上的创始人。遗址的全貌虽然已基本查清，但发掘仍在继续进行。直到最近还有阿拉伯联合考古局和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团体在进一步探索这座城市的遗址。

我们在1964年和1966年两次把这个遗址作为工作现场，并不是为了发掘遗址本身，而是为了调查埋藏在地下的大量遗物，特别是其中的陶瓷器。

遗址中发现的陶瓷片数字庞大，被拿到外国去的也相当多。然而，留下的还很多很多，在遗址中央的两栋仓库中简直堆积如山。粗略估计有百万片，但实际推算的结果也有六、七十万片，这个数字比较准确。

陶瓷片的大部份是由七至八世纪起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遗物，但其中也有更晚期的东西。怎么十二世纪末被毁灭的福斯塔特城，居然会出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陶瓷片呢？人们会感到奇怪。其实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城市毁灭之后，又从北面的新

* Aly Bahgat Bey et Albert Gabriel: Fouilles d'al Foustat. Paris, 1921.

建街市运来了大量的废土，废土里带来新的陶瓷片。仓库里堆积的不光是陶片，还有数十年间的沙土灰尘。在这些陶瓷片中，最引起陶瓷研究者，尤其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专家们的注意的就是从远离埃及的福斯塔特有一万五千公里以上海路的亚洲的中国运来陶瓷这件事，而且其数量是非常地多。欧洲各国的学者们曾多次提出要求，到这里来进行陶瓷片的考察，但仓库的大门一直紧锁着，不准开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终于获得了调查的机会。由于小山富士夫氏活动的结果，终于把调查工作委托给日本。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日本陶瓷研究的实力。

我们的工作是从堆积如山的陶瓷片和尘土中，把中国瓷片一片不漏地拣出来，并把它分类、断代，查清数量，并进行仪器测定。继而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埃及本地仿造的中国陶瓷（图版一：下）。

本来只想调查中国陶瓷，但由于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所以对埃及独特的陶器和从中国以外地方进口的陶器，也都尽量进行了调查。为什么作出了这样的调查计划呢？可从下文逐渐明了。

1964年，当我和小山富士夫氏等一同着手这项工作时，深感要搞清楚这堆积如山的六、七十万件陶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第一次调查曾中途停下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经过这前后两次调查，总算大体上达到了目的，肩上担子减轻了一半。但是距离写出正式的报告，还有一半的路程呢。

把陶片按类别划分，当然还是埃及本地的仿制品最多，但埃及以外的陶片也很多。例如：有地中海周围的叙利亚、土耳

其、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北非的陶器，有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的陶器，还有遥远的东亚的泰国、越南和中国的陶器，甚至还有极少的日本的伊万里制品。简直成了世界陶瓷片展览会，或者说它是世界陶瓷研究的宝库也不过分。

中国陶瓷的发现及其性质

根据我们两次调查，福斯塔特遗址仓库里的陶片中，中国陶瓷片约有一万二千片之多。

一万二千片，说起来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堆积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的。假定全部陶片的数目为六十万片，那么每六十片中就有一片是中国陶瓷。除埃及的陶片外，中国陶片的数量，比其它地方陶片的数量要格外地多。下文还要谈到的中东和东非沿岸的许多伊斯兰时代的遗址里也同样发现了中国陶片，而福斯塔特遗址的中国陶瓷的出土数量，也是远远越过它们的。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的研究、而且对于了解中世纪埃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独一无二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从这个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片，种类相当丰富，而且质量很高。发现的中国陶瓷片从八至九世纪的唐代直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清代的都有，在这期间中国生产的有名的陶瓷器，差不多在这里都能找到。

埃及陶器和中国陶瓷

由于下文要常常谈到中国陶瓷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中国陶瓷发展的情况。

首先，想从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地在何处谈起。最古老的陶器原是产生在埃及。在那里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初，就已经

制出了铜绿色的、闪耀着青绿色光泽的碱性釉陶器。这是距今约五千年前的事。

那是带有埃及风格的神秘色调的陶器，是用硅石粉作坯胎的。这是古代埃及陶器的一个特征。在同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也产生了与埃及陶器相同的施釉陶器，但何者在先，相互影响关系如何，尚不清楚。

埃及到了新王国时代，即公元前二千年的中叶，出现了在青釉下用锰质的紫黑色描绘游鱼戏水和水莲的图案，这是埃及陶器最得意的时代。到了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无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能使用青、绿、黄等各种颜色的釉，画出了有趣的图案。总之，这种制陶方法继续了近三千年之久，直到埃及进入被罗马占领时代为止。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在东地中海沿岸地方，发现了和以往不同的制作陶器的方法。即用容易造型的陶土做坯胎，并用铅为助溶剂的釉（铅釉）装饰陶器，从而呈现出铜的绿色、铁的黄褐色、锰的紫色等鲜艳色彩。这是为罗马人所喜爱的华丽的陶器。

其后在中东地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系的碱釉陶器和东地中海沿岸地带产生的罗马系铅釉陶器，两者并行，一直到七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时代。到了伊斯兰时代，中东的陶器由于受到中国陶瓷的影响，有了迅速的发展。于是以伊斯兰陶器或波斯陶器之名，在西方世界占了中心地位，关于这一点另外再谈。

那么东方世界的陶瓷器的核心是哪些呢？那就是中国的陶瓷。

中国开始制作陶器，比埃及晚得多，是在公元前二千年

后半世纪的殷商时代。然而陶器的质地则和埃及的完全不同，是用铁作呈色剂的灰釉硬陶。表面呈淡雅的褐色或暗褐色，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色调。这种性质的陶器，后来一直继续制作，成为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陶瓷的主流①。

此外，在后汉时代的中期（公元二世纪左右）出现了与此完全无关的，以铜、铁为呈色剂的铅釉的绿、褐色陶器。这和上述的罗马领有的东地中海沿岸制作的绿、褐色陶器相同。中国之所以能够制作出这种陶器，由于当时以印度洋沿岸为中转站，西方的罗马地区和东方的中国之间有了通商关系，我认为中国的绿褐釉技术，可能是由罗马地区传来的。

以后中国的灰釉陶器，以华南为中心有了显著的发展。四世纪初在浙江出现了半瓷体的青瓷系陶器。这种技术被杭州湾南岸的越窑所继承，从隋（589—618）、唐（618—907）、五代（907—960）时期一直到十一世纪的北宋初期，都有大量的制作。这种橄榄色或青绿色的青瓷系陶瓷，就是向中东地方输出的越窑瓷。唐、五代、宋（960—1127）时期，福建地区也能制作同一系统的陶瓷了（图版二：1—4）。

唐代，华南制作青瓷系陶瓷，而华北则制作白釉器和黑釉器，同时也制作以绿釉，黄褐釉装饰器表的精美的三彩陶器。唐三彩就是汉代的绿釉、褐釉陶器技法的恢复和发展。唐三彩显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唐代风貌，具有华丽的色彩。白釉器和三彩陶器，是这个时代华北的代表性陶器，也被输出到海外。此外，在淡褐色胎地上用绿釉绘出花纹的长沙窑器也出现了。

中国从唐代后半期进入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时

① 译按：本文所称的中国陶器，我国考古学者称作硬陶或称原始瓷、原始青瓷。

期，经过十世纪前半叶的五代到了宋代（960—1279），社会安定下来，从而迎来了陶瓷器生产质量飞跃发展的新时期。于是烧制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最精美的青瓷器。

具体地说，到了这时，青瓷生产的中心已移至浙江省的龙泉县，其色彩清澄，有如秋季的天空和静静的蓝色的大海。龙泉窑青瓷闻名于世界。这种青瓷和福建、广东两省窑业的青瓷，曾大量出口运销国外。

江西省的景德镇也成为窑业的一大中心地。景德镇烧制的透明的青白瓷（影青）和白瓷，福建省水吉县地方烧制的黑釉瓷（天目），德化县烧制的白瓷，还有福建、广东两省诸窑烧制的青瓷、白瓷、青白瓷，均成为大量出口的贸易品。

宋代华南的青白瓷和白瓷是有很大特色的，它是以瓷石为原料的优质瓷器，使中国陶瓷出现了一大飞跃。从此以后，世界陶瓷界追赶中国的这种瓷器，生产仿制品，为进一步制造更好的瓷器而努力。

另一方面，华北以磁州地方为陶瓷中心，在那里大量生产白釉、黑釉以及白釉黑彩的陶器（磁州窑系）。同时，在河北的定州烧制宫廷、显贵使用的高级白瓷（定窑）。此外，在陕西耀州、河南洛阳、开封附近，也都烧制出极其精美的各种青瓷（耀州窑、临汝窑、汝窑、北方官窑）之类的制品。

在继宋代之后的元代（1271—1368），除青瓷、青白瓷、白瓷、黑瓷之外，又生产了新样式的瓷器，即青花、五彩、釉里红等。青花瓷主要是在景德镇烧制的精美的白瓷上用钴釉绘出有趣的故事画、写实的花草画，或是复杂的卷草花纹。五彩则是把这些花样用钴釉和红、绿、黄等颜料一起描绘，使图案更加鲜艳（图版三：1—4）。

这种用钴和彩色颜料描绘的方法，可以说是受到伊斯兰陶器的影响。然而，中国优秀的陶瓷艺术，在吸收伊斯兰陶器艺术的基础上，制出了中国独特的陶瓷器。在移植伊斯兰的制陶艺术的同时，将它发展成为中国的新样式，譬如所谓法花就是一例，是用珐琅釉彩装饰的陶瓷制品。

十四世纪中叶，明王朝（1368—1644）建立后，陶瓷生产依旧是中国主要产业之一，不同种类的陶瓷器仍在继续制造。只是十五世纪后，长期居于华南陶瓷首位的青瓷开始衰落，青花瓷器取而代之，成为中国陶瓷的代表。与此同时，五彩瓷也发展起来，制出更为华丽的品种，到了这个时代的后期，金彩开始盛行（五彩描金）。这时进入了文化灿烂的时代，陶瓷也进入了技艺娴熟的时代。

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清代（1616—1912），这种状况没有什么变化，中国陶瓷一方面是更加精巧，另一方面则是更加华丽。在白瓷的表面上用多种色彩绘出精细的花鸟画（斗彩），是从这个时代初期开始的。综上所述，从许多陶窑长年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陶瓷器，既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也向海外输出，其出口范围远至非洲大陆，正象下面所叙述的那样。

福斯塔特的中国陶瓷

上述中国的陶瓷器中在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首先是唐代的唐三彩、邢州白瓷、越窑瓷、黄褐釉瓷器、长沙窑瓷器等，其中越窑瓷数量最多。

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宋代，是中国生产高质量陶瓷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的瓷器有著名的龙泉窑青瓷和福建、广东诸窑烧制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德化窑和其它南方诸窑的白

瓷，还有北方的定窑系白瓷等。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元代陶瓷，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外，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青花瓷的数量也不少。此外，还有被认为是广东烧制的褐釉陶瓷。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的明代的陶瓷种类和元代大致相同，但由于五彩瓷的出现而增添了光彩。

照这样列举下去，中国的华中、华南的重要窑制品，可以说几乎都包罗在内了。只是华北的制品较少，这可能是由于输出港口远的缘故吧。据推测是蒙古东部辽的首都制作的、富有特征的白瓷（所谓辽白瓷），在这里虽仅发现了几片，却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这些中国陶瓷的质量几乎都非常优良。如果逐类一一谈起会很烦琐，在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自唐末至五代大量生产出口的越窑瓷、黄褐釉瓷器等，碗的里面饰以刻划花纹，即葵花瓣纹，有时还有很少的镂空制品，是挂有柔和雅致的青绿色釉的精品。

尽管这样说明可能也难以了解制品的精良，所以我就把它和同一时代销往日本的陶瓷作一番比较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人们互相往来，因此越窑瓷和黄褐釉瓷也输出到日本。现今北九州博多的平和台球场就是当日接待外宾的鸿胪馆所在地。那里曾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越窑瓷片，大概这是专供外宾使用而珍藏的食具吧。但是，在平和台发现的越窑瓷或黄褐釉瓷，几乎都是没有任何花纹的相当粗糙的瓷器，和遥远的福斯塔特出土的瓷器相比差别很大。可以由此感受到，两国之间的富足与否与进口规模大小的不同。

越窑瓷器作为重要的观赏陶器之一被大量带到日本，为收藏家所珍藏，但这些珍藏能比得上在福斯塔特大量发现的优质

越窑瓷的却非常少。由此看来，九至十世纪的往昔，出口到福斯塔特的陶瓷商品，的确是经过精选的上品。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令人惊讶。

那么，凡是中东各地的中世纪城市遗址出土的越窑瓷，也都是这样的上品吗？这也不然。位于伊朗内陆曾经是东西交通要地的中世纪城市遗址内沙布尔，或是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港门遗址，也都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越窑瓷的瓷片，而这些瓷片的质量大体上都和日本博多的平和台球场附近出土的相同，都是普及品。

前面我用了很长篇幅以最早的越窑瓷器为例作了说明，因为它完全可以用来对照福斯塔特出土的任何一种中国陶瓷。我就不再赘述了。下面再附带说一说在这里出土的元代青花瓷。

在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描绘出花纹、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认为是蒙古帝国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波斯的伊斯兰陶器艺术影响下产生的。然而它的花纹并不程式化，而是笔触有力，表现了创始期的强大生命力。但初期的产品数量很少，为人所珍视。据小山富士夫氏说，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全世界只有二百件左右。

这种非常优秀的元代青花瓷片，从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了几百片。虽说这些只是碎片，但对于研究元代的青花瓷却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总之，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非常贵重的元代青花瓷，在相隔如此遥远的福斯塔特，竟有这么多的碎片出土，可以想见当时的开罗市民是多么富有，多么好奇，多么喜爱中国的物品，同时也说明中国陶瓷的使用价值是如何地高。所以出现这种差别，也许这些原因都有吧。

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当时埃及人喜爱中国陶瓷，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

在福斯塔特遗址的仓库里收藏有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大部分是埃及的制品，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是，在这些埃及制作的陶器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在某一点上仿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是在中国陶瓷输入的同一时代仿制出来的。

在进口三彩陶瓷的九至十世纪，在埃及就出现了仿制的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纹陶器，白瓷输入之后就仿制了白釉陶器。越窑瓷的埃及仿制品称为黄褐釉线刻陶器。而到了九至十二世纪，则是一面模仿中国陶瓷，同时又加上伊斯兰独特的装饰，显示出伊斯兰特色。十一世纪以后的青瓷、青白瓷，以至青花瓷的仿制品，则全是彻头彻尾的仿制品了。如果取来碎片一看，中国制作的是瓷器，而埃及制作的是陶器，非常明显。但是其中也有无论就造型和花纹，在照片上看很难分辨清楚的。就拿青瓷系和青花系来说，哪件是中国制品，哪件是埃及仿制品，单就照片看很难辨别（图版四：1—8）。

镰仓时代日本的濑户也仿制了中国青瓷，但无论色彩和造型都不如埃及的仿制品那样相象。

但就青花制品而言，自从十五世纪以来，在日本除了中国制品之外，也仿制成了伊斯兰式的精良制品。

为什么埃及需要这样大量的中国陶瓷，并且还仿制了那么多呢？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日本，明治、大正年代不用说，就连现在也还是舶来品以及舶来品的仿制品充斥市场的情况，就会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是，当时的埃及只是欣赏、追求商品本身，

并不是连制造国也无条件地崇拜。

红海岸之港——爱扎布遗址

象天方夜谭那样，话越来越多了，但我还想继续写一下当时中国陶瓷热的情况。

经过对福斯塔特遗址陶片的前后两次的调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及其仿制品，其数量之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惊叹之余，我们决定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把它们运到开罗的，是在哪里卸货的，以及运往福斯塔特和开罗又是经过怎样的路线。

这些商品要靠船运是十分明显的，至于卸货也不外乎红海沿岸。但至今红海沿岸，特别是接近埃及的北半部，与阿拉伯半岛、西奈半岛相似，尽是沙漠，条件非常困难。在这沿岸地带饮用水极少。从海岸到尼罗河畔的几条骆驼队商路上倒是有井，但水中含矿物质太多，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饮用的。

因此要运往埃及一侧散在一千多公里的红海沿岸之间的矿山或小渔港，除非由苏伊士用船运水或是蒸溜海水制成淡水，别无他法。总之，这里是除了沙漠、岩石和天空外别无他物的极艰苦的地方。

这里自然条件如此严酷，但从法老时代起，红海沿岸就有装卸来自阿拉伯及其他地方的香料、象牙以及金银的港口，罗马时代也留有古来有名的港口旧址，例如：从北数有苗斯、霍尔木斯、库塞尔、贝雷尼开等。三、四千年来，人们对占有珍贵物品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对财富的追求又是多么强烈，甚至在沙漠海岸上不顾困难强行开辟巨大港口并维持下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又是何等之大，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在伊斯兰时代，运到尼罗河畔的中国陶瓷到底在哪里卸货呢？我们查阅了古代的记录和调查报告，了解到苏丹国境红海沿岸在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有个爱扎布港，在爱扎布港的遗址中散布着中国陶瓷碎片。爱扎布离红海对岸的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的外港吉达是最近的。以上事实，是阅读了埃及地理调查所所长英国人琼·马来氏所写的数页短篇报告得知的。他曾在1912年到过该地* 。

十二世纪后半叶著名旅行家伊本·裘巴尔(Ibn Jubayr)和十四世纪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都去过这个地方，而且写下了关于爱扎布港的有趣见闻。另外，关于它的记载也散见于各种阿拉伯文献中。

依据这些记载，十世纪起从印度溯红海开往埃及的船只，都把目标指向爱扎布港。而由此出航的船只，半数开往远方印度西南海岸的马拉巴尔，半数开往印度西北岸的姑嘉拉特。也就是说，这个港口的使命不仅仅是作为开往附近的麦加的巡礼船的起点。根据也门的犹太商人的记录，由印度运进爱扎布的商品中，中国陶瓷占第一位，其他还有胡椒、草药、绢丝、珍珠、铁等。因此，在这里发现中国陶瓷是不足为怪的。

十一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是这里最繁荣的时期（1058—1368)。正象伊本·裘巴尔所记载的那样:“从印度和也门来的船只频繁出入，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我们以马来氏的报告为线索，决定沿着红海岸南下，奔赴爱扎布。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在第七天到达了爱扎布遗址。

---

* G·W·Murry: Ajdhab.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8, July-December, 1926.

** 家岛彦一:《关于印度洋通商史一项考察》，见《东方》第十卷1—2号。

没有象样的道路，简直象飘泊在沙漠之中。我们南下的最后两天的艰苦简直超过了想象。装载重荷的卡车只要略微开偏一些，就会陷入沙中。好不容易把卡车弄上来，可吉普又陷进去了。

如果车在这里抛锚，调查便万事休矣。不仅如此，如果不凑巧看不见任何其他车来，甚至生命都有危险。出发前我们听说有个德国调查队在西边的沙漠中抛锚，有五名队员丧生。所以我们便拚命地把车推出沙坑。就象在大海中遇难一样。

虽说是这样的艰苦，然而从苏伊士到爱扎布，有趣而新奇的事也不少。这里来不及一一述说。但只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在中途遇到的从罗马时代到十三、四世纪持续使用的海港姑塞尔遗址里，我们也采集到了宋、元时代中国的陶瓷片。也就是说，在埃及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又增加了一个。

总之，荒芜的爱扎布港位于面对珊瑚礁海岸的荒凉的沙漠和贫瘠的草原地带。当我们发现这个海港遗址时，是多么高兴啊！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调查。

爱扎布港遗址与中国陶瓷片

爱扎布港遗址，散在沿海岸约两公里的范围之内。海港街市的中心在海岸的低地上，背后有高六至七米的海岸小丘，那上面残存着大小建筑物的遗迹，小丘的东端有清真寺和似乎是灯塔的遗迹。

这个沙漠孤岛般的海港的居民，曾经相依为命地生活着，他们的生活凄凉，平时只能听到潮声和吹越红海上空的风吼。正因为这样，每当人们从海面上珊瑚礁的空隙中看到商船和开往麦加的朝圣船进港时，人们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既没有木材也没有好的石材，所以家家户户房屋的墙壁都是用切成块状的珊瑚砌成。不仅如此，居住区周围大约有三千左右的古墓的石棺，也都是用板状珊瑚作的。其中有的刻有开花的花纹，非常美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版五:1)。

港口的设施以及四个大贮水槽也全是用成块的珊瑚砌成的，把从远处用小船运来的水珍贵地存在这个珊瑚的贮水槽中。所见到的建筑材料都用的是珊瑚。这里真是名副其实的“珊瑚礁的遗址”。环境的艰苦可想而知。

在这里可以引为安慰的是：沿着白色的海滨生长着绿色的类似爬地松的灌木和在海岸和碧海中有无数红色长腿蟹和鱼在嬉戏。这些生物使人感到亲切。在遥远的西方巍峨耸立着阿尔巴山，这是航海者的好目标。

孤独、寂静、没有人烟的沙漠海岸，横卧在那里的废墟在向我们倾诉着人民艰苦奋斗历时四百年的苦难历史(图版五:1)。

这里到处都是中国的陶瓷片。为了下次有机会再来作发掘调查，我们绘制了详细的遗址地图，我们走遍了这个遗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脚底下都是中国的陶瓷片。有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黑褐釉瓷器等，虽是小碎片，但拾到了唐末、宋、元到明初的千余片。在朴素的黑褐釉瓷罐的碎片上，有的印着“□清香”的铭记。可能是在广州一带制作的瓷罐，里面装着香料运来的吧。遗址到处都散布着中国的陶瓷片，这样的地方是罕见的。因此，这里一定是越过万里波涛运来中国陶瓷的主要卸货场。

据记载，在这里上岸的货物，要越过西面的沙漠地带和石山，送到尼罗河畔的库斯和阿斯旺。库斯是位于因有王陵之谷而闻名的鲁姑苏尔北方的商业城市。从爱扎布到库斯，骆驼队

要走九至十天。

运到尼罗河畔的库斯和阿斯旺的商品，一部分顺流而下，运到尼罗河口，另一部分溯流而上，运到古代的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努比亚南部）。

就这样，中国陶瓷经历了海陆所有的危险和困难，再从福斯塔特——开罗运到亚历山大港。当我们经历了这数万公里的行程时，不能不为人类在各种意味上的人间欲念之强而惊叹（图版五：2—7）。

我一直在谈论着福斯塔特遗址和爱扎布遗址。其实在开罗许多地方都能碰到中国陶瓷片。帖尔·卡特·埃尔·玛拉山丘（Tel Qat el Mara）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人造小山在开罗街市的东端，距离有名的阿斯巴尔的清真寺不远。据说自马穆鲁克时代以来建设开罗街市所挖出的废土都堆积在这里。在这个土丘里，特别是在巴勃、达尔布、埃尔、马哈路库山丘（Bâb Darb el Mahruq）附近散布着大量优质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有大量的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青瓷；南宋、元、明时代的景德镇青白瓷；元、明、清时代的青花瓷；明清时代的五彩等。真象是被捣毁了的富豪住宅区的废土。如果这个山丘到处都是这样，那么运到开罗的中国陶瓷的数量就更是惊人了，可能当时在开罗的每个家庭都使用着优质的中国陶瓷器吧。

但是在这个小山丘出土的陶瓷片里唯独看不到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那种唐代越窑瓷和北宋时代的中国陶瓷。这可能是这个地区使用中国陶瓷器的年代要比福斯塔特遗址为晚的缘故吧。

此外，出土中国陶瓷片的地点还有在开罗街市的东端有坚固的法蒂玛时代的开罗城墙，在其南部的一角有十九世纪初

建造的壮丽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真寺。据在开罗的美国研究中心的斯堪隆氏（George T.Scanlon）说：在发掘阿里清真寺附近的城墙一带时，出土了宋代陶瓷的碎片。不过，其东侧的城墙北端的尽头紧接着前面说过的帖东·卡特·埃尔·玛拉山丘，所以斯堪隆氏采集的中国陶瓷片也许仍和这个山丘的遗物有关。

总之，走在开罗的任何地方都会闻到中国陶瓷的气味。因而就更增加了访问这个古都的兴趣。

二　东非和东亚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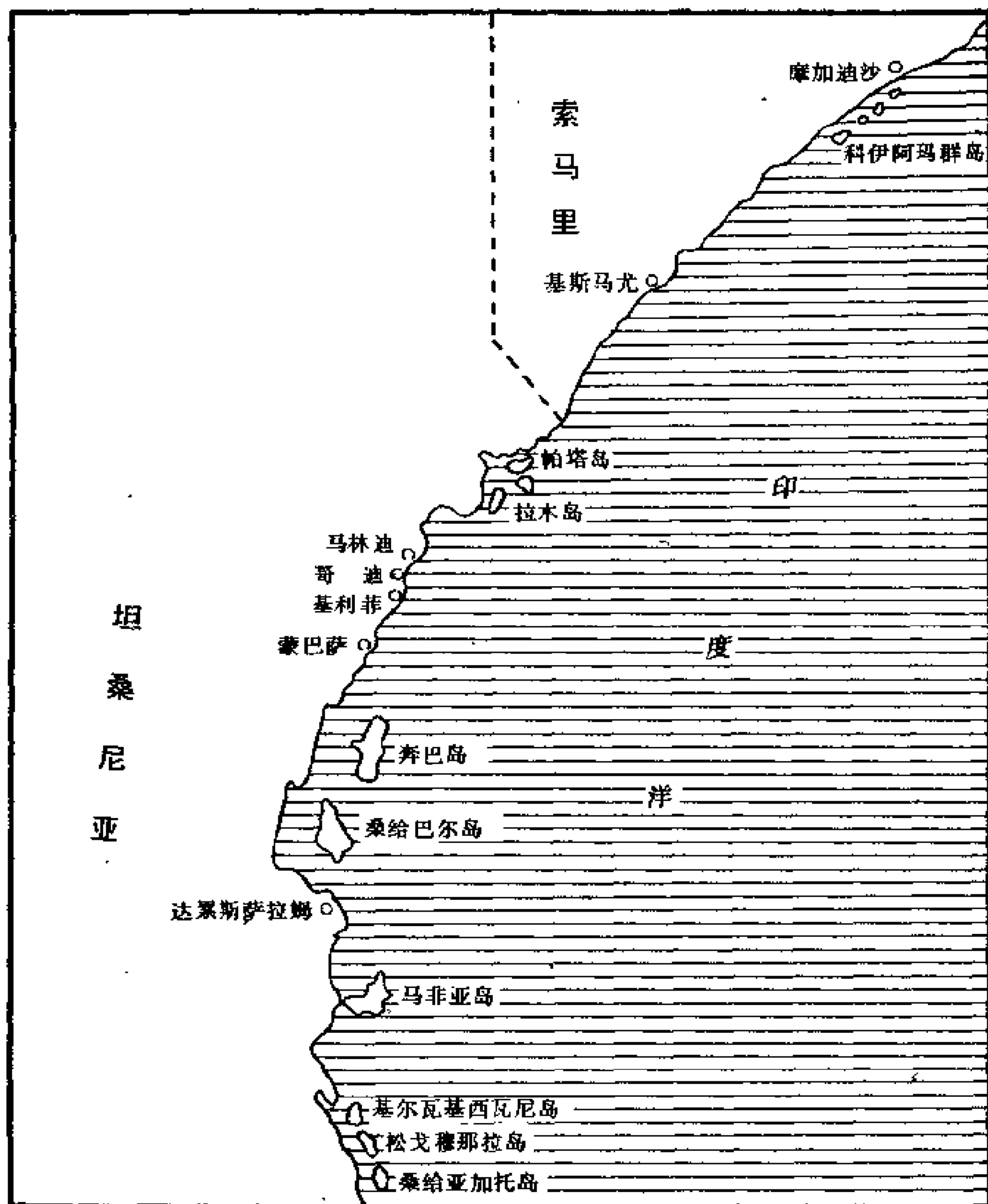
——中国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溯尼罗河而上

红海，恰和它的名字相反，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碧海。由于红海周围荒凉的红褐色沙漠的衬托，色调显得更深。对岸西奈半岛上的灰白的石山，僵硬地横卧在那里。

从苏伊士起沿着红海海岸南下约550公里，有个库赛尔镇。这里从法老时代末期，经罗马时代，直到现在的伊斯兰时代，是一个生命很长的港口城镇，也是红海海岸的埃及领土上唯一像样的城镇。在城镇的中央有个坚固的方形城堡，这是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时代的建筑，可是现在已经破旧不堪，在白日下暴露着凄凉的残骸。它似乎在夸示自己的悠久历史，又象是在怀念过去的荣华，不禁使人感到无限的凄凉。

和许多中东的城镇一样，这个城镇在历史的长河里也经历过多少次兴衰，也有过多少次改朝换代。现在的城镇则是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下建起的，中世纪以前的城镇，则在往北七公里的海岸上，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摩加迪沙
索
马
里
科伊阿玛群岛
基斯马尤
帕塔岛
印
拉木岛
马林迪
哥　迪
基利菲
坦
蒙巴萨
度
桑
尼
奔巴岛
洋
亚
桑给巴尔岛
达累斯萨拉姆
马菲亚岛
基尔瓦基西瓦尼岛
松戈穆那拉岛
桑给亚加托岛

东非各国

面临小海湾的旧库赛尔城的废墟里，现在只剩下一些被沙土覆盖的大大小小的土堆。在那里，蓝色粗糙的罗马时代的埃及陶片和细腻的伊斯兰陶片混杂在玻璃碴以及无数素烧水壶碎片之中，散在各处。从罗马时代起一直到伊斯兰时代的十四、十五世纪左右，这里一直是船只往来频繁的港口。

在去爱扎布遗址调查的途中，我们曾在这个遗址逗留，探索古迹，我们在散乱的陶瓷片中拾到了许多中国的陶瓷片。其中有唐末、宋初的越窑系青瓷、宋代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还有元末明初的青花瓷片。尤其是青白瓷碎片的那种淡雅的白里透青的颜色，充分显示出东洋风味的美。这是一个还没有报道过的在埃及新发现的中国陶瓷出土地。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于是，我们得知运往埃及的中国陶瓷，不只是在我们将要去的爱扎布卸货，也在其他港口卸货。

这说明了在埃及的中国陶瓷消费地的广泛性。实际上在尼罗河流域发现的中国中世纪陶瓷，不只是在福斯塔特和开罗，而且在其它各地也都有发现。对此，将在下面进一步探讨。

亚历山大港和阿布孙布勒附近

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大王建设了许多城镇，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可以说是其中的第一大城市。这里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和大图书馆，举世闻名。传说亚历山大的遗体也埋葬在这里，不过至今尚未发现。这里不仅在罗马时代曾经繁荣一时，现在仍是有着美丽的沙滩海岸和完备的海港的中东有数的城市之一。

为了探索这个罗马时代中东文化中心，最近波兰的调查队

选择了靠近亚历山大车站前的几处继续进行发掘，目前正在发掘埋在地下4—5米处的四世纪前后罗马时代的建筑遗址。1964年在罗马时代地层之上的伊斯兰时代地层发现了中国的龙泉窑青瓷残片。据队员中的一位可爱的姑娘德里萨·波尔堪萨（Teresa Borkansa）说，可能是十二至十四世纪，即南宋至元代的陶瓷。

果真是这样，那么亚历山大港的人们也和开罗的人们一样需求中国陶瓷。亚历山大是当时繁荣的海港；同时由于儿童十字军（1212）的悲惨结局得知，它又是奴隶贸易的中心地，因此有许多富商大贾在这里居住，这些中国陶瓷很可能就装饰在这些人的房屋之中。

在埃及首都开罗市内，还残留着几所被国家列为文物的土耳其占领时代建造的石砌富豪住宅。我们访问了其中之一的阿斯哈尔清真寺附近的塞海努家（Sehenu）。我们看到在满墙贴着土耳其式花纹的二楼主室的壁橱里陈列着几十件中国十七世纪的成套青花盘。虽然有些繁杂，但可以看出阿拉伯贵族的爱好。这和同世纪欧洲贵族、富豪的爱好是相同的。在十二至十三世纪亚历山大港富豪的住宅中，大概也是这样收藏着中国的青瓷和白瓷的吧。

亚历山大港和中世纪中国的青瓷，这种理所当然存在的关系现在得到了证实，也是一件惬人心意的快事。

溯尼罗河而上，离开三角洲就到了开罗。开罗和中国陶瓷的关系，前面业已说过，这里不再赘述。继续上行到达尼罗河的第一瀑布，风景美丽的阿斯旺。

阿斯旺最近以大坝闻名。这里在法老时代是建造方尖塔以及其他建筑用优质红色花岗岩的重要采石场，同时也是伊斯兰

时代初期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由突尼斯挺进埃及时迁移到开罗(阿尔加泰伊)以前的首都。因此，在阿斯旺山丘至今还遗留着法蒂玛王朝时代的大量馒头状坟头。前章所说的从爱扎布起越过东边沙漠的两条骆驼队路线的南面一条就是通往阿斯旺的。

如果是这样，可以推断在爱扎布上岸的中国陶瓷当然会运到阿斯旺的。事实正是如此。在这里也发现了南宋、元代（十二至十四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青瓷。

由此可见，中国陶瓷如其说是尼罗河下游地区的贵族、富豪们的喜爱物，不如说是尼罗河流域的各个城市贵族、富豪们普遍的喜爱物。

阿斯旺堪称是内地了，但更使人吃惊的是在更上游的努比亚也有中国陶瓷出土。出土地点是建设阿斯旺水坝时避免淹没而以巨资向冈上迁移的阿布孙布勒神殿南约五公里的结贝尔阿达（Jebel Adda）。

调查这个遗址的是年青的英国人马尔丁·民斯氏（Martin Minns）。据指挥他的斯儿扬伦博士和他本人说，他们在这里的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宋代青瓷。

就这样，中国的中世纪陶瓷的足迹，溯尼罗河而上，逐渐深入到内地，最后到达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高原

埃塞俄比亚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是以悠久历史而著称的高原古国。

这个国家并不是伊斯兰教国，而是信仰旧克布脱派基督教

的国家。据马修氏的报告*，在这个国家的东部，面临亚丁湾，通往索马里港口吉布提（Djiboutti）的门户：阿木德（Amud）、阿巴萨（Abasa）、高给萨（Gogesa）以及更在内陆的哈拉尔（Harar）和达加布尔（Dagahbur），还有埃以克（Eik）等地都发现了中国的宋、元、明时代的陶瓷器碎片。

这说明发现中国陶瓷的不只是埃及。

从维尔地的壮丽歌剧《爱伊达》的主题中也可看出古代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埃及有权势的法老们为了攫取这里的黄金、宝石、香料以及象牙等，经常向埃塞俄比亚派遣远征军。

直到中世纪的伊斯兰时代，两国也没中断过贸易关系，不过和外国接触的主要门户还是面临亚丁湾的索马里港口。

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和其东北的阿布扬港，是包括中国陶瓷在内的商品贸易的大市场。这里的商品是从对岸的泽拉（Zeila）城，中世纪的泽拉是在现在泽拉海中的萨丁岛（Saaddin I.）上卸货，然后从这里用骆驼运到海拔1,500米的高原上的阿木德等贸易中转地去。据马修氏的研究，十四至十五世纪，这些城市曾经是阿德尔王国（Adal）的领地，从这些高原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和阿拉伯半岛南岸的阿布扬城遗址的十三至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是完全一样的。写到这里，为追求财富而奔波的阿拉伯商人的骆驼队仿佛就在眼前，他们可能是把珍贵的中国陶瓷运到埃塞俄比亚，换回宝石、香料、象牙等，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

* Gervase Mathew: Chinese Porcelain in East Africa and on the Coast of South Arabia. Oriental Art New Series, Vol.11, No. 2, 1956.

从阿木德进行交易之后，中国陶瓷进一步运往内陆的哈拉尔和达加布尔等城市。那里发现的宋末、元、明初的中国陶瓷，确实是包含着许多艰辛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

虽然现在尚未发现，但中国陶瓷一定会到达更深的内陆的亚的斯亚贝巴地区的。

东非沿岸的港口城市

如果索马里港、萨丁岛是中国陶瓷运往埃塞俄比亚的卸货场，那么东非沿岸也一定还会有其它港埠或城镇作为卸货场。

于是，从亚丁湾的索马里出发，绕过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瓜达富伊角（The Horn of Africa），沿着面临印度洋的海岸，顺着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下，你就会发现在这一带海岸和岛屿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实在是多得惊人。其中有坦桑尼亚海中的桑给巴尔岛和巨大的马达加斯加岛。

遗址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只要看一看英国的福里曼·格林威尔氏（Freeman Grenville）的报告就可以基本了解了。报告* 说，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间，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发现的出土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四十六处。

太小的遗址名称略去不提，只将主要遗址地名列举如下：在索马里有前述靠亚丁湾的萨丁岛和倍尔倍拉（Berbera），靠近印度洋的有摩加迪沙（Mogadicio）、基斯马尤（Kismayu），再加上科伊阿玛群岛（Coiama Is.）；在肯尼亚有大恩福尔德港（Port Durnford）、帕塔岛（Pate I.）、曼达岛（Manda I.）、拉木岛（Lamu I.）、曼布鲁伊（Mambrui）、

---

* Gervase Mathew: ibid. P.53.

哥迪（Gedi）、马林迪（Malindi）、基利菲（Kilifi）、母那拉尼（Mnarani）、蒙巴萨（Monbasa）等。在坦桑尼亚有奔巴岛（Pemba I.）、马菲亚岛（Mafia I.）、基尔瓦·基西瓦尼岛（Kilwa Kisuwani I.）、松戈·穆那拉岛（Song Mnara I.）、桑给·亚·加托岛(Sanji Ya Kato I.),还有基尔瓦岛（Kilwa I.)等。此外,桑给巴尔的一些遗址也相当重要。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不仅有中国陶瓷，还发现有中国的铜钱。如：1898年在摩加迪沙有一个德国人发现了宋钱，1888年在桑给巴尔有一个英国人也拾到过宋钱*。由此可见，东非与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肯尼亚的哥迪及基利菲的阿拉伯人的废墟和清真寺等均已经过调查。我们且看一看调查的结果吧。

基尔瓦岛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塞拉姆南面240公里处，离大陆海岸并不太远。岛的西北角有个中世纪城市的废墟，说明这里曾是中世纪的贸易中心之一。

距离大陆不远的岛屿成为通商活动的中心，不光只是这一处。前面所举的遗址中有许多岛屿名，这些离大陆都很近。波斯湾岸有名的中世纪海港霍尔木兹就是这样的，在东亚有十九世纪以后的新加坡、香港。这不单是因为那里有良港，而且也是由于不受大陆上形势动荡的影响，能够保证安全地进行通商活动的缘故吧。

发掘这个基尔瓦岛的城市遗址的是英国东非考古学古代史

---

* F·Hirth: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itories. J.A.O.S., 1909. pp55—57.

研究所所长奇梯克氏（Nevill Chittick）。随着发掘和调查的深入，发现混在伊斯兰陶器中的中国陶瓷的数目也越来越多。

据访问过东非、看过这个遗址的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约翰·波普（Alexander John Pope）说，这里其中既有十世纪唐末宋初的越窑瓷，也有白瓷碗；既有数目居多的十四至十五世纪初的青瓷，也有十四世纪前、中期（元代）的凤凰卷草纹的青花瓷器。其中还有元代的胎地刻花白瓷，所谓枢府窑的制品等，真是丰富多彩。

此外，虽说不多，也发现了十四至十五世纪越南的黑褐釉陶器和同时期泰国的宋加禄窑的青瓷，最使我们吃惊的是其中杂有一片日本的古伊万里青花瓷碎片*。

不管怎么说，这个岛港从十世纪后半叶至十五—十六世纪按年代地运进并保存了各种中国陶瓷，然后又转销到背后的非洲大陆东海岸各地。为什么连东非的僻地都能运进这种珍贵的中国的优质陶瓷，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谈的。

在与岛隔海相望的非洲大陆，对中国陶瓷的喜爱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可从下面对哥迪地区阿拉伯人旧市街的调查中得到答案。

哥迪位于肯尼亚曼巴萨的北部113公里处，这个城镇有中世纪建筑的废墟。在这里进行发掘调查的是现任曼巴萨的佛尔特·基撒斯国立公园长（Fort Jesus National Park）的詹姆斯·卡尔克曼氏（James Kirkman）。他很早就在此地进行调查。据他的报告书**说：哥迪街市始建于十二世纪，到了十六

---

* A·J·Pope; Area Report on Africa, 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 1968.

** J·S·Kirkman; The Arab City of Gedi, Oxford, 1954.

世纪初南面的基尔瓦岛人移住过来，筑起了新城墙，同葡萄牙的贸易繁荣一时，但到了本世纪末，据说因受到邻近城市的进攻和卡拉族的袭击而灭亡。这一带城镇的兴亡变化比想象的要激烈得多，它们遭到了命运的无情捉弄。

据说，从这里的大清真寺和其他遗址中出土了中国南宋宁宗（1195—1225）年间的庆元通宝和理宗（1225—1265）年间的绍定通宝；和这些铜钱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青瓷——越州余姚窑瓷和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和广东石湾窑青瓷——以及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青花瓷器，还出土了一片釉里红瓷片。这些出土瓷片和距此数百公里远的基尔瓦岛城市遗址出土的瓷片是同类型的。

据目睹这批实物的波普氏说，其中最精美的是用釉里红彩绘花纹的大瓶和龙纹的青花瓷器——这可能是十四世纪的制品，还有青釉下浮雕花纹的磁州窑瓷罐等，其中意外的收获是釉下黑彩的泰国宋加禄窑的瓷片。

东非的中世纪社会和中国陶瓷

卡尔克曼氏还有另一个出土中国陶瓷遗址的调查报告*。那是在离蒙巴萨以北56公里的基利非的穆拉奈尼清真寺和墓葬区。据报告，在这里发现了明代的青花瓷片。

使人感兴趣的是当地人对中国陶瓷的用法。这里的阿拉伯人社会中，也同样是把这种珍奇而昂贵的中国陶瓷作为炫耀高雅和富有而装饰在屋里，或是在宴会上作为食具或酒器之用，这一点和其他城市完全相同。可是这里有不同于别处的一个用

---

* J·S·Kirkman: Mnarani of kilifi, The Mosque and Tombs. Ars Orientalis, Vol Ⅱ pp95—111.

法就是作为寺院内部和墓标的装饰（图版六）。

在哥迪和基利菲遗留下来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清真寺废墟里看到把进口的中国陶瓷碗和盘子，按一定的间隔镶嵌在墙壁上，作为墙面的装饰。

这种看起来奇特的墙面装饰，在这一带的中世纪大建筑里，是极为平常的。例如：坦桑尼亚的松戈·穆那拉岛的宫殿遗址的墙壁和圆形棚顶上，就是把青瓷碗的内侧朝外，按顺序排列镶嵌上去的，看上去很象多角形图案（图版七）。

在居阿尼岛的库阿（Kua.Juani I.）的中世纪清真寺里，也把中国陶瓷整齐美观地镶嵌在礼拜用的神龛龛壁上*。

把中国陶瓷镶嵌起来作为装饰的不只是宫殿和大寺院等大建筑。

从索马里经肯尼亚到坦桑尼亚，这一海岸地带的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中，有许多竖立起来作为墓标的巨大石柱，一般称为柱墓（Pillar Tomb）。这种柱子最矮的也有3米左右，有高达8、9米的，高高耸立颇为壮观。这种柱子有圆的、六角形的、四角形的，也有象希腊柱子那样带有沟槽的，真是各种各样。柱头也有馒头形或尖形等。由于附近往往有清真寺，所以柱墓常被误认为清真寺的尖塔，很受人们的喜爱。真所谓一个地方一个风俗，这个地区独特的墓葬形式，从时代来看并不算古老，最早的也不过是十五世纪，一般以十六世纪的为最多。

詹姆斯·卡尔克曼氏调查了二十几处残留下来的柱墓**，

---

* G·Mathew: ibid. P.52.

** J·S Kirkman: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 and Mambrui Oriental Art New Series, Vol Ⅳ, No.2, Summer 1958.

其中在十五世纪初中国明代海军曾经访问过的马林迪的柱墓建得非常壮观，高达9米，确是出类拔萃的。

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柱形坟墓，我后面要讲。这种柱墓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坟墓也都是用中国陶瓷的碗、盘子装饰的。并且，由于这里多是十五世纪以后的陶瓷，所以除了青瓷、青白瓷之外，还有大量白地描钴蓝色花纹的青花碗。

青花瓷器的花纹有花卉、水果、鸟、麒麟、游鱼、卷草花纹以至聚宝盆，真是花样繁多。因此，镶嵌着这些瓷器的柱子的装饰富于变化，实在令人赏心悦目。据说马林迪以北大约11公里处的曼布鲁伊（Manbrui）的用瓷碗装饰的柱墓最为壮观。

总之，这在我们的常识中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装饰方式。采用这种装饰，墙面形成奇妙的凹凸，而且陶瓷的质地又各有不同，这样就会给人一种不平衡的感觉。而同时在这种自然的不平衡中也更加突出了每一件艺术品的存在。这也许就是非洲土著民族固有的艺术感和奇妙的审美观吧。

本属于沉静淡雅的中国陶瓷，被直接摆出来装饰墙面，恐怕陶瓷也在苦笑吧！

在伊斯兰地区，根据可兰经的规定绝对禁止把人像用于建筑装饰；而另一方面却用琳琅满目的华丽的磁砖装饰墙面的办法作弥补。因此，自中世纪以来，无论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那里的花纹磁砖简直使你眼花缭乱。于是这一点也就成了促使中世纪伊斯兰陶器发达的一个间接的因素。

这种装饰墙面的作法也传到了东非的伊斯兰地区，但那里的窑业相当落后，因而得不到精美的装饰用磁砖。我想可能由于这种原因，再加上东非地区土著居民注重实物的审美观的影

响，才把中国瓷器用于墙面装饰的吧。

当然把中国瓷器的碗作为装饰品的也不仅限于东非。泰国西洛巴库伦大学（Silpakorn Univ.）的狄斯库鲁教授（M. C·Subhadradis Diskul）曾指出：就在遥远东方的泰国，十五世纪左右的阿尤迪亚时代的城门上也有镶嵌陶瓷器的装饰。他并说，这可能是伊斯兰文化对泰国的影响（第五次伊朗美术考古学国际会议发言）。使人更惊讶的是：更在东方的北婆罗州的沙捞越的达雅克人中也有这种习惯。

沙捞越的古晋，是一个相当清洁、幽静的城镇。那里的国立博物馆的庭院里有一个高达10米左右的巨大木柱。据说是大约一百年以前从达雅克人部落移来的墓标。从远处你会看到柱子的表面排列着疣状的凸起物。当你感到奇怪走近一看，原来是把直径10厘米左右的中国制的瓷碗扣着镶嵌在柱子上，作为墓标的装饰。在沙捞越有不少伊斯兰教徒。由此看来，这种装饰方法也许是未开化社会的质朴的审美观和伊斯兰教徒的装饰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吧（图版八）。

面向东非的中国陶瓷

我们再回到本题上来。在东非沿海地方发现中国陶瓷的中世纪城镇还有很多，而且陶瓷的数量也并不少，种类也是各式各样。按时代和种类统计起来看，从九至十世纪（唐末、五代、宋初）的浙江越窑瓷开始，直到十一至十五、十六世纪（宋、元、明代前半叶）的浙江龙泉窑青瓷和福建、广东方面的青瓷，十二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和以福建德化窑为首的福建、广东两省地方窑的白瓷，再加上十四至十五世纪（元到明初）的釉里红，以及十四世纪到十六、

十七世纪之间的华南各窑的青花和五彩等，真是丰富多彩。

更有趣的是：这些青花的盘子、碗或罐上面的花纹独特，其中很多无论在中国或在日本、欧美的收藏品中都是一直没见到过的。不过与波斯等中东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则有共同之处。于是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那就是这种特别花纹的青花是专门为向中东出口而制作的。

总之，从东非废墟中发现了从未介绍过的特殊花纹的青瓷器这件事，说明了中国陶瓷事业的深度和广度，使我们的兴趣倍增。

散布在埃及、东非沿岸遗址中的大量中国陶瓷之所以能够以新的面貌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陶瓷研究的新宝库，其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如果把东非各遗址中发现的数目巨大的中国陶瓷，按其时代整理的话，情况又是如何呢？关于这一点，马修氏是这样说的：东非沿岸各遗址发现的中国陶器，从十三至十九世纪之间多种多样，但仔细研究，从十五世纪后期陶瓷器的输出情况有所变化。十五世纪后期以前，即十五世纪的前半纪以青瓷为主，青花瓷较少；但到了后半纪，情况却颠倒过来，以青花瓷为主，而青瓷则退居其次。同时，前半纪优质品较多，粗制品较少。可是到了后半纪，廉价品则成了出口的重点。还有，前半纪的优质品主要在索马里北部发现，多为普及品或粗制品的后半纪陶瓷主要在索马里南部，即基斯马尤遗址以南地区发现。

以上是马修氏的看法*，这种观察是有趣的。因为这种按

---

* G·Mathew: ibid pp.53—54.

时代、按地区对进口的中国陶瓷的种类和质量的变化所进行的分析，会给我们进行种种有关历史方面的推测创造了条件。

从东非方面说，十五世纪以前优质瓷所以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发现得较多，这是因为在此以前北方较发达，富有的购买者都在北方。从出口的中国方面来讲，在这以前，粗制品根本不向市场投放，因此出口商品的质量也比较整齐，这种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还可以看到，以十五世纪后期为界，青花的普及品和粗制品在肯尼亚以南的各城镇特别多起来，这说明当时社会并不特别追求优质瓷，但对普及品却有大量的需求。

再从中国方面看，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陆续出现了能够烧制一般青花的地方窑，而这些窑的产品正是为了大量供应出口的需要。或者也许是贸易商人把粗制品廉价购入，再运到遥远的非洲高价出售，以牟求暴利。

上述现象，恐怕是由于非洲和中国两方面的情况互相影响的结果。而在其中适当掌握和利用这种关系的无疑就是贸易商人。因此，通过这种按时代和地区变化所作的分析，就可以了解贸易状况和贸易商人的特点及其变化。

因此，如果按每个地区对中国陶瓷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就可以不断发现只从文献上无法了解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情况、外贸商人和生产者的想法，以及购买者的喜好等情况，从而产生无限的兴趣。

航海到非洲

那么，为什么运来了如此多的中国陶瓷呢？现在该说明这个问题了。

一说东非沿海地带，一听“非洲”二字，就以为全是非洲的土著居民，那就错了。这个地区盛产人们所追求的黄金、宝石，象牙、香料等，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想利用这些物产牟取暴利的波斯人、犹太人移住到沿海的要地、良港，经营商业。

特别是到了伊斯兰时代，开始了萨拉森商人的贸易活动，于是东非沿岸的港口就被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船只来往也逐渐频繁起来。

进一步促使阿拉伯人进入这个地区的就是十三世纪蒙古军队征服西亚。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各城镇被蒙古军队赶出来的伊斯兰教徒,为了寻找新天地而进入东非沿岸。于是,阿拉伯商人便在这里收购黄金、铜、奴隶、象牙、毛皮、海龟以及犀角等，运往外国，牟取暴利。在十三世纪前半叶，这里的伊斯兰教徒到底拥有多大的实力，只要看看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遗留下来的1238年建造的雄伟的清真寺尖塔就明白了。

从十世纪至十三、十四世纪之间，被运往这个地区的中国陶瓷，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几经转手，终于来到遥远的东非之地的。

郑和的远征

到了十五世纪初期，发生了把中国陶瓷和东非直接连接起来的重大事件，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远征”，即赫赫有名的中国大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中国海军初次进入印度洋是在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的永乐三年（1405），其后的二十八年中前后出动了七次（有的学者如苏宗仁认为是八次）。它的统领是云南省籍的郑和，这个精明强干的将军原是太监出身，又是伊斯兰教徒，这一点值得我

们深思。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资格去麦加朝拜的“哈只”，由此推测，郑和也可能是在某种事物的吸引下而向往伊斯兰中心地的吧。

如此庞大的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大规模活动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是绝后的。

这一事件引起了各国东亚学家的兴趣。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有菲利普（G・Phillips）、洛克非勒（W・W・Rockhill）、伯希和（P・Pelliot）、戴文达（J・J・L・Duyvendak）、向达、山本达郎等许多学者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文章，但是一般人知道此事的并不多。现根据1931年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天妃宫发现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文试作说明。这和后面要说的中国商品流通也有很大关系。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从永乐三年秋季至五年九月（1405—1407）两年时间。他率领了包括62艘大舰船为主力的许多大小船只，经过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锡兰），绕过印度西海岸的柯钦，到达当时中东贸易的大中心集散地卡利库特（今科泽科德）。作为初次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大的。

郑和第二次出航是从永乐五年十一月至七年七月（1407—1409）。他采取和第一次相同的路线，到达了卡利库特，说明这条路线是连结东亚和南亚的重要海路。

郑和第三次出航是从永乐七年九月至九年六月（1409—1411），约两年。这次是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向锡兰挺进，在那里曾和锡兰军交战，俘虏了阿拉加克・可纳拉王（Alagak konara）。而后沿印度东海岸北上，到达孟加拉湾。最后在马六甲建造了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城塞根据地，然后返回中国。

这三次是一次接着一次，几乎不容喘息。但第四次则是过了两年以后，从永乐十一年十月至十三年七月（1413—1415）才又出现在印度洋上。这次是沿印度东海岸进入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这一次是大型舰队的规模巨大的活动。有人认为这次远征时，曾有一支队伍到过东非沿岸的海港，但尚无确凿的根据。

又隔两年，进行第五次远征，从永乐十五年秋至十七年七月（1417—1419），主力舰队与上次相同，从东南亚经过印度各港，进入了波斯湾。而另一支队则经过阿拉伯南岸，来到东非沿岸，经过摩加迪沙、布拉瓦，绕到马林迪。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次大航海。葡萄牙人拔斯克·达·加玛由伊斯兰教徒领航，横渡阿拉伯海，到达卡利库特（现今科泽科德），是1498年的事，而郑和的远征比他早80年。

就这样，中国和东非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

第六次出航是事隔两年之后，于永乐十九年春起锚，翌年（二十年）八月归国（1421—1422）。这次，主力舰队仍到达波斯湾，支队周游了东非各港。这样一来，使中国和东非的距离更加缩短了。

这一伟大的航海事业，随着永乐二十三年（1425）永乐帝的死亡而接近尾声。

宣宗的宣德六年正月至八年七月（1431—1433）进行的第七次印度洋、波斯湾巡航，是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一次总结性的航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郑和命令他的部下去天堂——麦加参加了朝拜。这一点，正揭示了这次远征和他的心情之间的葛藤。

郑和率领的舰队规模如何呢？这只要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

明白了。第一次出征时，舰队中长44丈，宽18丈的大型船只就有62只之多；第二次远征时，庞大的舰队拥有249艘船只。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远征时，人数达两万七千人之多，这是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庞大海军*。象这样庞大的舰队如果在海上停泊下来，无论谁都会为之胆寒的。

那么，十五世纪初，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永乐帝又为什么要计划这一希世的壮举呢？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追查被他赶下台的第二代皇帝惠帝（建文帝）逃往缅甸、南海方面的下落，但其真正目的却是为了向南方各国显示中国的威力。

当时在西亚号称成吉思汗子孙的帖木儿建立了大帝国。帖木儿梦想着大蒙古帝国的再建，并计划着对明朝的进攻。因此，初期郑和的远征计划可能有从背后牵制他们的意图。

同时，扩大中国和各国之间的通商贸易，为了获得珍贵的物资，进而掌握印度洋贸易的主动权，也是很明显的一个目的。这从当时舰队的靠岸地和目的地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商港来看就完全清楚了。当时郑和的舰队还带着大量的金银和铜钱，也证明这一点。

由上述情况也可以推测出，东非的摩加迪沙和马林迪是贸易的要冲。因此，十四世纪后半纪至十五世纪初的优质的中国陶瓷在这些地方被发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有幸随从郑和远征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等见闻录，还有费信也留下了《星槎胜览》的旅行记。《星槎胜览》里记载着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和卜剌哇（布拉瓦）的情景，其中也提到这些地方使用瓷器的事。通

---

* 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台北，1961年。

过这次远征，中国人知道了瓷器已经是重要商品了。总之，经过郑和率领海军远征东非，中国陶瓷在那里被普及了。

就这样，中国人开拓的贸易路线，一直延伸到东非。但由于明朝国内的问题，以政府力量为后盾的中国人对这个地区的进入，后来一下子衰减下来。不过以此为契机中国人向东南亚的移居逐年增加（华侨），而且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和印度、阿拉伯商人的努力，使中国商品的输出更为增加了。

在东非，中国陶瓷的数量，从十五世纪以来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我认为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

东非沿岸到目前为止，坦桑尼亚领土以南尚未发现中国陶瓷。但是，如果在沿海地区继续调查，有可能在更南面或更多地方发现中世纪的中国陶瓷吧。在马达加斯加岛也是同样的。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索马里领土内非洲东端的瓜达富伊角上的索科特拉岛。现在似乎已被人遗忘的索科特拉岛从前被称为地斯克雷达岛（Discorida I.），自罗马时代以来曾经是印度商人、希腊商人、阿拉伯商人之间进行大规模贸易的中转地。据桑田六郎氏说，那里曾经商人云集，他们带进了地中海地区、非洲和印度的货物，进行交易*。在中世纪，中国陶瓷作为重要的商品出现在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能够访问该地，我想一定会有大量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吧。

---

* 桑田六郎：《上代东西海上交通史话》，《怀德》23号，1952年。

三 运往阿拉伯半岛的东方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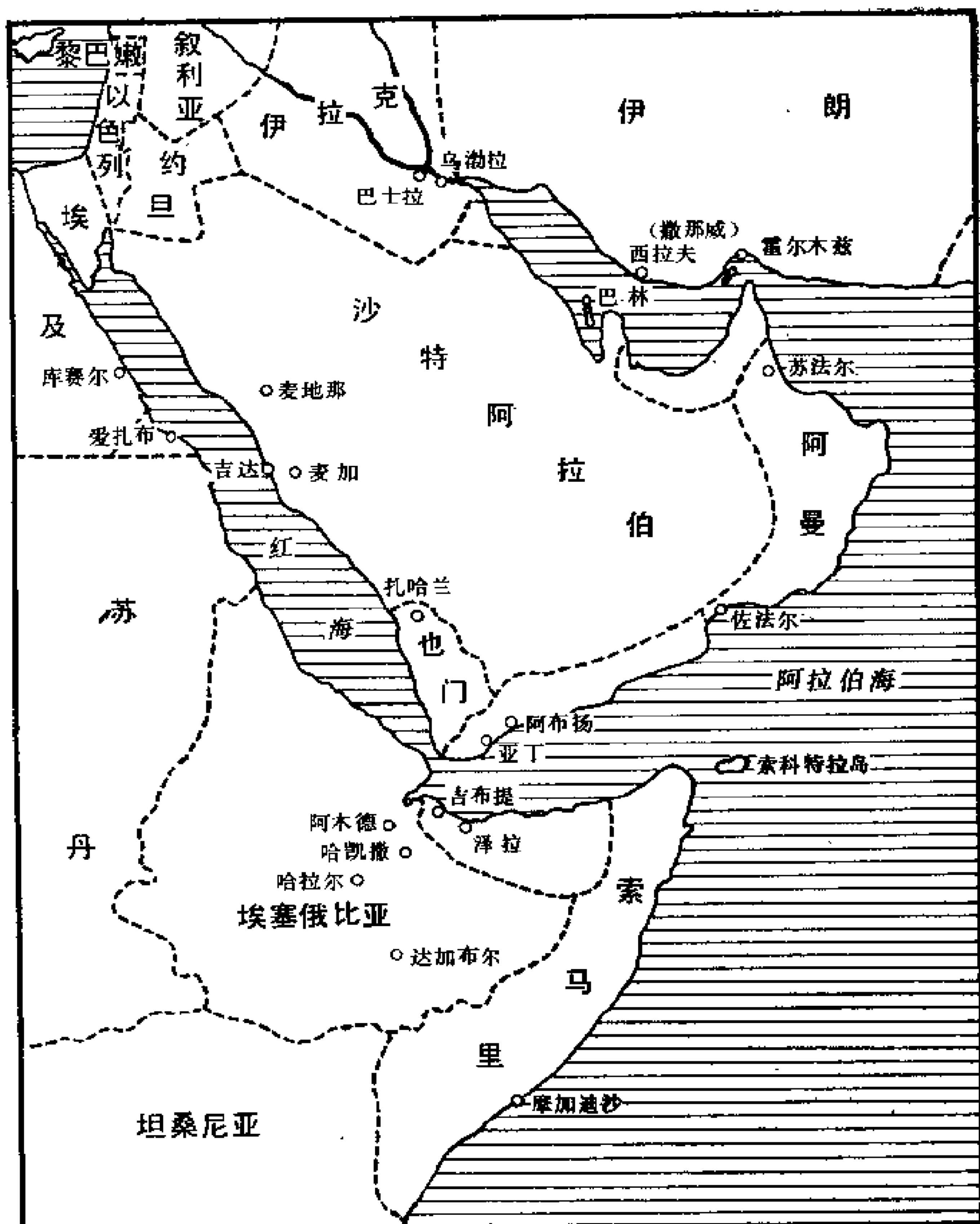
——中国陶瓷运往非洲和欧洲的转口站

中国陶瓷的发现

距离东非最近的是阿拉伯半岛。既然东非出土了中国陶瓷，那么阿拉伯半岛也不能不是这样。确实，阿拉伯半岛南岸和东非的各港口之间简直是近在咫尺。其西岸隔着狭窄的当然也是看不到对岸的红海，与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相望。其东岸接近印度，北岸隔波斯湾与波斯（伊朗的旧称）相对，是东西方贸易的要地。

果然中国陶瓷在这里也发现了。在南岸、东岸、北岸都有发现。但由于在阿拉伯半岛的调查还不够充分，还不能说出很多出土的地点。据马修氏的报告，南岸，在亚丁（Aden）和其附近的加乌德·阿姆·塞拉（Kaud am Saila）以及阿尔·哈比尔（Al Habil），还有位于亚丁东北五、六公里的海港阿布扬（Ab-yan）等废墟中，都有发现* 。从亚丁进入北

* G·Mathew:ibid.



黎巴嫩
叙利亚
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伊朗
乌姆拉
巴士拉
埃及
（撒那威）
西拉夫
霍尔木兹
巴林
沙特阿拉伯
库赛尔
麦地那
爱扎布
吉达
麦加
苏法尔
阿曼
红海
扎哈兰
也门
佐法尔
阿拉伯海
苏丹
阿布扬
亚丁
索科特拉岛
吉布提
阿木德
泽拉
哈凯撒
哈拉尔
埃塞俄比亚
达加布尔
索马里
摩加迪沙
坦桑尼亚

面的也门领土，在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境线附近的扎哈兰（ZalHan），美国密特罗波里坦博物馆的人们发现了龙泉窑青瓷和元代青花碎片(笔者亲见)。另外，在东南角的阿曼的苏哈尔（Sohar）、东北岸的石油岛巴林也都有发现，后者有铃木八司氏的报告。在鞏珍著《西洋番国志》一书中记载了苏哈尔港瓷器交易的情况。

先从南岸说起。

首先是亚丁港。亚丁是到目前为止去欧洲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前暂时停泊的著名港口。但是，如果提起离此不远的阿布扬，恐怕就没人知道了。如今阿布扬这个城镇已是一片废墟。但从这三公里方圆的城镇遗址来看，这里曾经是相当繁荣的。事实上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进出于这个城镇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汇集起来的商品渡过亚丁湾运往索马里的萨丁岛（Saaddin，中世纪的泽拉），再从萨丁岛销售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各个城镇。但在到了十五世纪末叶，阿布扬开始萧条，最后被它的商业竞争对手亚丁所取代。因此，埋在这个遗址里的中国陶瓷大都是十二至十五世纪的东西，这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这些虽然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但中世纪的各阿拉伯城镇，为了自身的命运也曾进行过反复的政治、经济斗争，经历了自己的兴衰。

除了阿布扬之外，从其他南部阿拉伯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多为十三至十五世纪的青瓷和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青花瓷器。

这些中国陶瓷是为供应当地使用或作为转口贸易的商品运来的，其中多数集中在亚丁港。十四世纪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在他的旅行记中提到了中

国陶瓷。他说："在亚丁，为控制价格而限制进口"*。从他的话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世纪的亚丁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推测到十四世纪时中国陶瓷的输入量之大。其后，十五世纪初，随郑和远征的费信在他所著的《星槎胜览》中也提到，在这里的贸易商品中，和金、银、色缎、檀香、胡椒等一起，还有青白瓷器。

阿拉伯半岛的地理条件

提起阿拉伯半岛，人们往往会想到象大海般一望无际的荒凉酷热的沙漠地带。事实上半岛的大部分确是如此，从空中看到的地面毫无绿色，只见连绵起伏的红褐沙漠和石山。除了荒凉和辽阔，它还给人们一种庄严之感。

沙漠地带的居民是剽悍的阿拉伯人，也被称为"贝都印"，是漂泊在沙漠中的塞姆系游牧民族。因此，阿拉伯半岛在世界文明史上给人们的印象是落后的。只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一点给这个半岛增添了一些光彩。即便如此，随着伊斯兰教国家的发展，伊斯兰教的中心也移到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等地，这是多数人对阿拉伯的看法。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宏观地看它是在印度大陆和非洲、地中海地区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半岛亚大陆，再进一步仔细考虑，它又处于东地中海岸的叙利亚、埃及和临近波斯湾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之间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因此，从印度起航开往红海的船只，从古代起就必定向着

---

* 冈村诚太郎：《回教海事史》104页。

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的方向扬帆，到达东南角之后，便沿着南岸开到亚丁，从亚丁进入红海。如果向南转舵，绕过被称为"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的瓜达富伊角（Cape Gardfui），就能到东非的港口。另一方面，罗马时代的红海海岸的港口，如库塞尔（Quseir）和苗斯·霍尔木兹（Myos Hormos）还有贝列尼开（Berenike）等港口开出的船只，也先在亚丁停泊，再从这里向东开往印度。这些情况在罗马时代有名的《厄利特利亚海导游记》和普里尼渥斯的《自然史》里写得很清楚。

此外，据家岛彦一氏的看法，到了伊斯兰时代开往波斯湾的船只，大部分也是先到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或佐法儿（Djohār），然后再折回东北，绕过阿拉伯海的东岸，经过马斯喀特·阿曼地带进入波斯湾*。

陆上贸易路的中心麦加

上述情况如果属实，那么阿拉伯半岛南岸的各港口就成了贸易商品的货栈和重要的贸易中转地了。在近代空中航线开辟之前，酷热的阿拉伯半岛西南岸的亚丁港，作为往返欧洲航线的中途停泊港，而受到人们的重视，恐怕是由来已久了。

因为阿拉伯半岛南岸有连接东西两个世界的重要贸易基地，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连接中东文化中心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及埃及等城市的陆上贸易通路。其中主要的贸易路线是在半岛西侧的沿红海海岸的路线。驮着贵重商品的许多骆驼商队穿过这些城镇，从绿洲走向绿洲。去叙利亚的则沿

* 家岛彦一：《关于南阿拉伯的东方贸易港》，《东方学会报》引辑，1965年。

此路线北上，奔向东地中海岸的巴勒斯坦。把商品运往埃及的，途中由西奈半岛向西拐，到达尼罗河畔。

去美索不达米亚的商队也走这条路线，从麦加向东北拐，穿过半岛的大沙漠，出现在波斯湾头。处于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地点，因此，当635年阿拉伯军队进入这里后，马上就建造了这座城镇。

这条路线的作用，不仅是连接阿拉伯半岛南岸、地中海岸和波斯湾岸，而且当从东地中海岸经幼发拉底河上游，通向美索不达米亚的北路，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难以通过时，经由麦加的南路便热闹起来，商队可以经过巴士拉到达巴格达。

被石山围绕着的麦加的绿洲，就是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贸易路线上的交通枢纽。麦加繁荣的经济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再加上成为伊斯兰圣地的克尔白神殿的存在，就使这里更繁荣了。

囤集在麦加的商品，进一步被运往麦加的外港吉达，从这里横渡红海运往爱扎布以及其他埃及的港口。爱扎布是中国陶瓷运往埃及的主要的卸货港口，前面已经说过。

可见，阿拉伯半岛不仅如古代传说那样，早在法老时代，南部阿拉伯谢拔女王统治的富饶国家，因为把那里的黄金、香料运往埃及而繁荣起来，而且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对东西方的贸易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从南阿拉伯沙漠正中发现的出乎意料的壮观的古代和中世纪遗址规模*，可以想见，这些城市当时都是相当富庶的。

---

* R·L·Bowen Jr·and F·P·Albright: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Baltimore, 1958.

因此，从阿拉伯南岸中世纪遗址出土中国陶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可能这些中国陶瓷曾经用来装饰每个商人、富豪的邸宅，或作为商货囤积起来。阿拉伯半岛的考古学的调查，由于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等方面的困难，尚未充分展开。不过今后能对西阿拉伯中心地的麦加、麦地那等地进行调查的话，一定会在陶瓷贸易方面取得有趣的结果。

陶瓷贸易的记录

前面提到的十四世纪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旅行纪中曾经讲过中国陶瓷。他说“（瓷器）一直传到了印度和叙利亚方面，在吉达（麦加的外港）这种陶瓷并不稀奇”。同时，十四世纪前半叶，元朝人汪大渊著有《岛夷志略》的地理书，也谈到在天堂即麦加进行交易的中国贸易品中有“青白花器”。同样，前述十五世纪初期随从郑和远征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中也明确记载着“青花白瓷器”，因此十四世纪初麦加人确实都知道中国陶瓷，而且喜爱中国陶瓷。这里所说的中国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花瓷，在当时被人们视作珍奇。

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和费信一起随郑和远征的马欢，写了一本随军记《瀛涯胜览》，记载明海军到达卡里库特时，碰巧遇到了来那里的麦加船只，便派遣了使者七人，携带礼物“麝香和瓷器”等送往麦加。一年后使者归来，买回了当地的奇货。这是了解麦加情况的饶有兴趣的史料。至于带去了什么样的中国瓷器，还有待于考古学的调查。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还提到，在阿拉伯的佐法儿（Zafar〔旧称〕)和刺撒（Al Ahsa）那里也把瓷器作为商品。佐法儿在

半岛的南岸，也就是现在的佐法儿（Djohār）。阿尔·阿哈撒则不太清楚，好象也是在南岸的一个地名。

关于南岸就叙述到这里，下面我们打算把话题转向东方的波斯湾沿岸。

波斯湾沿岸的巴林岛

由阿拉伯半岛的南岸进入波斯湾，必须经过面临阿拉伯海的阿曼。阿曼的东岸有苏哈尔（Sohar）港，在那里的旧市街的地下也发现了中国的青瓷和明代青花瓷，还发现了泰国的青瓷。发现者是一位名叫文德尔·菲利浦斯的现代杰出的探险家兼考古学家，但遗憾的是他对同时出土的伊斯兰陶器记述很详细，而对中国陶瓷则写得很简单*。既然了解到阿拉伯半岛东岸的阿曼也有中国陶瓷的出土，那么下面就只剩下波斯湾这一侧了。

波斯湾沿岸已知的中国陶瓷出土地是巴林岛。从空中鸟瞰，在那奇妙的清澈见底的波斯湾碧波中，飘浮着一个茶褐色的小岛，那就是巴林岛。巴林岛位于波斯湾大约正中偏南，是一个酋长国，是英国的保护国（译按：于1971年独立），现以盛产石油而闻名。从油田附近到港湾之间，已污染成黑色，真是个地道的石油之岛。

在这个岛上能够拾到中国陶瓷的地方是距离首都加拉特·巴林以南四百米远的清真寺废墟和附近的海滨。铃木八司氏从这里收集到青瓷片28片，青花瓷片58片**。据小山富士夫氏

---

* Wendell Phillips: Unknown Oman, New York, 1966, P.161.

** 《波斯湾沿岸遗址巡礼》，《朝日期刊》六卷31号，1964年8月2日号。

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收集的陶瓷片中也有从巴林岛采集来的*。

虽说石油和中世纪的中国陶瓷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这个盛产石油的岛国，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竟发现了中国陶瓷。从这里发现的青瓷多半是十四世纪后半叶至十五世纪初的明初龙泉窑青瓷，其中也有碗内面贴着饼干形菊花纹的特殊的元代青瓷碗碎片（参见下文“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青花瓷的花纹以卷草纹、莲花纹为主，多半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制品。

据铃木氏的报告，在对岸沙特阿拉伯的达兰城的美国人的收集品中，有从附近海岸的卡提夫发现的中国北宋钱币“咸平通宝”（998—1003）等。还有1940年至1941年空卧儿教授调查时，同样在卡提夫采集到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7）和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的铜钱，可能就是绍圣元宝和绍定元宝吧。

在孤立而荒凉的巴林岛和对岸的卡提夫地区能够发现中国的宋钱和元、明时代的陶瓷器，这说明了从十二、十三世纪到十五、十六世纪之间，这里曾经是波斯湾南岸的重要贸易中转地，同时还可以说明当初这里一定住着相当多的富豪。

在巴林岛还发现过远于伊斯兰时代以前，即公元前三千年的中叶到公元前二千年中叶繁荣的印度河文明时代的有特色的印章。发现这个印章的是1952年的丹麦调查队。这个印章不过3厘米见方，刻有图腾兽形和印度文字。从这个印章可以了解到印度河文明时代的印度人——确切地说是哈拉巴人——从公

* 《美国美术馆的东洋古陶瓷》，《陶说》57号，昭和三十二年。

元前三千年后半纪或公元前两千年前半纪曾在这里居住过。当时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人把木棉和宝石等通过海陆两方面运往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贸易，从中获利。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巴林岛和它的附近一带就是海上的重要中途停泊港和贸易基地了。

在波斯湾贸易兴盛的伊斯兰时代，这里作为贸易港而繁荣，是不足为怪的。

四 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

——中国陶瓷的世界性收藏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我喜爱的城市。在完成了对埃及的长期调查之后，来到这座名城的城郊，心情格外舒畅。当时正值三、四月间，郊外的草原一片嫩绿。大自然仿佛在向人们招手。使你真想扑进草原的怀抱，尽情地嬉戏。

一踏进这个城市，就使人感到这里到处飘荡着悠久历史的芳香。东罗马时代高高的水渠阻挡着你的去路。古代和中世纪厚厚的城墙，引人遐想。街市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从人群中投来亲切、和善的目光，即或混在人群中，也无一人对你歧视。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满面春风，微笑而过。莫非因为我是日本人吗？不过我听说过土耳其人对日本人颇有好感。

站在欧洲一侧的山丘上极目远望，浓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尽收眼底，对岸亚洲一侧的丘陵连绵起伏，一望无际。海潮激起层层浪花，涌向清澈的马尔马拉海。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相接处有

一个港汊，叫作金角湾（Golden Horn），它把丘陵地带一分两半。港湾出口有卡拉达桥，把被金角湾切断的两部分连接起来。这一带摊床麕集，有炒栗子、烤鱼的小铺和饭馆，食品的香味迎面飘来，别有一般情趣。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方面的船只都从这桥头启航。所以，这一带男女老少，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图版九：上）。

卡拉达桥北面的山丘地带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新街区，南面山丘地带则是洋溢着罗马时代以来古老历史的浓郁气息。至今山丘四周仍残留着古城的断壁。山丘上有罗马时代举行战车竞赛的赛马场旧址和贮水池，还有著名的圣索非亚教堂等。这个圣索非亚教堂后来被改建成清真寺，称为阿亚·索非亚；此外还有布尔清真寺等许多伊斯兰式建筑，宏伟的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宫殿遗址，也夹杂其间。残留下来的宫殿的一部分，现已成为追忆昔日王朝荣华富贵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和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一起，吸引着游人，共同缅怀那逝去的历史（图版九：下）。

中国陶瓷的宝库

我们所梦寐以求的中世纪中国陶瓷的大量收藏品，就布满在这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的几间陈列室里。陈列中世纪中国陶瓷的博物馆在世界上虽然为数不少，但如此地把稀世珍品不择地点、漫不经心地摆在一起的博物馆却是罕见的。

一进陈列室，马上就可以看到从十三世纪下半叶的南宋到元、明时期的各种色彩美丽的青瓷。同时还可以看到十四世纪的元和明初的色彩、花纹十分精美，令人赞叹的青花大盘和碗。完整的元代青花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据说总共不过二百件

左右，但光在这里就集中了八十余件。

元、明时期的白瓷也不少，这可能是为了照顾本地人的喜好，特地进口了没有花纹的素白瓷，然后在本地加工出售。在这里确实看到了镶着宝石或者用金银细致加工的白瓷碗。通过这些，可以想见绚丽多彩的东方工艺品充斥当时宫廷的盛况。

此外，还有落“大明正德年造”（1506 1521）款的黄釉器、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五彩、嘉靖年间（1522—1566）制作的华丽的五彩描金器皿，十七世纪清初的青花、五彩的收藏也相当丰富。

总之，我们在埃及福斯塔特所见到的元以后的中国陶瓷碎片同类的器物，却都完整地摆在这里。只是看不到在埃及和东非沿海看到的十至十二世纪之间的制品，比如说越窑瓷器和北宋青瓷以及青白瓷等。同时，这里的青瓷，也是从十三世纪末的龙泉青瓷开始，这正好说明了该王室收藏的历史年代。

想不到在这里还看到了江户时代从日本输出的一大批伊万里烧的精美彩绘大罐。由于以前在量和质上都远远不如中国陶瓷，所以没太注意，但仔细一看，却也是工艺精细出色的制品。其中多数是十八世纪被称为“沉香罐”类型的制品，但也可能有或早或晚一些时候的制品。反正都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到爪哇去的古伊万里瓷器，转来转去，最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吧。不管怎样，遇到了日本的东西，还是可喜的事情。

再环视整个陈列室，不管哪个方面都摆满了中国陶瓷。陈列柜里摆得满满的，墙上也镶嵌着，一直连到屋顶，简直目不暇接。

真是陶瓷——陶瓷——陶瓷。我一边看着墙上挂着的名品，一边耽心，如果遇到这里常见的地震却如何是好，真有些

胆寒。

我在想：怎么会收集到这么多的珍品呢？到底有多少件呢？这样的疑问在不断地涌上心头。（图版一〇）

托普·卡普·撒莱之由来

一般说来，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博物馆多数是利用从前的王宫。量和质都属于第一流的博物馆有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基博物馆、纽约的密特罗、波里坦的比古、佛阿。其中有两处都是用过去的王宫改建而成的。

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也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王宫。但是它的历史较为复杂。在这里根据波普氏的研究*，概要地讲一讲它的沿革变迁吧。当您知道它的历史以后，参观它的兴趣就会更浓。

在伊斯坦布尔最初建造宫殿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帝是穆罕默得二世（Mehemet Ⅱ 1451—1481）。他在1453年终于占领了久攻未克的伊斯坦布尔。消灭了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之后，他便选中了迪奥多斯皇帝（Theodosius，原拜占庭帝国皇帝）的集会广场——现在的巴亚几德广场附近，建造了王宫。这就是旧王宫（Eski Sarai）。

后来，穆罕默德二世可能又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不久之后他又另选择了一个能眺望马尔马拉海的风景绝佳的地方，建造了新王宫（Yeni Sarai，1467）。

---

* J·A·Pope: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 Kapu Sarayi Müzesi, Is-tanbul. Washington 1952.

这个新王宫的东门有炮兵守卫，塔上架设着大炮，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里称作托普·卡普（Top-Kapu 大炮门）了。其后约二百五十年左右，爱哈默德三世（Ahmed Ⅲ）于1709年在托普·卡普附近的滨海之地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离宫。这个离宫经过不断扩建，到了十八世纪中叶(1748)逐渐变成了被包围在美丽花园之中的大宫殿了。从此，便叫作托普·卡普·撒莱（托普·卡普宫殿）了。

这座建筑在海滨的托普·卡普宫殿，后来又经过改建，作为夏宫，而山丘上的新王宫则作为冬宫。1863年夏(8月11日)，宫禁起火，整个夏宫化为灰烬。从此托普·卡普·撒莱的名称便被山丘上的新王宫（Yeni Sarai）继承了。后来，1918年土耳其帝国灭亡，成立了共和国，山丘上的托普·卡普·撒莱（过去的新王宫）便作为博物馆，其名称一直保留至今。博物馆里陈列着宫廷收藏的用具和珍宝，其中陈列的那些奢华的宝石更是吸引着许多妇女的眼睛和心灵。

收藏品中的中国陶瓷

陶瓷器也是宫廷收藏品的一部分。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器的种类扩及世界各国，总数约有一万件。其中八千件是东亚的陶瓷。虽说是东亚，绝大部分还是中国陶瓷，其他有若干泰国和日本的。因为这些瓷器都器形完整，所以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陶瓷的大宝库。

下面根据波普氏的调查，把这里的中国陶瓷的种类和时代说明一下：

首先，从种类来说，青瓷最多，约有一千三百余件。十三世纪的宋代的制品极少，绝大部分是十四世纪初叶以后的元、

明时代的制品。不过其中的碟子、碗等的质量极优，也有大型梅瓶式的罐。这些在日本曾被称为“天龙寺手”或“七官手”（译按：天龙寺手，即明代龙泉青瓷，多为大盘、花瓶，釉色呈青灰或茶叶末色。七官手，即明中期至清初的龙泉青瓷，釉的玻璃化程度高，有开片，发出翠青色光泽），造型匀称，色彩绚丽，庄重大方。

青瓷之外的元末、明代的瓷器大约有二千六百件，剩下的四千件就是清代的制品了。

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之间的元末、明初的瓷器的主体是青瓷和青花瓷，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被称作世界珍品的八十余件元代青花瓷。元代的青花是在美丽的白瓷大盘和大碗上用奔放的笔调画出牵牛、菊、牡丹等花卉，或画出松、竹、芭蕉、瓜等植物以及山水、人物、池鱼等，再巧妙地配上一些麒麟、凤凰、龙等动物图形，既大方又端庄，确实有魅力。现在，象这样的大盘，只要一件就价值连城，如果光是把这批藏品中的全部元代青花算在一起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图版一〇）。

十四世纪后半叶至十五世纪前半叶之间的，明初青花优质瓷很多。此外，明代的白瓷、黄地红彩瓷或五彩、五彩描金等种类繁多，这里就不能一一尽述了。下面再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形式的瓷器，来结束对明代陶瓷的介绍吧。

那就是在中国进口的白瓷和青瓷，还有青花、五彩的碗、碟、杯子等上面，土耳其的工艺师们使用镶嵌方法镶入黄金和宝石，制成华丽的装饰纹样，把瓷器打扮得更加绚丽多姿。当你知道这些都是十六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全盛时期斯累曼大帝时代前后的东西时，你就会明白宫廷用具为什么会制作得如此奢华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的文化成熟时

期。

看到这种中国和土耳其的合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陶瓷的加工工艺。埃及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法蒂玛王朝时代，就在从中国输入的德化窑的白瓷上，用拉斯他彩，绘制伊斯兰式的花纹，制成了独具一格的合作陶瓷。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伊斯兰地区，有着使用进口素材发挥自己独特风格的要求。

虽然时代较晚，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人们也在从中国或日本进口的碗、杯上面用银和黄铜加以装饰以满足自己的爱好，这和伊斯兰人的作法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明代的陶瓷说得太多了。收藏品中还有清代的康熙（1662—1723）、雍正（1723—1736）、乾隆（1736—1795）等各代的优质的青花和五彩，但详细情况，只好割爱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使用清代的白瓷，用釉上彩添绘鲜艳的土耳其风格的花纹的合作陶瓷。

收藏的历史

关于托普·卡普·撒莱，还有一件使我们很感兴趣的就是，这样多的皇室收藏品是怎样得来的？这是想了解陶瓷贸易真实情况的人，都想一知究竟的事，但实际上却很难弄清楚。

幸而，关于这个宫殿的用品，从新宫殿修建前后就有了详细的藏品目录，所以还能了解一二。下面还是以波普氏的研究为中心略述大概。

在收藏目录上出现中国陶瓷，好象是从公元1495年第二号目录开始的，至于明确记载收藏中国陶瓷是从公元1507年第三号目录开始。这样，就可以认定，托普·卡普·撒莱收集中国

陶瓷开始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比起埃及、东非地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来，就相当晚了。这是事实。

这只不过是这个宫廷开始收集的年代，并不能说明拜占庭时代住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的商人们，在这以前就没收集过中国陶瓷。可惜的是在土耳其比这更早的遗址里，还不曾发现中国陶瓷。不过随着将来调查的进展，一定会带来各种新消息的。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关于中国陶瓷的记载，随着收藏目录编号的增大，收藏数字也在增加着。据公元1514年的目录记载，当土耳其军队战胜伊朗的大不里士的伊斯麦尔王时，中国陶瓷一下子增加了六十二件。也可能是战利品吧。

此外，十六世纪初，访问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赛义德·阿里·埃库巴尔（Sayyid Ali Ekbar）写过一本《中国的故事》（Khitai Nameh，1516），其中谈到明武宗正德皇帝(1506—1521)曾把用阿拉伯文字装饰的两件中国陶瓷赠送给赛理姆一世（1512—1520）。这两件器物也一定被纳入宫廷的收藏之中了吧。

还有，被称为大王的苏莱曼一世（1520—1566），据说他就餐时也使用中国瓷器，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宫廷里收藏的中国陶瓷数量确实是增加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1574年宫廷失火，膳房被烧，因而就餐用的中国陶瓷均被烧毁，但以后很快地补充上来。1681年的收藏目录上登记着数百件中国陶瓷。但是，达到上万件的还是从1762年至1792年之间的事，至于为什么仅仅三十年之间就猛增了那么多的收藏品，可惜已不得而知了。

十八世纪后半叶增加的收藏品中，有许多十四世纪至十五

世纪的中国陶瓷，但这决不是靠商业贸易和进贡等自然增加的。当时从属地的叙利亚、埃及向伊斯坦布尔频繁地运来珍贵的商品，因此，这些古代珍品也许就是从收藏很多优质中国瓷器的开罗运来的。

总之，在土耳其以宫廷为中心，收集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其中有的是买进的，有的是赠送的，有的是进贡的，有的是从其他所有者手中强制征集的，情况不一。由于这样，才逐渐集中了这么庞大的收集品。宫廷是这样，那么贵族、大臣、富人们也一定照这样收集了中国陶瓷吧。这些陶瓷肯定都是前来伊斯坦布尔的船只带来的。

收藏在托普·卡普·撒莱的所有陶瓷，在阿布多尔·麦凡德一世（1837—1861）时，都放在宝库里，后来移交给了这个博物馆，这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

我在这里用很大篇幅讲述了这个有特色的博物馆和世界上罕见的中国陶瓷的大量收藏品。

说到这里，顺便向您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收藏的使你感兴趣的一种青瓷。

贴花青瓷

陈列在托普·卡普·撒莱的从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前半期的龙泉青瓷中，可以看到有着特殊装饰花纹的几种碗。在碗的内侧底部即碗心上，紧紧地贴着一块饼干形的大菊花纹，用它作装饰。这种大碗的特点还不止于此，在贴花的反面，即碗的圈足底部中央有一个孔，也就是说这个菊花纹的贴花是为了堵住这个孔的。一般说来，这种青瓷的质量很好（图版一一：土）。

这种形式的元代青瓷碎片，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发

现了不少。并且，当时的埃及曾大量烧制了形式和色调与此完全相同的仿制品，说明埃及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这种独特的中国陶瓷的完整品在伊斯坦布尔也有好多。同行的和久井路子帮我粗略地数了一下，就有五十八件之多。至于放在高处只能看到侧面的瓷器当中，恐怕还会有一些。所以陈列品当中的数量还要多得多。总之，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伊朗的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阿尔德比勒收藏品中，也摆着几件这类的制品。其他如波斯湾南岸的巴林岛和伊拉克的瓦几德遗址以及叙利亚的哈马遗址中也都发现了这种残片。这些，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然而，奇怪的是，在土耳其、埃及以及伊朗发现这么多贴花青瓷，而在这种青瓷的原产地中国和中世纪中国青瓷的主要进口国日本、菲律宾、爪哇等东亚的国家中，竟完全看不到。即使偶尔见到一个内面底部贴着一个小小花纹的大碗，可底下却没有小孔。即使询问一下研究中国陶瓷的内外专家，他们也都说在东亚从来没见过。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可能是从中东各国来的特别订货，即龙泉窑按购买者的要求而特殊烧制的产品。比如，在日本、东南亚各国中残留很多的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被称之为"吴须赤绘"的花花绿绿的五彩瓷器，就完全是为了出口而特制的，因而在中国本土是见不到的。不仅如此，就是在中东的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过，这也就是特别为日本或东南亚而生产的出口货吧。

再缩小范围讲，在日本讲究茶道人当作珍品的青花瓷器中有一种被称为"祥瑞"样式的瓷器。色彩淡雅，是一种和谐的钴蓝，精心地描绘着细致的花纹和山水、人物图样，属于十七世

纪前半叶的青花瓷。这是日本在江西省景德镇特地订制的，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甚至在中国也看不到。

依此类推，上溯到十三、十四世纪，当时中国的窑场已经接受了外国的特别订货，这样考虑是合乎逻辑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中国窑场生产机构的情况，同时也为了解阿拉伯和中国双方贸易关系的具体情况和影响提供了线索。从而，还可以窥见当时中东人的爱好。

那么，究竟为什么中东人要订购这种奇特的陶瓷制品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订货主的爱好

一般说来，陶瓷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具有作为金属容器或石制容器的代用品开始发展起来的共同点。在日本不知为什么金属容器不大受人们欢迎，而多使用漆器。然而，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的中东地区，初期的陶瓷都是尽量忠实地摹仿金属容器或石制容器。从中国战国时代和汉代的陶瓷来看，连象把手那样的细微部分，都极力仿照金属容器的样子。特别是中世纪的伊斯兰陶器（波斯陶器）制造业，则完全是由于伊斯兰国王禁止制造奢侈的金属器，才飞快发展起来的，因此，多数陶器连形式上的细微部分都和金属制品一模一样。在伊斯兰陶器中拉斯他彩绘陶器是最有特征的。这种陶器是以放在明亮的光线下，器面的阿拉伯式花纹就闪耀着五彩光华的金属色彩而知名的。这些陶器，无论形状、色彩、图案都在极力模仿高贵的金属器。

基于这一事实，对中国陶瓷的订货也一定要求它符合土耳其、埃及、伊朗人的爱好，这是不足为怪的。这种要求恐怕就

是和金属器的形式相似。

以这种认识来看这个地区的金属制品，还会发现以下情况，就是在带有圆腹壁的碗类的碗心有一个象脐一样的突起。关于为什么要制作这种形式的碗，有宗教上的或特殊用途种种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不太确切。在土耳其，这种形式的金属碗，从很古老的西泰德时代、富利几亚时代（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纪）就已经使用，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说明是相当受欢迎的形式。

碗心有一块大花形图案的那种中国青瓷碗类，与上述的形式有共同之点。可能是中东的人们在订货时要求制作类似金属碗那样的碗心呈圆形鼓起的形式，于是便产生了鼓起的饼干状花纹的吧？象金属那样鼓起一块球面来，这在制作陶瓷器来说在技术上是比较难的，因而只好作成了饼干状的突起，然后又在上面贴上一片常见的花形纹饰。这种青瓷的形式实在特殊，除了作这种解释之外，恐怕再没有别的解释了。这种形式的陶瓷器迎合了中东人的爱好，出口到中东以后，在埃及等地便制作了大量完全同型的仿制品出售。

另外还有一种见解，就是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本来就有一种在碗心贴小花的青瓷碗。也许是中东人知道中国有这类的青瓷，所以在订货时根据自己的爱好特意要求把花纹放大了。

可是这种看法又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碗足的中央要穿一个小孔呢？当然，象这样不断想着问题观察实物，也是陶瓷研究中的一个乐趣吧！

这种作法确是很奇怪的，按一般常识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把贴花青瓷碗的原形当作鼓心的金属碗的话，那么寻找在碗

底开孔的答案就有了线索了。

把碗心凸起的金属碗翻过来看，上边鼓起多少，底下就凹进多少。那么青瓷的小孔莫不是用来探测碗心凸起的分寸的吗？拿陶瓷来说，如果要使碗足底部呈半圆状凸起，在技术上是很难的。因此，便用开小孔的办法尽量使碗底接近金属碗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开孔可以使底部厚度均匀，同时还能使火烧得更透一些，并使碗底的饼干状装饰粘得更结实一些。

最后，再从经济方面找一找原因。本来这类青瓷如果要制作得更精致的话，那就不应该贴饼干状菊形花纹的押印泥片，而应该使陶胎鼓起一块，在上面刻上花纹才对。可是这种制品却贴了花形泥片来对付；同时碗底开孔使受热均匀，这完全是为了制作方法的简易化、减少损耗、降低成本。这也是出口品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吧！也就是说，中国的陶器制造者或贸易商人，把中东人的特殊瓷器的订货要求心领神会，并用低廉的成本制出了使订货人满意的成品。

总之，这种形式的青瓷碗确实受到了中东人的喜爱。这可以通过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不仅保留了许多同类的龙泉窑青瓷，而且在同一时代的埃及和其他中东地区还大量仿制了无论色彩、形状、花纹以及花纹的贴法，甚至连碗底开小孔的形式都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可以说，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中东人们之间不仅有着经济上的联系，而且还有着精神上的沟通。

安纳托里亚的中国陶瓷

在土耳其，我还没听说过除了伊斯坦布尔以外的中世纪建

筑或遗址里发现中世纪中国陶瓷的事。同时除了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的收藏品目录里象征性的记载以外，也不了解十三世纪以前土耳其的中国陶瓷情况。

那么，在十至十二、十三世纪期间，真的没有运到安纳托里亚的中国陶瓷吗？或者说，中国陶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之外就没有别的地方使用过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作为表示中世纪安纳托里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但关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实在不敢断言。在土耳其古代遗址的研究虽有进展，但对中世纪遗址的研究尚不充分。同时，该地区的研究者对于中国陶瓷的知识也是不充分的。因此，将来周游土耳其，追寻安纳托里亚的中国陶瓷的线索，乃是我今后的一个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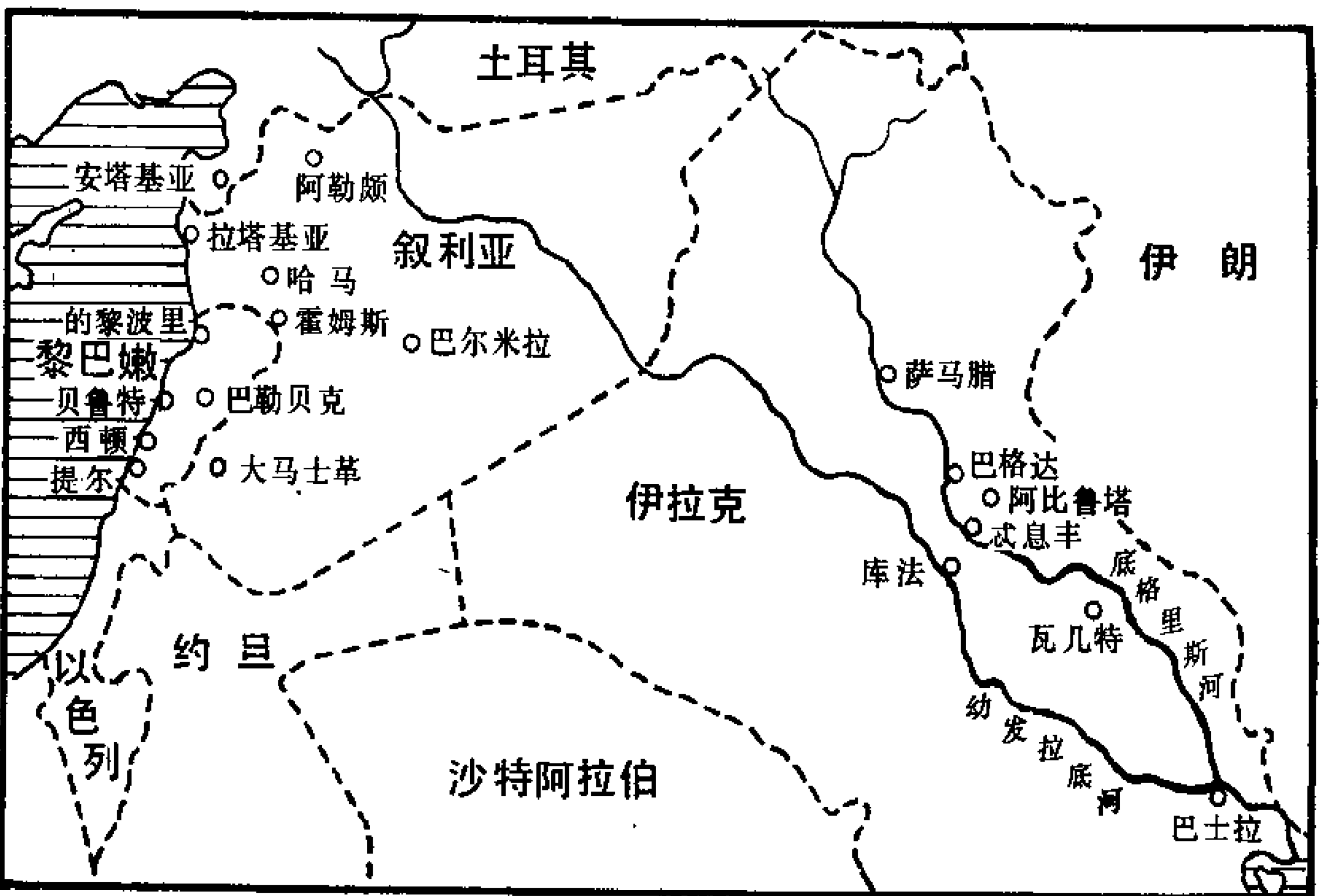
五　从东地中海沿岸到美索不达米亚

——我见到的中国陶瓷

东西贸易通路和东地中海沿岸

东地中海蓝得耀眼，蓝得深沉，真是名副其实的碧海。碧蓝逐渐变为青白时，眼前便展现出从北到南的长长的海岸线，沿着海岸线是一片富饶的沿海地带。这个地带的东端就是山顶积雪的黎巴嫩山脉。这个山麓地带曾被高大的黎巴嫩杉林覆盖着。这种木材曾向各地出口，可现在却被采伐得所剩无几。黎巴嫩人民怀念这些树木，如今把杉树当作现今黎巴嫩共和国的象征性标志。

东地中海沿岸是从遥远的东方翻山越岭，穿过沙漠，到达西方的丝绸之路和香辛料之路的最大终点站；又是从地中海方面通向遥远的东亚的中国和南亚的印度的贸易之路的起点。所以，沿海从北往南有塞琉西亚(Seleucia)、拉塔基亚（Latakia）、塔尔特斯(Tartous)、的黎波里（Tripoli）、比布洛斯(Byblos)、贝鲁特（Beirut）、西顿（Sidon）、提尔（Tyre）等港口，彼此遥遥相望，分布均匀。


土耳其
安塔基亚
阿勒颇
拉塔基亚
叙利亚
哈马
的黎波里
霍姆斯
巴尔米拉
黎巴嫩
贝鲁特
巴勒贝克
西顿
提尔
大马士革
伊朗
萨马腊
巴格达
阿比鲁塔
忒息丰
库法
伊拉克
底格里斯河
瓦几特
幼发拉底河
巴士拉
约旦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在这些港口的背后是绿油油的麦田，枝叶繁茂的葡萄、橄榄，还有无花果树夹杂在田野之中。每当春天来到，银莲花的紫红色花朵点缀着大地。这些港口通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埃及。航线上的来往船只载着东方的商品、西方的乘客，热闹繁忙，呈现着自古以来的繁荣情景。中国的丝绸无疑也是通过这里运往罗马和埃及的。

东地中海沿岸地带，也就是自古以来被称为叙利亚的地区——它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属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一部分——的西部，就这样被我们熟悉了。

黎巴嫩的巴勒贝克

从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乘车虽说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路程，但中途要翻两座大山，即黎巴嫩山脉和后黎巴嫩山脉（安底黎巴嫩山脉）。这两座终年积雪的山脉之间是被称为贝卡的高地。在晴空下，那里展现着一片麦田和葡萄园。在这个地带的一角有个叫巴勒贝克的城镇(Baalbek)，那里有罗马时代的遗址。

的确罗马人对建造城镇特别热心。被他们征服的地区，无论是多么偏远，他们都要建起以巨大的石造神殿为中心的城镇。他们可能在那些城中漫步，痛饮葡萄酒，过着优裕的生活。其实要是没有这种坚固的城廓，恐怕罗马人就不能高枕无忧，安心度日了（图版一一：下）。

巴勒贝克也是罗马人建造的城镇之一。至今还有雄伟的太阳神、酒神、维纳斯的神殿，此外，还有市政厅、法院等遗址。那雄伟的建筑真令人惊叹不已。最近发掘出土的建筑用石块，一块就足有二百吨，如此巨大的石块是怎么运来的呢？如果可

能的话，真想问问当时的人。从尼罗河上游阿斯旺运来的红色花岗岩的高大圆柱耸立在法院的正面。罗马时代的巴贝克勒城，随着罗马放弃了东地中海地区，曾一度变成了废墟，但到了中世纪伊斯兰时代，好象又成了从叙利亚内陆通向海岸的中途要地了。

在这个以古老和豪华著称的巴勒贝克也发现了我在寻找的中世纪中国陶瓷。这里出土的两片中国陶瓷片如今保存在东柏林的本卡门博物馆的东方部。在该博物馆的都兹斯博士(Dud-zus)和埃尔德来因氏(Erderlein)的关照下，使我得到调查的机会。其中一片是内外都是莲瓣纹的宋龙泉青瓷碗残片，另一片是画着流畅的花草纹的优质的元青花瓷碗的一部分。这使我们了解到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陶瓷也在这个高原的古城受到珍视。

在叙利亚的哈马遗址还发现了几乎乱真的元代青花的仿制品，关于这个以后还要讲。这些仿制的中国陶器，毫无疑问都是用中国的青花瓷器作蓝本制作出来的。因此，元青花已经输入到叙利亚也是毫无疑问的了。这样一讲，好象这个发现太平淡无奇了。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当我在大马士革博物馆看到这些仿制品时，真是如获至宝啊（图版一一：上）！

但遗憾的是，巴勒贝克的出土品究竟是从哪些地点，怎样发现的，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从这个罗马时代的大遗址的著名古城中发现了足以说明和中世纪中国有贸易关系的陶瓷器这件事，是值得为之一书的。

叙利亚的哈马

从巴勒贝克所在的贝卡高地再往东翻过后黎巴嫩山脉，就

到了叙利亚大草原。沿着后黎巴嫩山脉和与其相连的山脉的东麓，有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在古代东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城市。这些城市现在还是该地区繁荣的中心城市。

这些城市都在由大马士革往北到阿勒颇这条直线的道路上。这些城镇各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它们各自的特征。大马士革不仅从罗马帝国时代就是一个有名的城市，而且曾是萨拉森时代初期倭马亚王朝的首都。霍姆斯是去巴尔米拉路上的军事要冲。大致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中间的哈马，面临奥伦帖斯河（阿西河），自古就是政治、经济、交通上的要地。至于阿勒颇，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是各国争夺的重要城市，在街市的中央建起了雄伟坚固的城堡，睥睨着四方。

在上述城市当中的哈马遗址发现了中国陶瓷。

哈马的街市别具一格。从新石器时代起曾多次毁而复建，现在，房屋重重叠叠，排列在十几米高的土丘上。人们住在高冈上，总得引水上山。为此，人们设置了直径七、八米的特殊构造的大水车，吱吱嘎嘎地转动着，把奥伦帖斯河（阿西河）水送到高处的水渠里。这就是著名的“哈马水车”，它从古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人们，世世代代不停地转动着。

这个自新石器时代就逐渐堆积起来的小丘的一角，自1931年至1938年，由丹麦国立博物馆的调查团进行发掘。遗址的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十五世纪。

这次发掘，在推定为 950 年到1400年的最上层中发现了青瓷、白瓷、青花等中国陶瓷碎片。这是从帖木儿时代的剑的下层发现的，所以很明显是十五世纪以前的东西。此外，还发现了摹仿中国青花的白地监釉彩绘的波斯陶器。

1964年3月，我访问了保管这些陶瓷片的哥本哈根，来到

了披着银白色雪花的国立博物馆，得到了发掘者里斯博士夫妻（P.J.Riis）、普鲁森博士（Vagn Poulsen）等的帮助，调查了出土的中国陶瓷片*。

其中既有南宋官窑的浅雕牡丹花纹的漂亮的青瓷碗碎片，也有内侧碗底贴有花纹的元青瓷碗的一部分。这是在开罗福斯塔特遗址、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以及伊朗的阿尔德比勒博物馆收藏品中能见到的特殊的元青瓷。

此外，还有白得透明的宋代德化窑白瓷的残片，以及外侧施以美丽的红彩釉，内侧是略带青色的白瓷碗的部分残片。这个饰红彩釉的白瓷，可能是这个遗址中时代最晚的。

这里除了中国陶瓷之外，还有东亚的陶瓷。有泰国宋加禄窑碗的碎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泰国陶瓷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和东非沿岸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更是分外地多，这在后面还要讲。输出到西亚的可能是中国陶瓷的代用品。这种对中国陶瓷的需求的高涨甚至影响到泰国这件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本想描述一下具有牧歌情调的大水车和充满异国风光的山城——哈马，但结果又变成中国陶瓷讲座了。

叙利亚的情况就写到这里，下面赶快进入向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去的道路。

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

从叙利亚东行，来到伊拉克。这里是夹在底格里斯和幼发

---

* P.J.Riis et Vagn Poulsen; Les Verreries et Poteries Médiévales (HAMA Fouilles et Recherches 1931—1938, Ⅳ. 2). Copenhagen, 1957.

拉底两河之间，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地区。本来“伊拉克”就是“河边”或“沿岸”的意思。这是一片细长而肥沃的土地，和埃及并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发祥之地。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伊拉克的巴格达，乘飞机需一小时十分；乘公共汽车，穿过沙漠，则需十三至十四个小时。不过这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在这以前，两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两地之间横着一片宽阔的沙漠，而且还有以抢劫为生的慓悍的贝都印人在那里出没。

因此，一般的旅行者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从叙利亚北上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再从那里向东南迂回，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在骆驼背上要经历二十天以上的长途旅行。相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看起来很近，但想不到要走很远的路。这个从叙利亚到伊拉克的半圆形地带曾被东方学者普列斯特德氏命名为“肥沃新月地带”，说明这两个地区有很大的共同性。

美索不达米亚是富饶的地区，同时又有着世界文明发祥地的传统，所以这里历代都是东方政治的中心和经济、文化的要地。即使在东方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桑王朝的征服下，也不曾改变作为重要地区的地位；甚至在萨桑王朝时代还在巴格达南方的忒息丰建立过首都。

到了伊斯兰时代，建立起强盛的阿拔斯王朝（750—1055或1258)，其首都一直是选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先是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Kufa），其次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以及上游的萨马腊等地。特别是762年阿鲁曼斯尔国王(Al-Mansur)所修建的巴格达竟成了萨拉森帝国繁荣的象征。

贸易是萨拉森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从四面八方

运进新奇的货物和高贵的商品，再行转卖，从而使美索不达米亚聚集了大量财富。不仅如此，远方的技术工人也被吸引到此地从事生产。八世纪中叶，甚至中国工人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法。下面就介绍一段有趣的史料吧！

八世纪中叶，在中亚细亚的怛罗斯曾发生过一次由高仙芝率领的中国唐朝军队和阿拉伯军队的大战，结果唐军战败，数万中国人被俘，死于远离中国的异乡。这是被称为怛罗斯会战（751）的有名的历史事件。

当时的俘虏中，有一个叫杜环的，他被带到底格里斯河畔的库法，以后被放回中国。到了八世纪末，他当了唐朝的宰相。杜环在回国之后，把拘留在萨拉森帝国时的见闻整理发表，记录中的一部分题为《经行记》，留传至今。这本书的内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日本人被押送到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的内地时的情景很相似，同时，也好象是马可波罗的旅行记的再版。

书中有一段，生动有趣地描写了当时的首都“亚俱罗”，即库法的情景，其中提到这里“汉人画匠有京兆（长安）的樊淑和刘泚，织布的有河东（山西方面）人乐隈和吕礼”。

当时这里有中国人。他们也许和杜环同样是俘虏，也许是乘坐贸易船从遥远的祖国来到这里的工人。在这么古老的时代就有中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居住，而且从事绘画和织布，这是多么使人感兴趣的事呀！杜环在库法重遇故人，一定是悲喜交加、感触万千的吧！

考虑到这些情况，关于中国的陶瓷知识传到这里来的事，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在美索不达米亚查找中国陶瓷，你就会知道在不少的中世纪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中重要的是萨马腊

(Samarra) 遗址。

萨马腊遗址和中国陶瓷

提起巴格达，无人不知，但知道萨马腊的人就少了。萨马腊在巴格达以北120公里，是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一个大遗址，是九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时代萨拉森帝国的首都之一。从历史和考古学角度来看，其重要性不亚于巴格达。

为什么要废弃巴格达那样美好的城市，而另在萨马腊建造一个新的首都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哈伦·阿尔·拉西德国王主宰下的阿拔斯王朝初期是非常繁荣的，从首都巴格达来看，仿佛给人们一种完美无缺的印象。其实不然。从九世纪起，哈里发（教主）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禁卫军叛乱相继发生。

第八代阿鲁·穆达西姆国王（Al-Mu'tasim 833—842），为了躲避这种血腥的环境，以底格里斯河时常发生水灾为借口，决定把首都迁到巴格达以北120公里的萨马腊，于838年（一说836年）在那里建造了大都城。

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腊，位于南、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间，比起巴格达来，因地势高而感到凉爽。遗址散于东西岸方圆30余公里之内，有宫殿、衙署、城门、清真寺、住宅、赛马场等，虽都是些残缺不全的废墟，但从这些可以了解到当时都城规模的雄伟和壮丽。其中具有象古代巴比伦的通天塔那样的大尖塔的南北两个大清真寺——北面的是阿布达拉清真寺，南面的是美鲁维亚清真寺——显示着阿巴斯时代的文化的成就，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萨马腊，于四十五年

之后的883年（一说是882年），在第十五代阿鲁·穆塔米德国王（Al-Mutamid 870—889）时被抛弃，首都迁到瓦儿特，接着又迁回巴格达。以后萨马腊再也没作过首都。只是如今还留有位于南郊的金黄色圆屋顶闪闪发光的圣伊马姆陵墓庙堂。由于受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重视，至今仍是香客不断。

萨马腊都城建于838年，废于883年，因此这个遗址就成了反映九世纪中期伊斯兰文化的最好资料，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于是，在本世纪初的1910年，法国建筑家维奥列氏（Viollet）首先到这里进行了调查；接着，从1911年至1913年，德国的札列博士（F.Sarre）和黑尔茨菲鲁特博士（E.Herzfelt）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图版一二：上）。

中国陶瓷片，最初就是在这时发现的。这些陶瓷片的发现和调查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时的中国陶瓷的发现几乎是同一时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吧。萨马腊由于和中国的关系更出名了。以前对于萨拉森帝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有种种说法，在发掘遗址之后才得到了证实。

萨马腊的遗址特别广阔，未被调查的地区还很多。这里从1936年至193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调查，其后在1963年至1964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调查**，均由伊拉克政府考古局组织进行，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新的事实。关于中国陶瓷的问题，当然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现在应该谈谈中国陶瓷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运到这里来的中国陶瓷的种类。关

---

*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5 Vols.

** Iraq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Excavation at Samarra 1936—1939.Baghdad, 1940.

于第一次发掘时中国陶瓷的情况，有前述札列氏的报告* 。报告说，从加乌萨克（Djausaq）宫殿旁边的贮藏库里发现了唐三彩式的碗和盘、绿釉和黄釉罐的残片，还有白瓷和青瓷的残片；并且在姆达瓦基尔的大清真寺庭院的井边还发现了青瓷片，从阿希克宫殿的地下室还出土了白瓷片。有如此多种多样的中国陶瓷片的出土，自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札列氏根据这个遗址只在九世纪中叶作过都城的特殊性断定，这里出土的陶瓷片都属于中国唐代的制品。不过，根据我们现在对陶瓷的了解来看，认为全是中国陶瓷是有困难的。尤其是三彩系的陶器和绿釉、黄釉的陶器，很难确认是中国的制品。1964年，我得到允许，在巴格达的阿巴希德宫博物馆（Abbassid Palace Museum）的仓库调查了1936—1939年考查时出土的中国陶瓷残片。其中的绿釉系和三彩系以及黄褐釉系软陶的大部分都是仿唐三彩的伊斯兰的多彩陶器或多彩线刻纹陶器，不过其中有的也可能是辽三彩。因为当时中国出口的唐三彩数量非常少。

再说，札列氏发掘出的青瓷和白瓷，据我们的鉴别，恐怕应比唐代更晚些，即属于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晚唐、五代、宋）的陶瓷。

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我在1964年得到伊拉克考古局的帮助，考查1936—1939年由萨马腊出土的中国陶瓷时，发现在阿巴希德宫博物馆仓库的收藏品中有十二至十三世纪（南宋、元初）的青瓷和青白瓷。并且在巴格达的塔·玛尔金的阿拉伯

* Friedrich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博物馆（The Arab Museum at Khan Marjan）展出的萨马腊出土品中，也有南宋时代棱状竖条纹的龙泉瓷碗的部分碎片。

可能写的有些繁琐了，但因为是难得的考查所见，所以还想再说几句。同是在1964年，我访问西柏林达累姆博物馆时，在该馆的萨马腊出土品中也看到了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南宋、元初）龙泉青瓷片。

前面，我光说了从这些遗址中所发现的宋代瓷片，但并不是说九世纪的东西就一点也没有。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博物馆里我曾看到九世纪至十世纪（唐末至五代）的越窑瓷，在西柏林的达累姆博物馆里也同样看到九至十世纪的越窑瓷和白瓷碗的残片（图版一二：下）。

因此，在九世纪的中叶这里曾经是首都时，中国陶瓷曾有过大量进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但有趣的是，从据说九世纪以后完全未被使用的萨马腊宫殿和清真寺的旧址中，发现了十世纪以后到十三世纪左右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或白瓷。

如果这个首都真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公元883年以后完全被抛弃，那么就不可能出土贵重的舶来品，中国青瓷、青白瓷、白瓷等。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这就说明萨马腊在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之后，可能还有相当多的贵族和富人居住在这里。如果仅仅是访问圣伊玛姆庙的香客，是不可能把这么高贵的东西留在废址之中的。要从文献上印证这些事实，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如果中国陶瓷的存在能成为改变历来对萨马腊的看法的资料的话，可以说它的确起到了双重或三重的作用了吧。

伊拉克诸遗址中的中国陶瓷

阿拔斯王朝时代的繁荣，不仅限于萨马腊一个城市。更重要的城市还有巴格达和修筑在两河河口的世界有数的海港巴士拉等。毫无疑问，这些城市里也一定运进了不少的中国陶瓷。但由于接二连三的洪水泛滥，深埋到地下，至今仍没有得到发现的消息。既然从更小的城镇遗址中已有出土，总会有一天会大量被发现的。这里说的更小的城镇，就是瓦几特、忒息丰，还有阿比鲁塔。

瓦几特（Wasit）位于南伊拉克的库特（Kut）东南七十公里处，这里有伊斯兰时代的城市遗址。前面说过，从萨马腊把首都再次迁回巴格达的中间几年，此地曾经作过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以并不是一般的村镇。

从这里发现的遗物，有的保存在巴格达的阿巴希德宫博物馆的仓库里，有的陈列在阿拉伯博物馆里。其中有外侧饰仰莲瓣纹的十二至十三世纪（南宋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碗。几乎是完整的佳品。此外，还有碗心贴有菊花纹的元代龙泉窑瓷碗的残片。在碗心贴着菊花纹的下面开有小孔的这种青瓷碗和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是叙利亚的哈马、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等地所见到的一样，是只在中东地区才能见到的特殊的青瓷碗。这可能是为了满足中东人的需要而订制的。这样的瓷器能在瓦几特看到，正是说明中东人有共同性爱好的难得的证据。

其次是忒息丰（Ctesiphon），它距巴格达很近。在巴格达以南约35公里处，以作过波斯的萨桑王朝的首都而闻名。这个遗址座落在暗灰色的旷野中。德国的考查队曾发掘过遗址的

一部分。如今还残留着附属于宫殿的宏伟的大厅的一部分，供怀古的游客们观赏。到了伊斯兰时代这个城镇依然存在，因此附近的田地里到处散落着伊斯兰时代的陶瓷残片。在这里发现了十二至十三世纪（宋代）的龙泉青瓷片，这些遗物被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1964年，当我把一片小小的青瓷片拿到手中时，它立刻唤起我对忒息丰富人使用时的想象。在这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中国陶瓷。

最后，再看一看阿比鲁塔和中国陶瓷的关系。

阿比鲁塔（Abirta）这个生疏遗址的名字，是从日本驻开罗大使馆的奈良参赞那里听到的。据说那里也发现了中国陶瓷。

1964年2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一行（八木正男大使夫妇、松见守道、杉村栋诸氏和我）决定到那里去访问。位于巴格达东南约60公里。在通向忒息丰的高速公路的中途向东拐，是一望无际的红褐色的冲积地带，地平线上看不到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才出现了阿拔斯王朝为向这个旷野供水而开凿的大运河的故道，在那附近也看到了被沙漠覆盖着的小废墟，但还是看不到阿比鲁塔。车按照向导的指点奔驰在沙地之中。走了一会才在远处出现了一根半截的烟筒似的东西，这就是清真寺的尖塔的遗迹。这里就是被倒塌的城墙环绕着的阿拔斯时代的城市遗址——帖尔·阿比鲁塔（图版一三）。

阿比鲁塔的附近是荒凉的地亚拉（Diyala）地区的沙原地带。如果没有灌溉设施，农耕是不可能的，当然城市也就更不可能存在了。在这里，一个强大的王朝产生之后，首先要有完善的水利灌溉设施，然后移入农民，建设农田；而一旦王朝衰落，无力维持这些水利设施时，耕地就又变成沙原，城市也只

好被遗弃了。在中东，这样的例子很多。

到了伊斯兰时代，为了开发地亚拉地区，大搞水利灌溉工程的好象是在倭马亚王朝第十代西夏姆国王（Hishām 724—743）的时代。结果居民移住到这里，从八世纪后半纪到九世纪之间，土地肥沃，收获也增加了。阿比鲁塔作为当时的中心繁荣起来。后来，937年巴格达遭到了巴其卡姆率领的土耳其军队的进攻。阿拔斯王朝第二十代拉底国王（Ar-Radi 934—940）为了防御敌军，下令破坏了灌溉渠，从此这个地方又重新变成了荒野*。

阿比鲁塔就是这样一个被遗弃的悲剧的都市，于十世纪初结束了它的生命。1957—1958年之间，芝加哥大学曾到此调查过。在五、六百米见方的土城内，重叠着毁坏的清真寺和民房旧址，地上到处散布着初期的伊斯兰陶片。所看到的伊斯兰陶片仅限于初期的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

我们争先恐后地采集了陶片。终于在这里也发现了九至十世纪制作的褐色越窑瓷和华南白瓷的残片。这些现已陈列在东京出光美术馆的陶片室里。

中国陶瓷自九至十世纪起，就象水的渗透似地扩散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各城市中去了。

---

* 三上次男：《关于中国陶磁和伊斯兰陶器关系的几个问题》，西南亚研究4号，1965年，6—7页。
Thorkild Jacobsen: Summary of Report by The Diyala Basi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Sumer: Vol. XIV, nos.1 &2, Baghdad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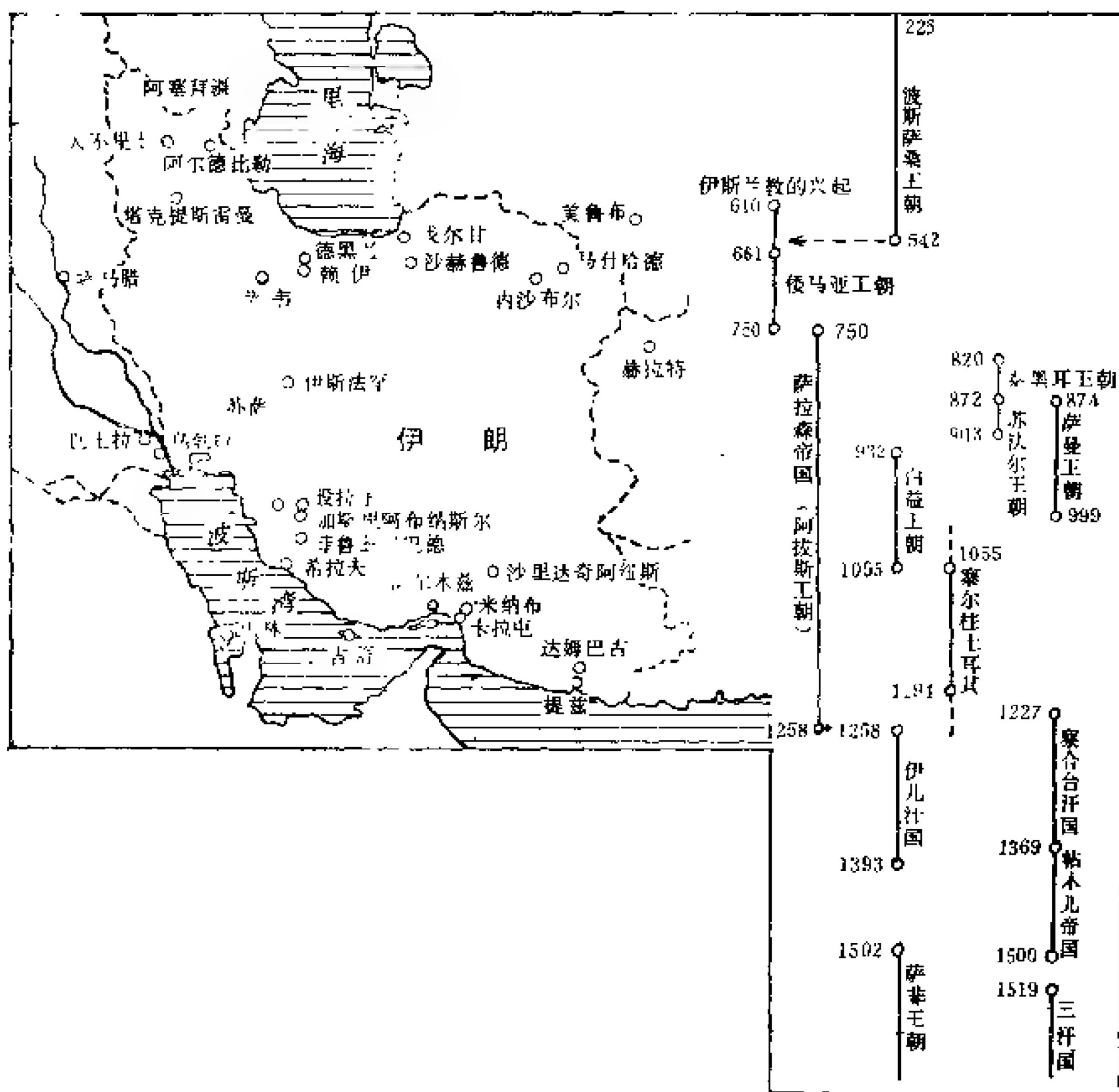
六　传到波斯的东方陶瓷

——东西文化接触点与中国陶瓷

响亮的名字——波斯

波斯——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有余韵。它是西亚文化开花结果的地方。和居鲁士、大流士一世一起闻名于世界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因马其顿亚历山大军队的进攻而遭彻底破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壮丽都城——珀塞波利斯，以“光明之神胡腊玛达和黑暗之神安赫腊曼纽（阿利曼）相互斗争、交错统治世界”为教说的“拜火教”，现收藏于正仓院的萨桑王朝的银器和波斯制作的磨花玻璃碗，在中国唐代的首都长安翩翩起舞的波斯舞姬，中东、西亚地区进入伊斯兰时代后开始出现的波斯陶器和细密绘画等等，这一桩桩史实、一件件文物丰富着我们的知识宝库，使我对波斯这个词语产生了越来越亲切的感情，最后，它终于成了西亚文化的代名词了。大概不只是我一个，对于日本人民也会有同感吧！

事实上，波斯在中东地区，无论在文化、政


阿塞拜疆
里
海
戈尔甘
沙赫鲁德
马什哈德
内沙布尔
赫拉特
伊斯法罕
伊　朗
波
斯
湾
希拉夫
米纳布
提兹
225
波斯萨珊王朝
542
伊斯兰教的兴起
610
661
倭马亚王朝
750
750
萨拉森帝国（阿拔斯王朝）
820
872
903
874
萨曼王朝
999
932
1055
1055
1258
1258
1227
察合台汗国
伊儿汗国
1393
1369
帖木儿帝国
1500
1502
萨菲王朝
1519
三汗国

治还是经济方面，无论在古代、中世纪，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商人们通过连接东西方的陆路和海路，把大量的贸易商品运进波斯地区，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文化也成了培育当地文化的养料，从而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波斯文化。

公元前七世纪，在伊朗西北部成立米提亚帝国（前625—前550）之后，波斯就经常以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成为西亚的中心。

继米提亚成为世界大帝国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前559—前330），接着是帕提尔（安息）帝国（前247—后226）、萨桑王朝的波斯帝国（226—542），它们都成为西亚的代表。即使在七世纪初被阿拉伯军队征服之后，波斯仍保持中东文化代表者的自尊。在倭马亚阿拉伯王朝（661—750）灭亡之后，阿拔斯阿拉伯王朝（750—1258）时，波斯又成为萨拉森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且波斯方面，摆脱萨拉森帝国的控制，要求独立的运动逐渐高涨起来。进入九世纪之后，在西北的霍腊散地区就接连不断地建立了独立政权。泰黑尔王朝（820—872）、苏法尔王朝（867—903）、萨曼王朝（874—999）都是以伊朗西北部为根据地的地方王朝。

波斯作为西亚中心的地位，在其后土耳其人建立的塞尔柱帝国（1055—1194）、蒙古人建立的伊儿汗国（1258—1393）和帖木儿帝国（1369—1500）的时代，一直没有改变。虽然这些王朝都是外来民族做统治者，但其文化却一直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的波斯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取代。

十六世纪初兴起的波斯人的萨非王朝（1502—1736），终于把七世纪以来的外民族的统治权夺了回来，并建立了繁荣的

波斯帝国。这个王朝继续了二百数十年之久，到了十八世纪前期灭亡，其后是桑德王朝(1736—1794)和卡扎尔王朝（1779—1923），从1925年起为巴列维王朝。在这期间波斯人的波斯这一国家形式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抵住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持了独立，它不愧是一个始终保持悠久传统的西亚国家。从它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波斯是有着一贯传统的波斯。

波斯和日本之间接触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波斯的工艺品，早在五至六世纪就传到日本。在日本奈良县，飞鸟地区的古塚之一的新泽千塚126号坟墓中，出土了西亚制作的薄胎磨花玻璃小罐和蓝色玻璃托盘一套，后来又从六世纪前半叶的安闲天皇陵出土了与正仓院藏品完全一样的萨桑王朝时代的波斯厚胎磨花玻璃碗，从这些发现中也可证明上述的日伊关系。

不仅这些，从朝鲜海峡的远海的孤岛，远离日本本土的岛上祭祀遗址中，以及在京都的上贺茂神社院内，都发现过同样的萨桑王朝时代的波斯磨花玻璃残片。

据黑川真赖翁记载：明治五年九月七日，仁德天皇陵前的台阶被暴风雨破坏，露出了石室和石棺，其随葬品中有蓝色琉璃小罐模样的东西和透明玻璃碟子——这些都重新埋回去了——以现有的知识判断，可能就是西亚制作的一套玻璃器皿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远在五世纪前半叶，这种宝贵的西方玻璃器皿确实已传到我国来了。这些遗物比正仓院的收藏品还早三百年。

如果日本和波斯、西亚的接触有如此悠久的历史，那么自

---

* 三上次男：《西亚工艺与日本》，三上次男、山道知行、冈田让编《东洋美术》第六卷《工艺》，朝日新闻社，昭和四十四年.

然在我们日本人心里很早就存有古代优秀文明之地——波斯的概念了。

去访问这样一个古老而典雅的国家，是绝不会使你失望的。

东西方世界的连接点——波斯

飞机一接近首都德黑兰，映入视野的就是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这条宽阔的山脉由东向西横贯伊朗高原的西北部，在山脉中部耸立着圆锥状火山的丰姿，那就是主峰德马万德山，标高为5,671米。

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北侧雨量充足，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并有肥沃的耕地，是温和的里海的沿岸地带（马赞德兰州）。但山脉的南侧与北侧则完全相反，是严重的干燥地带，并且越往南走越干燥，中部是只有岩石和砂砾的卡维尔沙漠（Dash-tekavir）。一座山脉竟把自然环境分得这样鲜明，真使人感到有些恐惧。

然而，在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南侧也有几处高山冰雪溶化形成的泉水涌出，那里便成为沙漠中的绿洲，那些绿洲大的成了城镇，小的成了村庄。东边有马什哈德、内沙布尔，中部有沙赫鲁德，西部有德黑兰和加兹温等大城市，这些城市都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及其向东北延伸的复杂山脉的南面。从中亚细亚和阿富汗开始，穿过伊朗高原，通向美索不达米亚的骆驼商路，自古以来都是沿着这些山脉南麓的绿洲形成的，响着驼铃的骆驼队络绎不绝地在这里穿行。

当然，在厄尔布尔士山的北面也有连接东方和西方的商路。有从中亚细亚的土库曼共和国通往北伊朗的道路，经过美

鲁布和阿什哈巴德，进入北伊朗的戈尔甘，再从这里往西穿过厄尔布尔士山北侧和里海之间的富饶的马赞德兰，就可以到达高加索地区和伊朗西北部的草原和山地。这样便可以从这个高原地带通向高加索和黑海方面，或者到达安纳托里亚（土耳其）和底格里斯河上游一带。除了南路之外，也依靠这条草原上的路线，使东、西方的各种商品频繁交易。

在伊朗高原，还有一座横贯西北至东南的大山脉，那就是从伊朗西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西端起，沿着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国境往东南延伸的扎格罗斯山脉。这条山脉还沿着波斯湾北侧再向东南延伸至俾路支，呈现着奇异的形状。

在这些山谷和山麓之间，也散布着零星的绿洲。如果从伊朗的西北部出发，沿着这些绿洲走下去，经过伊朗东南部的俾路支一锡斯坦省，就可以到达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下游地带。公元前四世纪末，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最后到达印度河流域，把军队撤回时也正是走的这一条路。从南亚细亚的印度方面运来的一部分物资也是经过这条路运到伊朗西北，再向西越过扎格罗斯山脉，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

那么连接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海路又是如何呢？

前面讲过，扎格罗斯山脉是沿着波斯湾在东南方向延伸，它的南麓面临碧绿的波斯湾。从空中俯瞰波斯湾，就会感觉到波斯湾有说不出的美。沿岸的浅绿色的海水，随着海的深度逐渐加深，就象排列着的青色色谱系列的水彩颜料。到了湾内，则变成了清澈见底的“波斯蓝”色，那真是柔静、深沉、诱人的颜色！如果郁郁沉思地从这里走过时，恐怕会情不自禁地跳进那蔚蓝的海水中去的吧。

可是，一旦你站到海岸上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酷暑和潮气就会象恶魔一样地向你袭来。的确，波斯湾的炎热真是不同寻常。这里夏季气温超过四十度，甚至达到五十度也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非常大的湿度，给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带来很大的痛苦。

近几年英国的伊朗考古研究所调查了中世纪波斯湾的繁荣港口西拉夫（旧称撒那威）遗址。他们曾抱怨地说，充其量只能在一月到二月这两个月时间内进行工作。

然而，就在气候如此炎热的波斯湾沿岸，古代繁荣的港口遗址却是比比皆是。自古以来有名的港口有上述英国调查队发掘的西拉夫和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Hormuz I.），还有现在仍占重要地位的阿拉伯河口的巴士拉等，至于小港口就更多了。这些港口作为东西贸易的基地，都曾经繁荣一时。

就连红海岸的爱扎布废港也是一样，对追求财富的人来说，他们不顾地理上恶劣条件，去铤而走险。

在这些连结东方和西方的沙漠绿洲上的古老城镇和那些接受海运物资的波斯湾沿岸旧港口，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古代和中世纪的遗址。在那些地方发现了种种有趣的文物，其中也包括我们寻找的中国陶瓷。

下面就谈一谈在伊朗发现的中国陶瓷的情况吧。

波斯湾海岸的各个遗址

在中世纪，从海路进入波斯湾有两条航线。一条是横断印度洋的航路，由南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出发，过阿拉伯海，先到达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附近。然后再沿着半岛的南岸往东北走，经由阿曼进入波斯湾，到达湾内各个港口。这条航线看上

去有些绕道，但据家岛彦一氏的查证*，由印度方面开来的船只，走这条航线的却相当不少。

另一条是沿海岸的航路。从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出发的船只，自印度西海岸北上，到达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口。第七章将要谈到的，现在卡拉奇东面的旧班波尔港遗址，那里很可能曾经是重要的中途停泊港之一。

从那里启航的船只，不久就沿海岸进入波斯湾，一面在波斯湾北岸的各港口装卸货物，一面向湾内航行。就这样不断在霍尔木兹、西拉夫停泊，最后开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口。昔日亚历山大的军队从印度河口撤退时，其部将内阿尔格斯率领的一支军队由海路西行，走的就是这条沿岸航线。

这样，由东方来的船只，可以从两条海路到达波斯湾，在这些船只中途停泊的港口，各处都发现了中国陶瓷器。

那么就从东顺路查点一下：有临近巴基斯坦国境的旧港梯兹（Tiz）、梯兹北边的达姆巴古（Dambaguh）和离此较近的卡拉特·加姆西德（Qalāt-i-Jamshid），进入内陆有临近哈里鲁溪谷（Halil Rud）的几鲁夫特（Jiruft）的沙里·达卡奴斯（Shari-Daquianūs）等遗址。

在荒凉沙漠的海岸和内陆，从仿佛孤零零地被遗弃在那里的上述遗址中都找到了中国陶瓷，这使得著名的印度学者、考古学家、中亚细亚探险家奥瑞尔·斯坦因氏（Aurel Stein）发出了欢呼。据调查过这些陶片的霍布松氏（R·L·Hobson）

* 家岛彦一《关于印度洋通商史的考察》，东方，十卷一、二号。《唐代末期中国与大食间印度洋通商航路》，历史教育，十五卷，五、六号。

的说法，达姆巴古发现的中国陶瓷是十五世纪即中国明代初期的青花瓷，从沙里·达卡奴斯出土的可能是九至十世纪越窑系陶瓷，其他好象还有约十世纪的青瓷和青白瓷。由此可见，唐末至宋初的中国陶瓷曾用骆驼队运进扎格罗斯山脉北麓的沙里·达卡奴斯*。另外，从卡拉特·加姆西德发现的中国陶瓷是有很多开片的白瓷，斯坦因氏认为这些恐怕是由中国输入**的。

在波斯湾的著名贸易港霍尔木兹岛附近，在这个岛的对岸的大陆上，从靠近米纳布的海岸的卡拉屯（Kalatun）也发现了很多优质的宋代陶瓷片，其中还有一枚宋代铜钱。发现者也是斯坦因氏。据他说，这个铜钱是1111—1119年之物。*** 这个年代是北宋徽宗的政和与重和两代，重和是由1118年至1119年，不足两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铜钱是政和通宝的可能性很大。总之，在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也是十二世纪的，可以说是南宋时代的东西吧。

沿波斯湾向西航行，有一个从九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之间航船曾频繁出入的西拉夫（Siraf）港。如今它在名叫塔黑里的海岸小村旁边只默默地留下一个遗址。从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几片分明是中国制作的陶瓷片****。

---

* R·L·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āb.
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the South Eastern Iran AppendixA·London 1937.

** A.Stein：前揭书，86页，

*** A.Stein：前揭书，183页，

**** A.Stein：前揭书184页，

关于西拉夫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性质问题，由于自从1965年起连续数年间，英国的伊朗考古学研究所在西拉夫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许多中国陶瓷片，就更为明确了。我在1966年访问该研究所时，看到了从西拉夫采集的许多陶瓷片，在大英博物馆的平达·维尔逊氏的收集箱中，有中国越窑瓷和白瓷。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青瓷，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关于波斯湾沿岸海港发现中国陶瓷的问题，中国的陈万里氏曾说过：此外在波斯湾内部的巴士拉附近的商港乌柏拉（Ubolla），曾叫阿波罗高斯（译者按：旧称弼斯罗）、幼发拉底河口的希拉（Hira），还有霍尔木兹方面的小岛士的吉舒（Kish）等遗址里也发现了龙泉窑青瓷碎片*。但遗憾的是陈氏所说的根据不清楚。

上面我列举了发现中国陶瓷的波斯湾沿岸的城镇和遗址的地名，若根据中世纪的记录来看就更为清楚了。

扼守着波斯湾入口的要港霍尔木兹，自古就是波斯湾航路的一个重要据点。忽鲁谟斯（即现今霍尔木兹）开始出现于中国史籍，是于五世纪初期，即前面提到的郑和率领明朝庞大海军远征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海军远征南海共七次，其中的第四次（1413—1415，即永乐十一至十三年）、第五次（1417—1419，永乐十五至十七年）、第六次（1421—1422，永乐十九至二十年）三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都是霍尔木兹。由此可见霍尔木兹港口的重要性。

当时随军远征的费信在他所著的《星槎胜览》中述说了十五世纪初期霍尔木兹的风土和居民的风俗习惯之后，还记载了

*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1956年版54页。

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的商品目录，其中除了五颜六色的丝绸，各种香辛料，还提到青白花瓷器。依照文中附记的诗句来看，青白花瓷器指的就是青花瓷器。运到霍尔木兹的青花瓷的数量会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没有青瓷的字样，但无疑也会一同运去的。

至于西拉夫（旧称撒拉威），则更早，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南宋时代，在中国就有介绍。南宋岳珂的《桯史》（卷十一）就记有“尸罗围”，还有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记载的“施那帏”，正如桑原隲藏氏明确指出的那样，都是西拉夫一词的音译*。

可以想见，在这个时期，不仅西拉夫的商人到达了东方，中国的商船也航行到波斯湾深处的海港。不言而喻，中国陶瓷也一定会传到那里。从当时海上贸易的规模来推测，中国陶瓷的输出量也是相当大的。

丝绸之路上的诸城镇

现在把目光从有中国陶瓷碎片散布的海岸废港再转向内陆地区吧。这个地区出土中国陶瓷的地点也不少。

那么，我们把从中亚细亚、阿富汗起一直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西商路干线，由东往西看一下。

从阿富汗北部向西的交通线，过了西部国境附近的要地赫拉特不远就是和伊朗的国境线，再略前行，就到了伊朗东北部的大都市马什哈德。这里不仅是交通要冲，也是伊朗东部的经济中心地之一。中亚细亚清爽的风吹得林荫道上的树叶沙沙作

---

* 桑原隲藏，《蒲寿庚的事迹》，岩波书店，141—142页。

响，真是一个幽静的沙漠绿洲城镇。城镇中心，清真寺的黄色圆顶金光闪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什叶派，而这里又是什叶派两大圣地之一。在金黄色的清真寺的周围，各地的巡礼者熙熙攘攘，出售地毯、谷物、纺织品、宝石等的大型商店鳞次栉比。什叶派圣堂戒律森严，不许异教徒进入清真寺，甚至照像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这里的寺院有一种使人感到异常紧张的气氛。

在这个宏伟、华丽的清真寺旁边有个相当讲究的博物院。进到里面可以看到伊斯兰时代各式各样的工艺美术品，其中一角陈列着很漂亮的中国陶瓷。

这些中国陶瓷器确实是精美的完整品。其中有元代的龙泉窑青瓷大碗，有明初的日本人称之为"天龙寺手"和明中期的"七官手"等样式的龙泉窑青瓷，还有明代到清初的白瓷青花。总的感觉都属于优质品。内侧碗底有矫健的贴花龙纹的明初青瓷和同期绘有独特的鱼藻纹的青花瓷器尤为出色。还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饰有灵兽卷草纹的青花大盘和满绘西洋花草纹的十七世纪青花柏叶大盘，也很突出。

这个博物馆本来是为了展出收藏在阿斯塔纳·考兹·拉扎维（Astaneh Ghods Razavi）的前驻马什哈德的副王的搜集品而于1943年开馆的。这些优质的中国陶瓷无疑也都是副王的收藏的珍宝了。这也是说明当时中国陶瓷如何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佐证。

内沙布尔的中国陶瓷

内沙布尔以出土中国陶瓷而受到重视。以内沙布尔和马什哈德为中心的伊朗东北地区，虽然现在是伊朗领土，但在历史

上原来是和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和巴鲁富，再加上北面的土库曼共和国的美鲁布等构成一个地区，叫作霍腊散地区。

从中亚细亚和阿富汗方面通向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贸易路线，自古以来经常是通过霍腊散地区的，所以这里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很活跃。正因为这样，也常常遭到残酷侵略的暴风雨的袭击。其中心城市内沙布尔就是遭到多次恶劣命运摆布的典型城市之一。

下面就说说访问内沙布尔的情况。接近伊朗和阿富汗国境的马什哈德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由这里往西120公里就是内沙布尔。路上只能看到七、八个村落，除此之外几乎是一片覆盖着沙砾的荒野，不过北面那覆盖着白雪的山峦却显得异常壮美。

终于到了内沙布尔城。这里果然是伊朗东北地区的重要城镇，宽阔的大街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工商店铺，它们仍保持着中世纪的面貌，人们在里面安静地进行着交易。除伊朗人之外还能看到土耳其人，商店卖的地毯是大红地子上织出黑色几何图纹的土库曼风格的制品。沙漠绿洲的城镇果然名不虚传，宽阔的街道不时吹来四月的清风，使人感到十分舒畅。

这个热闹的城市实际上是十四至十五世纪以后建成的。历史上有名的旧街市在现在街市的东南五、六公里处，如今只留下一片废墟。这主要是由于先是遭到成吉思汗军队的破坏，以后又遭到地震摧毁的结果。

关于旧内沙布尔城镇的历史情况，是从萨桑王朝开始时查清的，了解到此城于430年就已存在，可能是萨浦尔一世或二世时建造的吧。到了七世纪，被阿拉伯军队占领之后，这里就成为霍腊散总督的驻地，九世纪在这里建立独立政权的泰黑

尔王朝（820—872）和苏法尔王朝（867—903），曾把此城作为首都，所以现在仍然残存着许多壮丽的建筑物。进入十世纪，成立了萨曼王朝（874—999），这里又成了总督的驻地。据最近来此访问的伊本·贺盖尔等的记载，城镇方圆三英里，四周城墙环绕，有四个城门，城内分为四十二个区。郊外也是房屋栉比，商队的驼铃响声一片。

其后，1037年塞尔柱帝国的创立者托克卢尔·贝伊占领了内沙布尔，并把它作为首都，这里就成了经济、文化的一大中心地，大型学校和图书馆也修建起来了。据现在所知的数字，仅图书馆就有十三处。中世纪世界之最的数学家兼诗人、哲学家莪默·伽雅姆就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完成了他伟大的研究事业。他的墓地所在的清真寺是用画有几何图案的色彩鲜艳的瓷砖砌成的圆顶建筑，在太阳的照射下更加光彩壮丽。

但是，这个兴盛一时的内沙布尔在十二世纪以后也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终于在十三世纪初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所蹂躏，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1221）。后来虽然勉强得到复兴，可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又遭两次大地震的浩劫（1267、1280），所以，所有建筑物已化作一片瓦砾。

繁荣一时的旧街市，就这样不得不放弃了。现在旧街市的遗址还有伊斯兰时代的城堡和商场，大型的清真寺和贵族宅邸化作土丘散在各处。至于萨桑王朝时代的遗址尚不得而知。

由于这个遗址的重要性，美国的密特罗波利坦博物馆在1936、1937、1939年曾连续三次进行了颇有兴趣的发掘调查。调查集中在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上，发掘了九至十三世纪的城堡、商场、清真寺、学校、宅邸、骆驼商队的居住点、窑址等。特别是精心调查了九至十世纪泰黑尔王朝和萨曼王朝时代

的遗址。并了解到这个时代内沙布尔的房屋中装饰着壁画，窗户都用上了彩色玻璃。还了解到城市主要建筑物的地面上都涂有红、蓝色彩，公共浴场里有笔法娴熟的人物画像等。有趣的是，这里除了伊斯兰教徒之外，还有不少的景教派基督教徒和拜火教教徒。同时还查清了内沙布尔使用的陶器和圆顶窑的性质。以生动的图案和美丽的色彩为特征的初期伊斯兰陶器的实际情况一下子完全清楚了*。

经过密特罗波利坦博物馆的发掘，确知这个遗址是伊斯兰时代遗物的宝库之后，当地农民便开始了成年累月的盗掘。于是，此地出土的遗物便开始充斥于德黑兰古艺术品的市场。1964年我访问该地时，盗掘之风依然很盛。商场遗址坑穴累累，农民们挖成深四、五米，象井一样的深穴，一直挖到当时的地面，捡出了遗弃的陶器和玻璃，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图版一四）。

就这样，从这些密特罗波利坦考查队的发掘品和当地人的盗掘品之中，发现了从九世纪唐代到十三世纪宋代的中国陶瓷。

内沙布尔发掘的中国陶瓷，现在都在纽约的密特罗波利坦博物馆的仓库里。1964年和1967年我访问了该馆，在原发掘负责人威尔金逊氏和伊斯兰美术专家格鲁贝博士(Ernst T.Grube)，还有阿那威氏及琼金斯小姐的帮助下，两次到仓库进

---

* C.K.Wilkinson: The Iranian expedition.1936. The Excavations at Nishapur. Section I of the Bulle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XXXII no.2, 1937.C.K.Wilkinson: Life in Early Nishapur.B. M.M. A, vol IX, no.2, 1950.等.

行实测和拍照。其详细情况将在报告书中发表。我见到的残片中有：唐代邢窑白瓷盖罐的一块残片，唐代长沙窑的大型黄釉褐联珠纹的罐和黄绿釉釉下贴花纹罐的上半部各一片（参看照片），晚唐越窑深碗的一部分，带有自由画风格的白釉刻花花草纹、白釉刻花几何纹的德化窑或广东窑的白瓷碗、大盘的残片，器外饰有刻花莲瓣纹碗的碎片，此外还有篦划弧纹的青白瓷和青瓷的碎片。

其中的一块碎瓷片使我颇感兴趣，那是一块象唐白瓷一样又白又细腻的瓷胎上挂了发亮的绿釉的、带碗足的小型陶碗碎片。与此完全相同的残片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也有发现。器形、釉色和瓷胎看起来完全是中国式的。实际上这种绿釉陶器在伊斯兰陶片中还没有发现过，从这一点推测，我认为是晚唐到宋初间的中国绿釉陶器。

除此之外，还看到了朴素的元代初期青花碗的残片，这很能说明旧内沙布尔末期进口的情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如上所述，从内沙布尔遗址的实际调查中发掘出的陶瓷尽是残片，而且数目也并不多，可是按种类来说有越窑、长沙窑、青瓷、白瓷、青白瓷、元代青花瓷等，基本上是一应俱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沙窑瓷的贴花细颈罐的上半部和鸟纹碟残片的出土。中国自己也发现不多的长沙窑陶瓷，为什么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和巴基斯坦的班波尔遗址以及东方的爪哇岛都有不少出土呢？值得深思。关于这个后面还要谈及。认为“这是出口货”的说法也许能成立吧。

据说内沙布尔出土的完整瓷器也有几件。但这些都是在德黑兰美术市场上出现的东西，甚至拿到我国来的也有三件。

第一件是越窑瓷碗。从碗的敞口、腹壁削直成斜线、玉壁形圈足、独特的绿褐色釉等特点来看，此碗无疑是九世纪后半叶到十世纪前半叶的唐代晚期制品。这是小山富士夫氏从德黑兰买回的，在德黑兰据说是内沙布尔的出土物。

第二件是石黑孝次郎氏从德黑兰买回来的，据说也是内沙布尔出土的长沙窑的小碟子，为淡黄釉下黑彩。碟心有用铁釉随手绘的花草纹，碟边为弧纹，瓷胎为灰褐色的致密瓷土。这和前面提到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细颈罐的上半部和碗的残片是一类的，可以说是九至十世纪的制品。

第三件是小山富士夫氏所藏的白瓷深碗，饰以出棱的刻花上仰葵花纹，胎为优质白瓷，口缘平正外翻。小山氏认为是宋代的广东西窑的制品。

中世纪的内沙布尔人喜爱中国陶瓷，已由这里出土的陶瓷片得到说明。与此关联，贝哈儿（Muhammad ibn al Husain Baihaki）在1059年曾写了很有趣的一段话：“霍腊散总督伊萨（Ali ibn Isa）向哈隆·阿尔·拉西德国王赠送了未曾有过的出色的中国官窑陶瓷二十件和一般的中国陶瓷器二千件。”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运进内沙布尔的中国陶瓷数量之多，并且在内沙布尔是如何受到珍视。这是正值阿拔斯王朝盛世的事。当时，向霍腊散的中心地内沙布尔运进了如此之多的中国陶瓷，并且还有特别优质的陶瓷制品。

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里陈列着在霍腊散发现的南宋、元、明初等各个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碗、碟等器皿近十件。尤其是南宋时代有仰葵纹的大碗和刻花牡丹纹的青瓷碗是相当精美的制品。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的第五次国际美术考古学会上，我借用这个碗向听众讲述过中国陶瓷和伊斯兰陶瓷制作技术上的相

似点，因此印象很深。不过这些陶瓷究竟是在霍腊散地区的什么具体地点发现的，还不清楚，既然是在伊朗，可能是内沙布尔，或是吐丝，或是马什哈德等地吧。

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的各遗址

关于内沙布尔说得太多了。现在顺着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南北山麓骆驼商队的道路西行，继续探寻中国陶瓷吧。

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的德黑兰，是现在伊朗的首都，可是从十八世纪的卡扎尔王朝（1779—1923）起就在这里建设城市，成为伊朗的中心了。以前繁荣过的旧街市在南面18公里的赖伊。

这里从古代起就是东西和南北的交通干线的枢纽，由新石器时代起就有大的部落，到了有史时期，在公元前七世纪，米提亚帝国开始在这个高原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前625—前550）时，就建设都邑，成了东西方的要冲。

其后，虽经世代变迁，王朝更替，但这里在任何时代都受到重视。公元前三世纪兴起的安息国（帕提亚帝国）曾在这里建立都城阿萨基亚（Arsacia即尼萨），在萨桑王朝时代和阿拔斯王朝时代也仍然是要地。阿拔斯王朝末期到过这里的伊本·豪克尔（Ibn Haukel）曾说过，除了巴格达之外，赖伊就是东方最美好的城市了。可能就象他说的那样吧。

十一世纪塞尔柱帝国时代，这里也曾是都城之一，当时称作拉给斯（Rhages），闻名于四方。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该城的恶运来临了。由于蒙古军队的入侵，该城于1221年遭到了成吉思汗部将哲别（Chebe）的洗劫，以后于十四世纪后半叶，被从中亚细亚入侵的帖木儿帝国

彻底毁灭。

现在到这里一看，只留下了近20米高的土丘遗址，其最上层即被帖木儿军毁灭的城镇，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土丘上能看到的只是房屋的地面、断壁和伊斯兰时代的陶片。

此外，废墟西边的卡修马·阿里岩山附近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那里可以拾到红色或奶油色地子上绘有黑线和巧克力色花纹的釉陶残片。

从卡修马·阿里岩山南下，便看到从岩石间涌出一股清泉。泉水积成的小池里柳叶状的游鱼闪着银鳞。废墟附近是个分外清爽的环境。赖伊之所以能作为重要都邑而长期存在，和这里的丰富水源有很大的关系。在泉水附近的石壁上，刻着后来的卡扎尔王朝（1779—1923）时期的国王浮雕像，那仿古的雕刻手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934、1935两年，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发掘了这个遗址。其结果，从最上层的伊斯兰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伊斯兰陶器以及夹杂其中的若干中国陶瓷。

遗址的发掘报告尚未出版，但我在1964年得到了波士顿美术馆的支持，调查了他们收集的赖伊出土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有玉璧型碗足的唐代后期越窑瓷碗——内侧底部有流利的划花花草纹——的残片和元代的龙泉青瓷的残片。另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也收藏有赖伊出土的南宋、元初的龙泉窑青瓷片（图版一五）。

据小山富士夫说，在巴黎的济美博物馆里有“一个陈列着据说是赖伊出土的唐白瓷菱口碟子、邢窑白瓷配有铁彩绘的贴花蝴蝶纹盒子、可能是北宋的东窑青瓷花瓣口的碗以及明初青花

瓷的优质品的陈列橱”* 。另外还听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有赖伊出土的青白瓷碗**。三杉隆敏氏也曾写过在济美博物馆有据说是赖伊出土的“唐代的长杯形有鱼纹印花或贴花的瓷器”***。看起来，赖伊出土了不少东西。但我去济美时却把它漏掉了，十分遗憾。

如果这些在济美博物馆中的赖伊出土品是确实的话，那就是说在赖伊除了唐代越窑瓷器之外，还用过邢州白瓷碟子、盒子以及酒杯。这恰好说明在九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已运进伊朗的中央地区了。

宋代的青瓷和青白瓷以及明初的青花瓷在这里更加受到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中东地区对中国陶瓷的需求量相当大，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赖伊的周围地区情况又是怎样呢？距离赖伊西南150公里处，有一个叫萨维（Sāveh Sava）的城镇，这里也出土了明代的青花瓷残片。这是1964年我们访问萨维南郊的中世纪伊斯兰陶窑址和有历史渊源的清真寺玛斯几特·久米(Masjid Jome)时的收获。

萨维自十二世纪以来，不单是一个地方城镇，同时也以用优质粘土制作优质伊斯兰陶器的生产地而闻名，因此，中国陶瓷运进此地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追寻中国陶瓷是无止境的。伊朗高原中部的美丽古城伊斯法罕也有精美的中国陶瓷收藏品（图版一六：上）。

---

* 小山富士夫：《济美博物馆的琉璃釉白龙纹梅瓶》，大和文华，第39号28页。

** 小山富士夫：《美国杂感二》，东京国立博物馆通讯，126号。

*** 三杉隆敏：《寻求海上丝绸之路》，创元社，昭和43年。

伊斯法罕是伊朗近代史上有着光辉业绩的萨非王朝（1502—1736）的首都，以阿拔斯大帝(1587—1629)时代为中心，连续建造了许多壮丽的宫殿和寺院。用五颜六色的阿拉伯式图案装饰的清真寺圆屋顶和墙壁的华美，简直用笔墨难以形容。这里的旅行导游书中说："未见伊斯法罕就莫谈伊朗。"这话并非夸张。

这些建筑，都是以萨非时代所谓"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的财富和权力为后盾而建造起来的。如今残存的旧宫殿之一的切黑尔斯顿宫殿（四十柱宫殿）里保存着明初的青花瓷和青瓷的优质品。据三杉隆敏氏调查，共有四十二件*。

这里曾经被用作小博物馆，上述器物的一部分经常陈列着。这里的波斯式青花水注和扁壶，舒展的莲花纹青花大盘等，确实使人看了有流连忘返之感。

这些曾经是阿拔斯大帝的搜集品，后来他捐给了后面还要说的伊朗西北的阿尔德比勒灵庙，后来到了巴列维王朝，这些瓷器又被送回德黑兰，其中一部分又还给了伊斯法罕，即这些收藏品的故乡。

阿拔斯大帝曾在明朝从中国招聘了三百名陶工，在伊朗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制作了青花陶器。这真不愧是艺术之国的波斯，大帝的搜集品如实地反映出他的欣赏能力的高超。

暂时先放下厄尔布尔士南麓地带，再在波斯湾北侧的扎格罗斯山脉北麓寻找一下中国陶瓷吧。这里也找到了几个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

一个是以中世纪大诗人萨底和法非兹的故乡而知名的伊朗

---

* 三杉隆敏：《寻求海上丝绸之路》152页。

西南部的玫瑰城设拉子附近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Qasri-Abu Nasr）。第二个是设拉子南边的菲鲁兹阿巴德（Firu-zabad）。第三个是埃兰地方的古都苏萨（Susa）。

加斯里·阿布·纳斯尔是密特罗波里坦博物馆调查过的遗址。看了前述伊斯兰美术负责人格鲁贝氏所赠的照片，其中出土的六片中国陶瓷残片包括宋、元时代的青瓷和青白瓷两种。菲鲁兹阿巴德是从设拉子的亚细亚研究所的捷古拉克氏那里听说的，据说那里散落着不少宋、元、明初的各种陶瓷片。至于苏萨陶片，是法国发掘队在发掘苏萨遗址时发现的。据可古兰氏说是白地铁绘草花纹的陶片*。古兰氏认为这唯一的一块陶片可能是唐代的，但我认为这样断定还有困难。

阿尔德比勒的陶瓷

关于伊朗的介绍太长了。现在再接着说一说由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相会而形成的重叠山地伊朗西北部和中国陶瓷的关系，来结束这一部分吧。

伊朗西北部是草原、山地、溪谷、湖泊互相交错的广阔的高原地带。从这里越过北部的阿塞拜疆就可以到高加索，越过西边的扎格罗斯山脉，就可以到达安纳托里亚或美索不达米亚。由于有着这种地理条件，自古以来就不断有各民族的入侵，不断地更换统治者，并且创造了各个时代的独特的文化。

纪元前一千年左右，这个地方的北部有繁荣的乌拉尔图青铜文化、扎格罗斯山中的拉里斯坦的动物图案文化、里海西南的山脉地带发现的阿穆拉舒的初期金属器文化等，这些文化遗物

* R. Koechlin: La Céramique Musulmane de Suse an Musée de Louvre. Syria, 1928.

都十分新颖，引人注目。

伊朗西北部的大湖乌尔迈（雷扎耶）湖的南面有个叫做塔克提苏莱曼（Takht-i-Sulaiman）的部落。虽然地处偏辟的山区，但这里却有重要的帕提亚·安息时代到萨桑时代的遗址。德国中东考古学研究所的诺曼博士（Rudorf Naumann）一行，连年在那里发掘。但这里到了伊斯兰时代，就已经不是什么大部落了。

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第五次国际伊朗美术考古学会议时诺曼博士曾对我说：从这个遗址出土了外侧有棱状竖条花纹的中国青瓷片。大概是南宋、元代的青瓷吧。果真如此，那么在这伊朗西北部的偏僻之地也运来了青瓷，其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岂不令人惊讶！

更使人吃惊的是在接近苏联边境的阿尔德比勒灵庙中收藏着很多中国陶瓷名品（图版一六：下）。

阿尔德比勒也是位于伊朗西北高原中的一个小城市。从阿塞拜疆地区的重镇大不里士顺着到里海沿岸的边境城镇阿斯塔腊（Astra-khan）去的路东行，途中就是阿尔德比勒（Ardebil）。这条道路穿插在高原、山地、溪谷之间，不太好走，但到了阿尔德比勒就是高原的尽头，从这里去里海就是弯弯曲曲的下坡路了。

这个城市在萨桑王朝时代兴起，到了倭马亚王朝时代曾是阿塞拜疆地方的省会。另外，它也是在近代伊朗创立了强大的波斯国家的萨非王朝的祖先谢克·伊斯哈库·萨非·阿尔丁（Sheikh Ishaq Safi ed-Din ？—1334），即萨非·阿尔丁的诞生之地。

为了夸耀光辉的历史，在这个城镇的广场上建立了萨非·

阿尔丁（Sheikh Safi）的灵庙，也就是以他的坟墓为中心建造的富丽堂皇的清真寺。

萨非王朝（1502—1736）崛起后，这个灵庙作为祖先的灵地受到尊崇，特别是在有名的阿拔斯大帝（1587—1629）时，不仅大为扩建，而且还在清真寺的一角建造了中国陶瓷收藏室（Chini-Khāneh），把当时最珍贵的中国陶瓷一千六百余件捐献到那里（1611）。

其后约三百年间，阿尔德比勒和萨非·阿尔丁灵庙收藏的精美的中国陶瓷一起闻名世界，成为许多外国游客探访之地。但这里接近俄国国境，有被侵略、掠夺的危险。为了防患于未然，再加上灵庙处于偏僻之地，收藏品易于散失等原因，到巴列维王朝时，除去已十分破损的几百件之外，其余均移到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并在那里开辟了一个特别展览室。

这是一个十分及时的措施，它不但保证了贵重品的安全，而且还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到边境的阿尔德比勒就不能观赏或调查那些精美的中国陶瓷的状况，如今在德黑兰就可以看到了。

阿尔德比勒灵庙的中国陶瓷，到底是阿拔斯大帝的收藏品，确实是精美无双。仅仅看到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一个陈列室就会使你留连忘返。这些陶瓷的时代是从南宋开始，有元朝的，直到明代前期为止。这是因为这些陶瓷是阿拔斯大帝于1611年捐献的。

这些陶瓷的种类包括南宋、元代的龙泉窑青瓷、南方的白瓷、元代的枢府瓷和蓝釉瓷、贵重的元青花和明初青花，还有元代、明初珍品蓝地白花的青花和五彩以及五彩描金器。器形有水注、梅瓶、大罐、小罐、扁壶、碗、大盘等许多种。特别是腹部为透雕的五彩描金水注和四方形双耳扁壶，以及瓢形水匜和称为

“军持”的具有乳房形注口的水注等，形状非常希罕。虽然每件元代青花瓷都是稀世的珍品，这里竟有三十七件之多，简直是目不暇接（图版一七）。

总之，这些陶瓷真不愧是阿拔斯大帝的收藏品，形式大方，造型典雅，色调和花纹也都精彩，真是精美无双。实在是帝王收藏品的代表。其中也有中东之外看不到的花纹装饰。这点和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是相似的，但从质量上看使人感到阿尔德比勒的藏品更高一筹。在伊斯坦布尔的收藏品那一章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内部贴有花纹的那种碗，此地也可以看到。但福建、广东一带的瓷窑制造的专为出口用的粗糙的盘子、碗之类的东西则一件也没有。

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优质品却都有点残缺，稍微带些裂纹擦伤的也不少。从这些磨损推测，有不少瓷器是使用过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收藏者的标记。这些标记多是用阿拉伯文字把阿拔斯的名字用点线刻成的。这是巧妙地把文字排成方形，就象印章一样，也可以说是一种装饰。

无论哪件，都是价值数百万乃至数千万（日元）的珍品，确实值得一看。

从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期间，这里进口的如此精美的中国陶瓷，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了。

关于阿尔德比勒灵庙的中国陶瓷，这里向读者推荐华盛顿的富利尔美术馆的波普氏（John Alexander Pope）的著作 Chinese Porcelains for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1956一书，此书记录了他出色的研究成果。

伊朗西北部的中国陶瓷，在其他地方如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里也有陈列品。那里有青花、白瓷、五彩、青瓷以及

釉里红等，其中元末、明初的青花大盘、梅瓶、碗等都是光彩夺目的上品。

这些可能都是阿塞拜疆地方的清真寺和豪门宅邸的收藏吧。果真如此，那么还会有陆续不断的新发现。我们在高兴地期待着。

另外，在与伊朗阿塞拜疆接壤的苏联属阿塞拜疆地区的诸遗址，如卡巴拉、阿兰、卡拉、古格养希城、巴库等地据说也出土了精美的中国瓷器。其中有通称为“马尔他邦”的浅绿色瓷器，可能是明代龙泉窑青瓷吧。这些遗址见于中国发行的《历史研究》1958年第二期所发表的汉译的寇瑟氏（A.C.Б.Кызы）《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一文，但遗憾的是，除了面临里海的巴库以外，其他遗址不知道究竟在何处。

但不管怎样，在高加索山脉以南的苏联阿塞拜疆的诸遗址中，也发现了中国明代青瓷，这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还有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清朝的瓷器大量向中亚细亚各国出口一事，在永贵的《回疆志》卷四和椿园七十一的《西域见闻录》卷三“哈萨克”条中记载得很清楚。关于当时的出口情况在佐口透氏的《俄国和亚洲草原》（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一年）一书中也多处提及。

七　印度河口的废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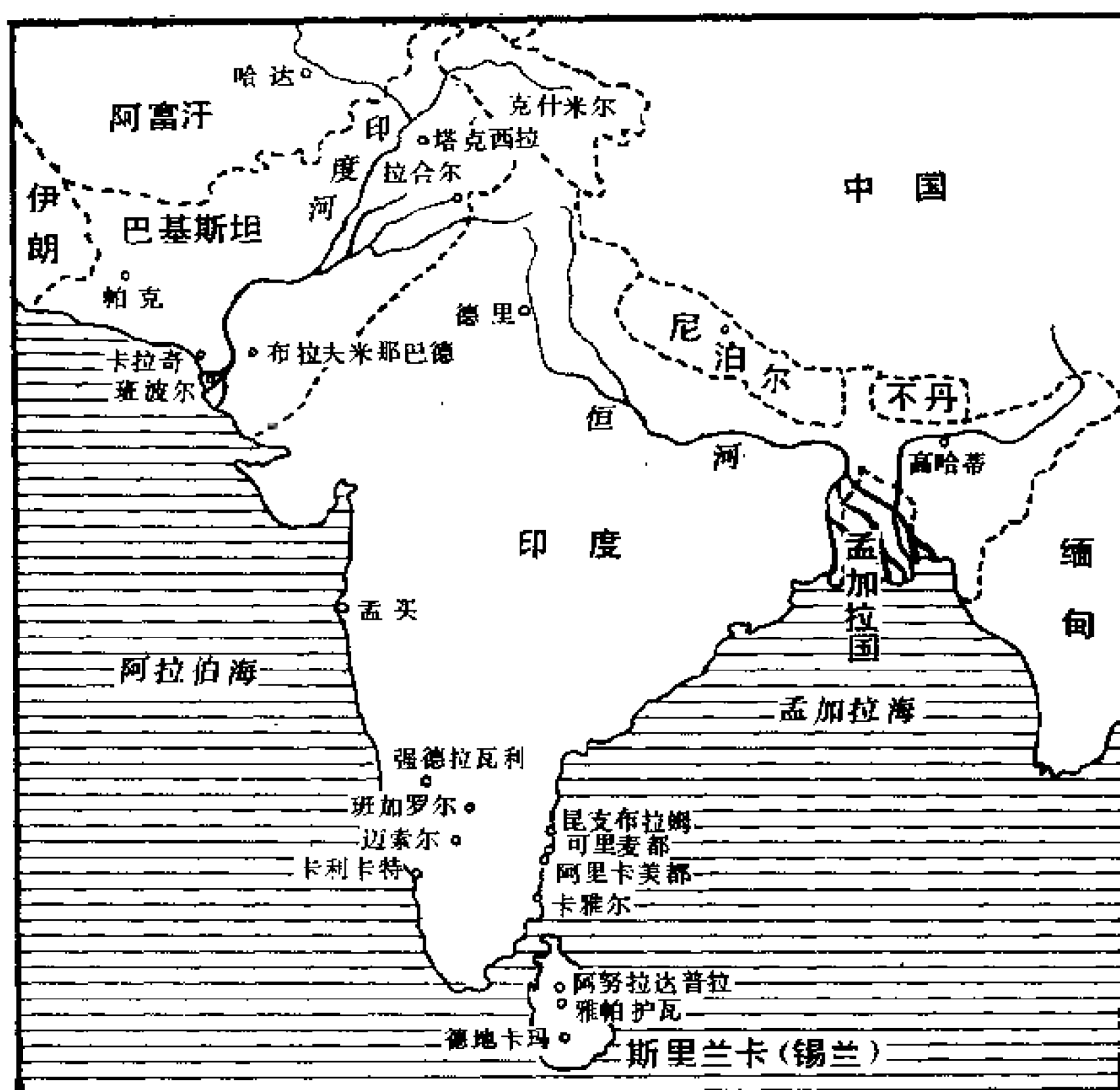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交通和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没有海，而且多山。它的北半部是四季积雪的兴都库什山，其间纵横交错着很深的山谷，在五颜六色的山岩和流水衬托下，显得异常优美。南半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草原。连接东西方世界及南北地区的商路，就纵横交错在这起伏陡峭的山地中。

那么经过阿富汗的商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呢？从伊朗越过东边的国境进入阿富汗，然后经过阿富汗的北侧前行，不久便分成两条路：一条是通向东北方向的中亚细亚的路，另一条是通向东南方向的巴基斯坦的路。前者（通向中亚细亚的路）可经过帕米尔和天山山麓到中国，后者（越过苏来曼山脉去巴基斯坦的路）可一直到达南亚细亚的宝库印度。此外，从伊朗向东南走，经过阿富汗南部，穿过阿拉伯海沿岸的俾路支，还可以到达印度河下游地区。

反过来，从中国或印度向西方的伊朗地区和地中海海岸方向去的旅客，则多半是先进入



哈达
阿富汗
印度河
克什米尔
塔克西拉
拉合尔
中国
伊朗
巴基斯坦
帕克
德里
尼泊尔
卡拉奇
布拉大米那巴德
班波尔
不丹
恒河
高哈蒂
印度
孟加拉国
缅甸
孟买
阿拉伯海
孟加拉海
强德拉瓦利
班加罗尔
昆支布拉姆
迈索尔
可里麦都
卡利卡特
阿里卡美都
卡雅尔
阿努拉达普拉
雅帕护瓦
德地卡玛
斯里兰卡（锡兰）

阿富汗，然后再向西走。

这样的阿富汗地区，尽管现在仍有着内陆国家的困难，但在过去则是联结东西贸易通路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转地，曾是骆驼商队集中的地区，物资交流也很频繁，同时也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文化。甚至有人把古代、中世纪的阿富汗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再看从中国去印度的人，如四世纪的求法僧人法显和七世纪的僧人玄奘，也都是经过阿富汗进入天竺（印度）的。

中国的物资也很早就经过这里，向南或向西运出。关于这一点，考古学方面的事实依据也有若干。首都喀布尔北面有倍姑拉姆遗址，这里有在二世纪贵霜王朝时代的夏日离宫遗址和健陀罗美术以及大乘佛教关系很深的迦腻色加王（约144—173年）曾在这里避暑。从这个王宫的宝库中发现了许多当时的印度工艺精华：精致的印度象牙雕、优质华美的罗马琉璃器、青铜像等，里面还夹杂着中国汉代漆器。附带说一下，在邻国巴基斯坦的贵霜时代的城市遗址塔库西拉，还出土了中国汉代玉制的刀剑饰件。

汉代以后，中国和中亚细亚的关系逐年增进，因此中国的很多物产运往该地是毫无疑问的。中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也肯定会被此地的皇家和豪门巨室使用。不过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正式报告和论文。

在这里只讲一讲有关此地与中国陶瓷的关系的一两件事吧。第一是夏里·格尔格拉的废址；第二是首都喀布尔的见闻。

被称为夏里·格尔格拉（Shari-Ghorghora）的这个奇妙名字的遗址，位于阿富汗中部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巴米扬盆地。

提起巴米扬（Bamiyan），无论谁都会立刻想到盆地北侧

断崖上的无数石窟寺院，以及立在寺院群东西两侧的巨大佛像。当你看到凿开石壁制作的高大的佛像，西边的大佛高53米，东边的大佛高35米时，一定会对它的高大惊叹不已。象我们这样的身材还够不到大佛的下襟呢。虽然大佛的面部被后来征服此地的伊斯兰教徒毁坏殆尽，但头上的棚顶还残存着佛、菩萨和太阳神的壁画，比起法隆寺壁画更古老，这种博得信仰的美，真是令人赞叹。

虽是长途跋涉而来，但到这里一看确实感到不虚此行。《大唐西域记》的作者玄奘巡礼到此地时，也拜过这尊大佛。据他的记载，当时佛像涂满金色，全身光芒四射。

由于大佛和石窟寺院而闻名世界的巴米扬盆地，是山峦重叠的兴都库什山中的一块难得的宽阔盆地，盆地的中央有个圆锥形小山丘。这个山丘的所有山坡全被倒塌的废屋覆盖着，山顶上的清真寺也仅仅残存着部分尖塔。顺着盘山小路而行，在废墟中可以看到零散的波斯陶器残片，有时还会看到小块的白骨，使人毛骨悚然。向导一般也不喜欢来这里，恐怕是认为这里不吉利吧！

这也并不奇怪，这个遗址从前是巴米扬国的都城，在1221—1222年这段时间内，遭到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军队的毁灭性的破坏。当时的巴米扬国富兵强，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吉思汗的孙子也战死在这里。于是盛怒之下的成吉思汗亲自率兵攻城，并进行了残杀。“夏里·格尔格拉”的意思就是“鬼之城”，说明了当时杀戮的残酷。

1956年的5月，我在废屋的地面上拾到了散落着的波斯陶器。发现这里也有阿拉伯风格的饰以绿彩线刻纹的漂亮的瓷片，但遗憾的是没发现中国陶瓷。可是在60年代初期，访问这

个遗址的菊地三郎氏却在他搜集的陶片中发现了一片小的青瓷片，那是十二至十三世纪左右的龙泉窑青瓷片。这样，青瓷在阿富汗也总算发现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在访问阿富汗时，我记得该国著名的考古学者柯扎德氏(Ahmad Ali Kohzad)曾对我说过：在巴米扬附近，同样是被成吉思汗灭亡的夏里·佐哈克(Shari-Zohak)废城里也出土过中国陶瓷。但是，属于哪个种类以及什么时代的产品则不太清楚，所以我只能半信半疑。既然后来从夏里·格尔格拉出土了青瓷片，那么，从夏里·佐哈克出土中国陶瓷也就不足为怪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首都喀布尔大街上的一个商店的事。

在喀布尔的街市，有许多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都是砌着厚泥墙的二层楼房。街上的行人稀少，常常只有自己的身影陪伴自己。在稍微热闹一点的街道上，有临街的小作坊，里面的手工匠人一面看着外面一面干活。城市充满着浓厚的中世纪风味，但在沿着喀布尔河的一个区域，也有现代化的大街，在那里可以看到摆着高级商品的商店橱窗。

在这个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大地毯店，进店可以看到华丽的红色阿富汗毛毯，在毛毯的后面有几个明代青瓷大盘。那是稍带朽叶色的深绿色的盘子。在盘的底足内面，用点线刻着收藏者的阿拉伯文名字。这和伊朗的阿尔德比勒收藏品中的中国陶瓷上刻着的印章文字是同一性质的。在阿富汗也是所有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从这些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器物是多么地珍视了。这个商店里的青瓷大盘，可能来自附近的清真寺或富豪家中。由此可以推测在十四至十五世纪左右，青瓷已经运到这里，这恐怕是不会错的。

因为我还要继续很长的旅程，所以想买又不能买，犹豫了

一阵只好作罢。这件瓷器被当时住在喀布尔的斋藤积年氏买去。在十三年后的今天，这件青瓷是否安然到了日本，我多么想再看到它呀！

在阿富汗，恐怕还有不少尚未发现的埋藏着中国陶瓷的遗址吧。我由衷地希望这些陶瓷能够尽早地重见天日。

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

清早从喀布尔乘公共汽车出发，越过拉达旁得山峰，往东从高原而下，不久便到了索罗比（Sorobi）水库。流经狭窄的索罗比山谷而下的喀布尔河无比壮观。从悬崖小道上眺望着冲击岩石的激流，真使人忘却了时间和危险。不久，车开进了平地，那里的河流和田野也变得十分平静，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的绿色的谷地。就在这个地区有因发现很多富于魅力的佛的塑像而闻名的哈答（Hadda）遗址。本来哈答离高速公路较远，要到那里去必须从基拉拉巴德（Jelalabad）往南拐。面临国境的重镇基拉拉巴德的夏天的炎热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甚至被说成是临近死神之城，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在那里确实是不透风，十分闷热。看来这附近的哈答也同样是夏天不好过的地方。

过了广阔的基拉拉巴德盆地再稍往前行，道路变成了上坡路，不久就到达了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从中亚细亚向印度河流域移动的印度雅利安人和公元前四世纪末的东方远征者亚历山大，以及十九世纪中期的阿富汗战争（抗英）时，侵入该地的英军，他们都是从这个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山口通过的。山顶西侧是阿富汗，东侧是巴基斯坦的大平原。

巴基斯坦的中国陶瓷

巴基斯坦原来和印度共和国本是一个国家，后来在1947年同印度分开，成立了伊斯兰教国家。由于印度河的冲积而形成的肥沃土地，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

巴基斯坦全国分为几个地区：一个是面临阿拉伯海的干燥的南部的卡拉奇地区；一个是北部草原，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出现在历史舞台的白沙瓦·塔克西拉地区；再一个就是喀拉昆仑山脉环抱中的吉尔吉特地区。这是一个无论在地理和历史上都是变化多端的南北狭长的国度。

而上面说的各地方的共同点，是都处在南亚通往西亚的出入通道。从纪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文明时代起，就把这个地方作为中转站，将南亚地方各色各样的物品一直运到西方。其中有棉布、宝石、香辛料等。在中世纪以后，还增加了中国陶瓷。

面临阿拉伯海的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大门。围绕海港的是寸草不生的沙漠，但是渡过印度洋的物资，却从西方和东方运到这里，然后再运往内地，或者再分散到阿拉伯湾的各个海港。

卡拉奇是近代才繁荣起来的海港城市。在中世纪也起同样作用的地方，则是面临阿拉伯海，距离卡拉奇不远的废港斑波尔（Banbhore）。

下面谈谈斑波尔遗址的中国陶瓷。

卡拉奇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但郊外却是一望无际的沙地，生长着零零星星的灌木和矮草，是一片荒芜的土地。散布

着一些聚落和城镇。

塔塔（Tatta）是有名的宗教城市，在卡拉奇东面约110公里、靠近印度河，是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少见的风景优美地区。在那里有壮丽的印度、阿富汗式样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圣者的华丽陵庙，前往巡礼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

斑波尔城市遗址在卡拉奇到塔塔道路中途过了一半再往南拐不远的地方。虽说不远，离卡拉奇也有64公里。所以说使人感到不那么远，恐怕是用大陆上尺子来衡量的缘故吧！

站在遗址中央的小土山上一看，南边是通往阿拉伯海的盖罗小河港（Ghato Creek），河对岸是一片泥地，再往前朦胧之中可以看到青色的阿拉伯海。在烈日下，站在杳无人烟的废墟上，深感历史无情，人生短暂。遗址的中央部分由于一再重建，长期使用，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山丘。这个城镇从公元前后的贵霜时代起，就作为一个面临阿拉伯海的海港繁荣起来。发掘中央部分的土丘一看就发现贵霜时代的地层相当厚，所以发掘者本身也同意这种看法。

但到了八世纪初，这个城镇也被东进的伊斯兰军队占领，变成了他们的据点。据记载，712年伊斯兰教徒莫哈默德·宾·卡西姆（Mohammed bin Qasim）夺取了印度河口的重要海港德巴尔（Debar），于是这个城镇就落入伊斯兰手中。这个废墟想必就是那个德巴尔。

到了萨拉森帝国时代，随着波斯湾、印度洋贸易的繁荣，这个港口便成为控制阿拉伯海入口处的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前面提到过的中央小土丘，外面是连雉接堞的坚固的石砌城墙（图版一八：上），城内还残留着清真寺和其他许多大建筑。四面的城门都呈正方形，十分坚固。靠海的门能直通到海港的船坞。

城墙外面是街市，泊船的码头就在街市旁边。临街的一角有个门前摆着一排大染缸的店铺遗址，说明此地特产的棉布类是染成各种颜色之后才向东、西方出口的。往来于南海的阿拉伯船上的人们，进港卸货后，便去闹市游逛一番，然后再装上新商品，向东或向西启航。然而这样繁荣的城市却在十三世纪以后急遽萧条下来，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或者是由于印度河口位置变化的缘故。

巴基斯坦是个伊斯兰国家。因此，这个在萨拉森帝国时代曾起过重要作用的遗址不可能不被重视。于是由于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从1958年以来开始了对斑波尔的发掘调查。发掘的负责人是以康博士（F.A.Khan）为中心的巴基斯坦考古局的学者们*。

结果查清了城市的规模和历史，以及经济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能够证实以上情况的出土遗物中，也发现了一批中国陶瓷。

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是很使人感兴趣的。首先是晚唐的越窑瓷的水注，正好说明早在九世纪左右，中国陶瓷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另外还发现了同一时代的器物，长沙窑制作的黄褐釉上有绿彩花草纹碗的残片，这也是很少见的（图版一八：下）。长沙窑的瓷器在出产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参照图版一四：下）。现在这种陶瓷器能从斑波尔出土，这就帮助我们查清了在

---

* F.A.Khan: Banbhore,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Banbhor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 Revised ed, 1963.

九世纪时连接印度尼西亚和伊朗之间的陶瓷之路的路线，这是非常难得的。同时，还证实了长沙窑是专为出口而生产的，所以使用的颜色、图案等和一般的中国陶瓷不同*。

至于十至十三世纪的宋代陶瓷也不例外，无论数量和种类都很多。有线刻花纹的宋代初期越窑瓷的残片和覆莲瓣纹的华南白瓷片，还发现了宋末元初的龙泉青瓷片。这类出土陶瓷在中东无论哪个遗址都有发现，可以说比较一般。此外，还找到了可以看作是华南的广东省制作的黄釉四耳罐的残片。与此相同的残片，我在红海岸爱扎布遗址也拾到过，因而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这些遗物如今陈列在卡拉奇的国立博物馆和斑波尔的遗址博物馆。总之，这些不会说话的陶瓷片证实了从九世纪起到这个城市的衰败为止，中国陶瓷一直接连不断地输入到这里，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国陶瓷运到这个印度河口旁的港口要经历多少旅途颠顿。虽然是一块块小小的碎片，却也都象是一页页的记录纸，录写着旅途艰辛，使人感慨生哀。

运进斑波尔的东亚商品，进一步逆流而上，沿着印度河运往内陆或运往阿拉伯海沿岸各地。

下面再讲一讲布拉夫米那巴德。

前面谈到斑波尔离印度河河口很近。印度河是巴基斯坦的生命。以这条河流为中心，曾经兴起了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印度河文明，同时，它还供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无数生命所不可缺少的水。不仅如此，这条河还是连接阿拉伯海和印度河内陆的一条广阔的水道。

---

*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文物》1960年第3期，"中国二千年之美"展览会目录，1965年。

由印度河口上行，在信德省的那瓦布沙(Na wābshah)县，有布拉夫米那巴德（Brāhminabād）城市遗址。它在信德省府所在地海德拉巴的东北面约80公里处，几乎到了边境。这里曾经是印度河故道的河畔，在七至十一世纪曾是印度河一带的商业中心，相当繁荣。但由于1020年发生地震，这个城市几乎全部被摧毁，据说只剩下几个小村落。因此，这个城市遗址的出土物应该都是十一世纪前半叶以前的器物。

由于这种特殊原因，这个遗址被人们所重视。早在上一世纪的1854年，贝拉西斯氏（A.F.Bellasis）和李查德逊氏（C.M.Richardson）就进行了调查*。其后，这里发现的许多陶瓷片均被运到大英博物馆。当时研究中国陶瓷的最高权威霍布松氏（R.L.Hobson）曾对这些陶瓷片加以鉴定，从中发现了中国青瓷和白瓷以及褐釉陶瓷片，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霍布松氏把这些陶瓷片按照器形、釉色、质地等分成六种类型，但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方法有些不妥。根据他论文中的照片来看，其中也有的好象是九世纪的越窑瓷的残片。总之，其时代的跨度大致是由九至十世纪的唐末、五代到十一世纪前半叶的宋初。

我没有亲眼见到这里出土的陶瓷片，所以不能说得很肯定。但不管怎样，把中国陶瓷运到这样远离海岸的城市，这对了解中国陶瓷向内陆运输的路线确是很重要的线索。在布拉夫米那巴德的中国陶瓷中，以斑波尔港为中转站运到这里来的也一定不少吧。

---

* R.L.Hobson: Potsherds from Brāhminabād（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28—1930）.

最后再讲一讲旁遮普和莫克兰地区的中国陶瓷。

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的几处还发现了十五世纪前后的明代青花瓷小片，这是斯坦因博士采集到的*。由此可见，中国陶瓷是从印度河口附近的班波尔逆流而上到布拉夫米那巴德，再扩散到旁遮普地区的。

除了这条沿着印度河向西北延伸的路线之外，我还必须说一下运到巴基斯坦西部的俾路支的面临阿拉伯海的莫克兰地区的中国陶瓷。1927年至1928年间，访问该地的斯坦因博士在莫克兰地区山中的克鲁瓦地区（Kolwa）的帕克遗址（Pak）找到了一片中国陶瓷片**。另外他在1931至1933年间的调查旅行中***，在莫克兰地区的几个地方，还发现了十世纪左右的青白瓷。由此可知，中国陶瓷是沿着阿拉伯海岸西行，最后被运到伊朗的各港口和内陆的。

那么，以班波尔为中心，运到巴基斯坦的中国陶瓷，在这以前又是经由哪些地区运来的呢？所以，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印度和斯里兰卡。

---

* R.L.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āb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Appendix A.Lordon, 1937)..

** A.Stein: An Archaeological Tour in Gedrosi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43, Calcutta, 1931).

*** R.L.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āb.

八　南海的青瓷

——从印度到斯里兰卡

在迈索尔邦

1955年12月，我来到了印度南部以史迹和美术闻名的美丽的迈索尔邦。那里风光明媚，使人舒畅。10月初我从德里出发南行，经由中央邦、孟买邦、海德拉巴邦，一直南下到达迈索尔邦。途中我的心不止一次地被印度社会深沉的阴影笼罩着。生活在印度社会的印度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印度大自然的壮丽和严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有着漫长的、变化多端的历史，支撑着它的人民，为了生存而在不断发出呻吟和呼号。

毫无疑问这是印度人自身的面貌。同时又是周围地区各种血缘的大融合而形成的奇怪而巨大的形象。波斯、中亚、阿拉伯、欧洲、蒙古、印尼，还有中国和中国的西藏都留下投影与烙印。简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异样的社会！但如果深究下去，也说不定会给你意外的发现，也许真能在瓦砾堆中发现明珠，所以印度又是使人感兴趣的社会。

我仿佛一个人在无底沼泽跋涉，每天重复

怀着期望，和持续的高度紧张。劳累了一整天后，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床上，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情况，就这样半喜半忧地入睡了。

在这样的处境里，我幸运地由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来到了迈索尔邦的首府班加罗尔。

为什么我会这样舒畅，一下子也说不明白。首先和北印度、德干高原的粗犷的风貌相比，南印度迈索尔邦则是一片绿色的原野和无数稻田，给人以柔和、安闲的感觉，再加上这个班加罗尔镇有一个宁静的市容，而且提供给我作宿舍的铁普·斯尔丹旧宫殿又是一个幽静的历史建筑。而尤其使我难忘的，还是印度政府考古局驻班加罗尔的监督官纳他拉将氏对我的热情接待。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他陪同我一起进行历史和考古调查。

我到遥远的迈索尔邦来，是有几个目的的。第一，一定要参观那许多有名的历史文物和博物馆；第二，要参观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南印度的古代巨石建筑——多尔曼形石墓、环状石篱和巨石柱，同时还要了解当时有名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昌德拉瓦利（Chandravalli）的情况。

我们离开了班加罗尔先向西走，访问了当时不大有人去的贝路尔（Belur）和哈来比德（Halebid）。这些都是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曾经在南印度繁荣一时的霍伊萨拉国的都城遗址，现在在安静的农村的田野里留下了一片片废墟，那墙上画满了神采奕奕的神像的星形结构的信德寺院静静地横卧在那里。

这次绕道到贝路尔，为的是从这里进山去昌德拉瓦利遗址，但到了贝路尔一看，那里却是迈索尔邦和海德拉巴邦的交

界，交通非常不便，再加上纳他拉将氏也没有时间，结果没有去成。

随后就进入迈索尔。这个古都正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幽雅安静的城镇，同时也是印度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建设起来的热闹城镇。过去迈索尔王的宫殿现在成了故宫博物馆，那里陈列着王宫的收藏品，其奢侈豪华的程度真使我大吃一惊，可我还看到了陈列品之一的用红皮穿连的日本铠甲，可是在该插刀的地方却插着一支手枪，几乎使我失笑。可见这里对日本的了解不过如此（图版一九：上）。

昌德拉瓦利的中国陶瓷

迈索尔城里还有一个博物馆。是邦立考古学博物馆，那里保管着昌德拉瓦利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东西。我到了那里，把石器和陶器拿起来看了一番，还在昏暗的墙角发现了随便扔着的几块很脏的纸板上贴着的几枚陶片和古钱。看起来有些眼熟。

我靠近仔细一看，果然是宋代的龙泉窑青瓷片两片、白瓷片一片——当时看成是磁州窑的，实际上可能是华南的福建、广东等地的白瓷，还有大概是中国南方制作的黑褐釉陶片一片，和北宋神宗（1068—1086年）时代的“元丰通宝”放在一起。博物馆对这些遗物是什么全然不知，都当作“不详待考”之物扔在那里。

我瞪大眼睛仔细查看一下出土地点，上面写着昌德拉瓦利遗址。后来知道昌德拉瓦利还发现了罗马时代的货币。如果是这样，昌德拉瓦利不仅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有重要价值，而且在罗马时期的古代、十世纪以后的中世纪也是重要之地。

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用附近出产的高质量的绿松石等宝石，把罗马、中国等远方出产的珍贵物品吸引到这偏远之地来了。

昌德拉瓦利的中国陶瓷——我盼望已久的朋友，没想到竟在这里相遇，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这的确是发掘品。这些瓷片又是和有北宋元丰（1070—1085年）年号的货币一起发现的。可能是宋代运到印度港，再运进迈索尔邦的内陆来的。

以上这些证实了萨拉森帝国的商人在跨越东中国海、印度洋、阿拉伯海三个海洋的活动中，把龙泉窑青瓷、华南各窑的白瓷以及黑褐釉陶从杭州、泉州港装上船，然后运往南方各国。

在迈索尔遇到了中世纪的中国陶瓷，这使我如释重负。在遥远的埃及、东非海岸的各城市，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遗址中都已发现了早在九至十世纪的越窑系的青瓷和白地褐釉的长沙窑瓷器，以及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宋代青瓷、白瓷、青白瓷。然而在前一段的印度旅行中，只在孟买、海德拉巴的博物馆看到过十四至十五世纪以后的青瓷和青花瓷，比这更早的东西却一直没有接触到，真使我有些奇怪。可现在却意外地遇到了正在寻找的十四至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陶瓷，怎能不使我高兴呢！

我带着这种喜悦继续着南印度的旅行，当到达科罗曼德海岸的本地治里后，收获就更多了。

科罗曼德海岸的中国青瓷

南印度的科罗曼德海岸，有一个尽人皆知的马德拉斯城。这确象是英国人建造的城，是一个有着成排坚固的红砖楼房的幽静城市。现在航空发达了，所以这个城市不再象过去那样被重视，然而这里曾经是印度洋著名的海港，如今在印度也是屈

指可数的。

从马德拉斯乘火车沿着海岸往南走六小时，有一个叫本地治里的城市。这里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才归还印度。当我1955年底去这里时，城内还有半数戴着法国式帽子的警察和半数印度警察各自在街上巡逻。虽说幽静得有些冷清，然而确实美丽，真有点法国味道。它和那坚固的仓库式的马德拉斯形成鲜明的对照。

据说站在这印度洋浪花翻滚的海岸上，法国人想起他们祖国比斯开湾的情景，勾起无限乡愁。

从此再往南走20公里左右，在海岸附近有个叫阿里卡美都（Arikamedu）的村落。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这里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年）时代起到二世纪末曾是罗马人居留地，如今在椰子林之间还残存着它的遗址（图版一九：下）。这个市镇当时好象被称为波都开（Pōdoukè），当时的房屋遗址还寂寞地残留在河边一带，地面和墙壁的残迹散布在河岸或沟边。这一带仿佛还凝结着二千年前那种冒险的通商精神。集聚到这一带的罗马人，把铜、锡、玻璃和罗马独特的阿累泰因陶器，还有葡萄酒等运往印度，而从印度买回宝石、珍珠、象牙、玳瑁和胡椒、木棉等，运到罗马属下的东方各地和波斯。

因此，在这个遗址可以看到满地散落着的罗马玻璃和装饰品的材料，以及绿釉陶片，或染制输出木棉的染坑。我们一面拾着，一面想象着当时印度洋贸易的繁荣景象。

这个城镇在罗马人退去之后，仍继续作为海港而繁荣，直到十二至十三世纪才逐渐衰落下来。

到了本世纪，这个遗址所特有的重要性重新被人们提出

来。所以，从30年代起，本地治里的法国考古研究所的成员经常到这里进行发掘*，其后在战后的1945年又有毛尔提美尔·霍意拉博士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但从这个奇怪遗址的最上层，除了发掘出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遗物之外，还出现了完整精美的南宋龙泉窑的最佳级青瓷碗。碗是法国调查队掘出的。已被送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所以未能看到，深感遗憾（图版二〇：下）。

可是到了法国图书馆附属的小型的本地治理博物馆一看，许多中国瓷片就放在抽屉里。承蒙热情的帕达比拉明氏的关照，我作了一次调查，看到了外侧起棱状竖条纹的龙泉窑青瓷深碗残片和小罐的一部分、青白瓷碟残片，还有时代更早一些的九至十世纪的越窑碟子残片（图版二〇：上）。其中还杂有难得的北宋末的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的“宣和通宝”。因此，我们可以考虑这些东西大体上是在北宋至南宋之间，即十二至十三世纪左右运到这个海港来的。

霍意拉博士在报告中谈到，1945年在此地发掘之际，从上层和地表发现了十四片宋瓷。这些是越窑瓷和龙泉窑青瓷残片、磁州窑的陶片，而且这些是与十一至十二世纪朱罗朝的铜币共存状态下出土的***，那么，这些器物由此港进口和使用的时间，也大致是十一至十二世纪吧。这和法国调查队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使人很感兴趣。

---

* P.Z.Pattabiramin: Les Fouilles d'Arikamedu (Podouké) Pondicherry, 1946.

** R. E. M. Wheeler, A, Gosh, Krishna Deva: Arikamedu, an Indo-Roman Trading 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 Ancient India No.2, 1946.

*** R. E. M. Wheeler: Arikamedu.pp91—92.

象这样，陶片和宋钱一起出土的情况和迈索尔邦的昌德拉瓦利遗址的出土情况几乎完全相同。阿里卡美都曾是以罗马人的居住地而繁荣起来的贸易港，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直延续至中世纪，致使中国商品也能够陆续地在此地着陆。

可里麦都的收获

在本地治里附近发现中国陶瓷的地方不只是阿里卡美都，在本地治里的西北十公里左右的可里麦都（Korimedu）遗址也散落着中国宋代的陶瓷片。

可里麦都是离海岸不远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那是一片血红的深赤褐土台地，土面满是纵横交错的又深又宽的冲蚀沟。走到台地上，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散落着燧石和玉髓质的细石器（石刀和石针），与此共存的还有蛤刃的磨制石器和赤褐色的陶片。

1955年，接近年末的12月26日，我在前述法国博物馆的帕达比拉明氏陪同下来到此地。我徘徊在这个台地上，拾取着石器和陶器的残片，无意中又发现了地土散落的中国宋、元时代的陶瓷片。于是我就十分高兴地采集起来，其中有十二、十三世纪南宋时代浙江或福建省某地烧制的枇杷色珠光青瓷模样的碗的残片和结实的淡色青白釉罐的口颈部分（内面呈蛇腹状），还有十四世纪以后福建或广东一带烧制的朴素的青花残片（关于这三片陶瓷，我以前发表的文章《中世纪的中东和南亚的中国陶瓷》东方，第六卷，四号第6页中曾经写道："上了灰青釉的越窑系罐的口缘部和珠光青瓷碗的残片、宋胡录的青花碎片"，但经过调查，前说不确，应照上述说法改正）。

可里麦都现在是一片荒凉的遗址，而从散落着旧的铁器等

情况来看，这里可能存在过中世纪的部落。

既然中国宋、元时代的陶瓷在这些地方都使用过，那么中国陶瓷的传播范围之广，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此外，宋元时代的中国陶瓷，据说在流经马德拉斯邦（现称泰米尔那德邦）南端台内维里（Tinevelly）县的塔姆帕巴尔尼河口的卡雅尔（Kayal）也有出土* 。

在印度，发现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陶瓷的地点并不算多。但是，连南印度这样偏僻的边境地区都能在各处看到中国陶瓷，所以只要有明确目的地进行调查，还会在一些地方找到的。

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

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在印度也看到许多。当访问印度东端阿萨姆邦的首府高哈蒂（Gauhati）时，那里的邦立博物馆陈列着几件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破碎的龙泉窑青瓷大平碗，据说是在建设城市街区时从住宅的地下出土的。

但这时代的陶瓷，不必完全是发掘品，也有传世品。据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长巴西尔·歌累氏的报告，在印度任铁道技师的加拿大人威廉·卡民兹氏，在1864年至1883年之间，收集到六百多件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的中国陶瓷（主要是青瓷和青花瓷），其中大部分据说是奥德（Oudh，现今的北方邦即乌塔普拉德什邦的东部地区）地方官的收藏品。另外，歌累氏在论文中* * 还提到：加尔格达的律师威廉斯（N·T·Williams）

---

* R. E. M. Wheeler: Arikamedu.pp.91.

* * Basil Gray: The Export of Chinese Porcelain to In dia.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Dec. 1967.

在印度收集的一百几十件中国陶瓷，其中很多是姆尔西达巴德（现今西孟加拉邦北部）地方官的收藏品（图版二〇：下）。

在印度旅行，就会发现在莫卧儿帝国时代各地的王和地方官的城堡都变成了博物馆，担负起新的使命。几乎所有这些博物馆里都陈列着一些从十四、十五世纪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陶瓷。这些可能是过去的王或地方官的收藏品的一部分。在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的尼札姆故宫博物馆的一个陈列室中满满当当地陈列着这些陶瓷，简直多得使人望而生厌。

不仅故宫博物馆，还有孟买的威尔斯王子博物馆（Prince of Wells Museum），这是一个专门修建的漂亮的博物馆，建在东海岸附近的一块大场地上，远远看去耸立在花坛包围之中的宏伟、颇有魅力的英国式建筑。这个博物馆以专门收集莫卧儿时代孟买派的绘画和南亚的纺织品而出名。其中也有一个陈列室，柜中也满满地摆着很多陶瓷器，这些陶瓷器以中国陶瓷为主，其中还夹杂着日本的粟田口附近烧制的名为萨摩的花花绿绿的日本瓷器。总之，这里的中国陶瓷以自十五世纪之后一直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明代青瓷和青花瓷这两种瓷器占绝大多数。

印度自古就是东西贸易海路的大中转站，它在东西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刚才谈到的阿里卡美都遗址也能看出这种重要性在与日俱增。而且西面马拉巴海岸的卡利卡特（现今科泽科德）和阔伦城，从东方来的中国商人和从西方来的萨拉森商人汇聚到这里，好不热闹。关于当时的景象，1340年左右到这里来的伊斯兰教徒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的《纪行》中曾提到，可以乘载千人的中国船来此，在这里做陶瓷交易*。从这

* Yule and Cordier: Marco Polo. Vol. I, pp.337.

些记载里也可以推测当时的盛况。经常传说在马拉巴海岸发现中国铜钱，这恐怕也与此有关吧。

同一时期中国人撰写的《岛夷志略》中也谈到了有关卡利卡特和阔伦的繁荣景象以及陶瓷器的交易活动等见闻。可见在十五世纪初郑和的远洋船队来到印度港口之后，这里情况就更详细地传到了中国。

顺着线索追寻下去，十五世纪之后印度和中国陶瓷的关系就会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中国的贸易商人把印度王公喜爱的陶瓷不断地运到这里。

在印度所见的十四、十五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几乎只限于青瓷和青花瓷，这突出地说明了当时印度贵族们的爱好。其中画有特殊纹样的青花在中国都看不到，这也说明印度人的爱好吧。

至此，印度之行的乐趣又增加了一番。

在斯里兰卡（由科伦坡到德地卡玛）

在印度洋上，作为贸易上的大中转站和中国陶瓷出土地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斯里兰卡，旧称锡兰。

在阿里卡美都遗址所在地科罗曼得海岸的远方，可以看到绿色的锡兰岛，它自古就有狮子国之称。锡兰从阿育王时代就成了连结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东来西往的船只都在这里停泊。

这种状态在中世纪也没有变化。因此，在锡兰发现十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在锡兰调查过的中国陶瓷出土地有下面几处。

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椰子林和芭蕉林枝叶繁茂，到处有

红花覆盖，好一派富饶的南国风光。也许是海拔低的关系，这里湿度高并且酷热，使人难以忍受。甚至在最凉爽的十二月和一月间，寝具也要被汗水湿透。

我们所关心的科伦坡博物馆占地面积宽广、房屋高大。里面除中国陶瓷器之外，还有各种引人入胜的陈列品。其中有十五世纪初郑和统率的中国明代海军战胜并俘虏了锡兰王，在此地建立的礼佛的碑碣，是很珍贵的文物。但已磨损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译按：碑文见向达校注本《西洋番国志》附录二）。

当深入到这个岛的中央，到达开阔的高原地带时，酷热的痛苦大为减轻，凉爽的风从茂密的原始森林吹来。因此，在科伦坡的斯里兰卡政府，每到夏天就移到高原的康提（Kandy）去办公。发现中国陶瓷的遗址就在这个高原地带上。

从科伦坡通向康提的道路，进入高原地带的入口处有个叫开戈拉（Kegalla）的城镇。从开戈拉向南拐，进入连绵不断的田园和森林，走八至十公里左右坎坷不平的路，就到了德地卡玛（Dädigama）。这个小村落，是一个好象几百年间一直没变的旧村落，但在这里却意想不到地树立着一座用砖砌成的古老的大佛塔，据说它是十二至十三世纪建立的。这在日本可以算是一个座落在荒野山村的大庙。从这里也可以领略佛教国的特点（图版二一）。

这座相当于我国平安朝中期时代建造的佛塔，由于长年的风雨侵蚀而残破不堪。为此，从1947年到1954年曾连年对该塔进行发掘调查和修缮。查清了塔的内部分为十个室（上一室，下九室），在室内发现了水晶制的舍利罐、金叶压印的古拙可爱的小佛像以及其它青铜制的风格高雅的灯盏等。

与此同时，从佛塔的外围找到了很多中国的宋瓷片。这些

陶瓷片现收藏在附属于遗址的小陈列馆中。我调查了这些瓷片，发现其中最早的是十四世纪前后的越窑系瓷碗的残片，其次是十二至十三世纪最精美的南宋龙泉窑青瓷碗的几块残片，还有颜色清雅、小巧玲珑的青白瓷柑子形小罐和四足小香炉的一部分等。另外，还有中国南部福建、广东一带的窑口烧制的黄釉四耳罐的残片•。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高兴得连照像的手都要挥舞起来。

这些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在锡兰山中的佛塔前看到这样漂亮的青瓷片，比起在埃及尼罗河畔接触到的中国陶瓷，有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不知道奉献这些东西的究竟是锡兰的信徒呢，还是信奉佛教的中国商人。

雅帕护瓦的遗物

在德地卡玛的所见打开了我的眼界，并启发我去调查在雅帕护瓦（Yapahuva）发现的中世纪中国陶瓷，于是我进一步深入到高原内部。

雅帕护瓦在锡兰北部重要城市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以南约八公里的地方。近旁有坚固的马豪城堡（Maho Fort），雅帕护瓦的城市遗址在这个城堡以东四、五公里处，中央有巨大的石山，周围圈着高高的护墙，当敌人进攻时可以关上门站在石山上防守。在锡兰，这种形式的中世纪城市有不少。

• 这是1955年12月19日笔者亲眼所见，其发掘报告书为：S. Paranavitana: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Ceylon for 1947、48、49、50、5 、52、53、54、及Dädigama, Memoirs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Ceylon, Vol Ⅶ 1955年。

譬如在刀切般的岩壁上装饰着鲜艳的壁画的有名的西儿利亚的城市遗址也和这里一样。

雅帕护瓦在世界大战前的1911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进行过两次考古学调查，结果在这里发现了极其美丽的中国宋、元时代的陶瓷和1,364枚同时代的中国铜币*。

在1911年初次调查时，从南门遗址发现了12枚北宋和南宋的中国铜币；其后在1949年，又在现在的僧院前和东门附近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多达1,352枚中国铜币。在东亚以外的地方，在一个地点集中发现这么多的中国货币，除此之外再无别处。如果是靠海岸的港口城市还不稀奇，而这里又是山中城镇。我见到的铜钱几乎都是两宋之物，其中还有若干唐代的开元通宝和一枚元代的至元通宝（1244—1294年）。可以推算出这些钱被带到这里来的时代，是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左右。

在雅帕护瓦出土的中国陶瓷和铜币，早已送交阿努拉达普拉博物馆。阿努拉达普拉在十一世纪以前，是统治锡兰岛的都城，这里壮丽的佛教遗址林立，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也多是佳品。如果你想研究斯里兰卡美术，特别是佛教美术，那就必须得参观这个博物馆。

参观这里收藏的雅帕护瓦出土的中国陶瓷，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优美而完整的外面饰有仰葵瓣纹的龙泉窑青瓷碗。这确确实实是南宋时代十二世纪之物，口径21厘米，高9.3厘米，是一件大小适中的器物，可以说是为日本人赏识的上等佳品。我走过亚洲各地，见过相当多的龙泉青瓷系的出土品，但无论器形、色调，如此完美的实在少见。由于长期埋在土中，有些

---

* D. T. Devandra: Guide to Yapahuva, Colombo, 1951.

风化，但仍令人赞叹。

在青瓷碗之后还应该举出大小两件青白瓷碗。两件都经过一番修复，外形完整。大的口径23厘米，高7厘米，薄胎，十分淡雅。无疑是宋代的青白瓷（图版一二）。

再一个吸引人的是橄榄色青瓷小狮子的头部，样子非常凶悍，颇有日本古瓷狮子原形之感。特别是在眼球上点了一块黑色的铁釉，使小狮子活灵活现，形象逼真，妙趣横生。

把这样的狮子带到雅帕护瓦来奉献的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呢？我不住地联想，是逃脱厄运，移居到遥远的锡兰的中国人呢，还是到这里访问佛迹的中国巡礼者呢？听说六世纪初中国的求法僧法显曾在阿努拉达普拉滞留过两年。我的头脑中也浮现过这样的想象，或者也许是收集异国珍宝的雅帕护瓦的贵族或大商人们的收藏品吧。

此外，还有福建省一带的窑口烧制的白瓷片和宋三彩的满绿釉的长罐等。

这些陶瓷都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东西，和上述中国古钱的年代一致。从德地卡玛到雅帕护瓦的古迹巡礼使我了解到，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中国陶瓷被运进锡兰，并从海港运往内地的高原地带。而且从和瓷片一起出土的还有许多中国钱这一点来考虑，这些中国货币可能是当作财富贮藏起来的。这是生动具体地说明当时中国贸易状况的最好的证据。这种状况在延续着。

十五世纪初，中国明代大海军七次进出印度洋，即所谓郑和下西洋之际，锡兰一直是重要的中途停泊港。这里也曾一度成为战场。包括陶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曾被大量地运到这里。在科伦坡博物馆的一间展室里集中陈列着的十五世纪以后的青

瓷和青花瓷很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东西，不过还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调查。

在斯里兰卡，我们感到所寻求的东西还在各处潜藏着。比如，摆在科伦坡博物馆的近似越窑瓷器式样的东西，如果查清它的出土地点也是很有意义的。让我们同斯里兰卡人一起探索这些历史宝藏吧！

九　东南亚的中国陶瓷

——以菲律宾的新发现为中心

在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

菲律宾群岛和缅甸、泰国、马来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各岛同样，都有中国陶瓷，泰国陶瓷和越南陶瓷的发现。这是我根据战前哈佛大学的扬塞博士对这个岛上中世纪墓葬的调查报告*和战后菲律宾国立博物馆的法克斯博士对马尼拉南方加拉他干半岛海岸地带墓地的发掘报告**知道的，但真正看到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实物之后，其丰富程度，使我吃惊，那是在1967年8月访问阿拿巴的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时的事。

当时，密执安大学正召开第七次国际东洋

* O.R.T. Jansé: An Expedition toIndo-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 J. A. S., Vol Ⅵ, 1941. O. R. T. Jansé: Note on Chinese Influenc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Pre-Spanish Times. H. J. A. S., VolⅧ 1944—1945.

** R. B. Fox: The Calatagan Excavations. Philippines Studies. Vol7, No.3, 1959.

学者会议，我受到华盛顿富利尔美术馆馆长约翰·波普氏的邀请来到了这个博物馆。我刚一进入馆门，一眼就看见了装饰在入口大厅的漂亮的元、明时代的青瓷和青花瓷器。

许多相当大的罐和碗、盘之类的器物，随便地装在几个柜子里。其中也有优美的彩绘瓷器和色泽鲜艳的瓷器。也有用有力的线条画的双龙纹大型青花四耳罐，盖着盖子排列在那里。这些青花上的画，画风明快，在我国是见不到的，颇有些异国情调。这是什么地方出土的呢？说明书上写着是菲律宾群岛的苏禄群岛和宿务岛，或者是棉兰老岛的出土物。密执安大学从1920年起，就在菲律宾群岛开始了考古学调查和陶瓷器的搜集。这些收集品真使我留连忘返。

次日，我又去了这个博物馆，在该馆的四楼参观了阿卡·奥古鲁（Kamel Aga-Oglu）教授的研究室，这就更使我吃惊了。研究室不用说，隔壁收藏室的桌上和柜里摆满了元、明到清代的青花和青瓷、白瓷、黑瓷、五彩等器皿。和宋、元、明时代的中国陶瓷在一起，还夹杂着不少泰国的索可泰窑和宋加禄窑的瓷器，还有越南的白瓷和五彩。

中国青花类的花纹有花鸟、鸟兽、龙、花草、缠枝花以及几何纹样等，和我们在日本见到的早期青花的花纹、图案风格不同。总之，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日本没有见过的花纹。青瓷也和我国收藏家喜爱的种类不同，白瓷也和日本常见的景德镇生产的瓷胎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没见过的种类呢？我一面怀疑，一面在寻求答案。奥古尔教授告诉我：“愿意照哪件就可以照哪件。”我怀着寻求答案的心情，拿起相机把那些主要的陶瓷全都拍照下来。

在这次学会期间，波普氏通知我，明年1968年，在马尼拉召开东洋陶瓷研究会议（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研究非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国发现的各种中国陶瓷，并邀请我出席。

吕宋岛的中国陶瓷

1968年3月19日，我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洋陶瓷研究会议。在吕宋岛的酷暑烈日下，我们乘坐的成队的汽车开往马尼拉东南宽阔的拉姑那湖西侧，再往南走八十多公里，经过桑打·库鲁兹镇，就进入了卑拿姑巴亚南（Pinag bayanan）县的比拉（Pila）村。村中各处都在发掘中世纪的墓地，暴晒在烈日之下。在马尼拉有名的建筑家罗库信氏的指导下，由塔那杂斯先生负责的发掘地区，正井井有条地进行调查。可是这个村的农民也在自己的院中胡乱发掘，因此到处是坑，其情况颇为严重。

仅一小块地区就有一百座以上的中世纪墓葬。在人骨的头部旁边有出土的菲律宾制的陶器，在脚下有陪葬的十一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宋、元、明初）的中国陶瓷，有的还有泰国、越南的陶瓷。这些都不只是一件，有大罐、小罐、碟子、碗等成套的随葬品，至少是五、六件。其中的中国陶瓷也是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青花瓷等多种多样（图版二三）。

仅在这个卑拿姑巴亚南村，就有不少象这样陪葬中国陶瓷的墓地，现在已知的合计起来就有8.5公顷。广阔的地域，埋藏着大量的中国陶瓷。当时，关于罗库信财团发掘的古墓和陶瓷，曾用《Rosa C·P·Tanazas: A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ocsin-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Excavations in Pila,

Laguna (Manila, 1968) 》的题目出版了报告书。

象这样的墓地不只这一处。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各岛的海岸地带发现了一百处以上的遗址。在马尼拉市内建筑圣阿拿教会时，曾从202座墓中出土了1,513件十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之间的中国陶瓷，一起出土的还有越南陶瓷、泰国陶瓷以及其它所谓的黑褐釉的炻器等。

据前曾调查吕宋岛西南部的加拉他干半岛各遗址的菲律宾国立博物馆法克斯的报告，在加拉他干半岛从505座墓葬中得到了十四、十五世纪（元末明初）的中国陶瓷411件、泰国陶瓷96件、越南陶瓷9件，所属不明的4件，共计外国陶瓷520件*。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菲律宾群岛发现的中国陶瓷，收藏在菲律宾的国立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和菲律宾大学等处。最近，马科斯总统夫人以及政界要人、富豪等也开始争相收藏。前述的建筑家罗库信一人就搜集有7,000件以上，他的住宅的地下室成了富丽的美术馆。最近出版的巨册《Leandro & Cecilia Locsin: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1968)》就是他研究自己藏品的结果。其他著名收藏家还有散透斯(Arturo de Santos)、伊利萨尔德(Manuel Elizalde)、阿巴亚 (Consuelo Abaya) 、累德斯玛 (Carmen Ledesma)、阿的斯 (J·A·Addis) 诸氏(图版二四：下)。

搜集的中国陶瓷从九世纪的越窑、越窑系的陶瓷开始，还包括青瓷、青白瓷、白瓷、青花瓷、五彩等，时代一直到十六、十七世纪。其中有在日本见不到的福建窑烧制的白瓷，上面有黑褐釉斑或铜着色的红斑的小罐。是不是可以称之为“铁釉黑

* 三上次男：《菲律宾的加拉他干遗址和元末明初的中国陶瓷》，金关丈夫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日本民族和南方文化》所收。

褐斑白瓷”、“铜釉辰砂斑白瓷”呢？其中还有瓢形小瓶，确实惹人喜爱。

现在如果把各个藏家的藏品汇集一起，马上就会达到四、五万件以上。当你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一定会惊叹不已。以这些收藏品为基础，英国驻马尼拉大使艾惕思（J·A·Addis）进行了种种出土陶瓷的研究。我正高兴地期待着他的集大成的成果。

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的搜集品

这样集中地发现中国陶瓷也不只是一个菲律宾，紧接着东南面的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诸岛也是同样。

我访问了北婆罗洲的沙捞越首都古晋的国立博物馆，看到了从沙捞越河河口各遗址和考古学上有名的尼雅洞窟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还有越南、泰国的陶片，满满地堆积在宽阔的办公楼的二楼，毛尔夫人（Mrs. Eine Moore）等正在那里热心地整理着。这里也同样是从九、十世纪的越窑青瓷，到十一世纪以后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以及十四世纪以后的青花瓷等堆积如山。其中只有一件和菲律宾相同的“铁釉黑斑白瓷”小罐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遗憾的是遗址的性质好象不如菲律宾那样明确。颇为有趣的是在本馆的一间屋里陈列着各个种类的中国陶瓷，同时还用模型表示了古墓中中国陶瓷的现场情况（图版二四：上）。

略有些奇怪的是，在中国人的墓葬中，遗骸的手脚下面都垫着青花的盘子。此地发掘出来的中国青花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从这样的墓葬中取出来的。还有婆罗洲土著住的达雅克人的某部族的墓葬，用巨木作为标志立在墓地中（柱

葬），在这巨木四周镶满了陶瓷碗作为装饰（参见“东非的中世纪社会与中国陶瓷”第一节，图版八）。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饭碗也有了特殊用处。

关于沙捞越出土的中国陶瓷曾有各种报告书，但古晋博物馆的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则是必读之书。

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现了大量的中国、泰国和越南的陶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已被带出国外的也不少。在日本也从昭和十年（1935）前后开始由冈野繁藏、山尾薰明二氏收集了从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南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各岛出土的中国、泰国、越南和日本的陶瓷器。昭和十五年（1940），仅在东京的展览会上展出的冈野氏的搜集品就有几千件*，这简直使我们大吃一惊。

当时见到的中国陶瓷除青瓷、白瓷、青白瓷或青花、五彩等一般品种之外，还有唐三彩的罐，不过这是否真正是印度尼西亚的出土物，我当时曾怀疑过。

现在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中国陶瓷和泰国、越南的陶瓷都集中在雅加达国立博物馆，还有一些已成为个人的收藏品。然而这里也是不能对准确的出土地点和出土情况提供更多的线索，不能知道得比北婆罗洲更详细。雅加达国立博物馆的藏品是以德·富利内斯氏（E·W·Van Orsoy de Flines）的几千件搜集品为主，其中除了唐末以后的中国陶瓷之外，还有二世纪（东汉）至八世纪（唐）的陶瓷也陈列在那里。虽然在陈列目录** 上写着爪哇出土、苏门答腊出土，但我对这个出土地仍有

* 冈野繁藏夭所编《兰领东印度诸岛遗存陶瓷工艺品图谱》，昭和十五年，伊藤忠太、镰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宝云舍，昭和十二年。

** E.W.van Orsoy de Flines: Gids voor de Keramische Verzame ling.Batavja 1949.

些怀疑。果真如此，那就会对古代东亚的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提出一个重大的新问题。

马来半岛出土的中国、泰国、越南陶瓷，目前都集中在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旧拉夫尔兹博物馆）。

对历史、文化的贡献

如上所述，最近在东南亚各岛发现了很多的中国和泰国、越南或柬埔寨的陶瓷，其中中国陶瓷和过去在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等地收集的东西相比较，其瓷胎、造型和彩绘多有不同，有很多过去未曾见过的种类，而且数量很大。

尽管这些瓷器和实际生活关系密切，但由于收藏家过去轻视民窑，而这些又都是出口品，所以没有列入陶瓷名品的研究范围之内，而实际上这些陶瓷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因此，为了搞清中国陶瓷史上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于是，以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菲律宾发现的九世纪以来极其丰富的中国民窑陶瓷作为研究资料，研究东洋陶瓷的马尼拉会议（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在1968年春召开了。

当时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的实际情况。（二）中国陶瓷贸易的起源。（三）宋、元、明初外销陶瓷的特征和最多的种类。（四）从唐到清之间中国南部窑场及其制品。（五）这个地区发现的炻器的性质及其产地和时代。（六）青花的起源和发展。（七）越南陶瓷和泰国陶瓷的性质。（八）世界各地发现的中国外销陶瓷在陶瓷史上应有的地位等各种问题。

会上，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由于这几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范围宽、涉及面广的大问题，所以，对于所有的问题都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过去认为中国的外

销陶瓷中的大多数是浙江省的龙泉窑青瓷、江西省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的想法却有了大的改变，弄清了在东南亚出土的陶瓷大半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的窑口烧制的。同时，青花的起源也不一定要简单地说成是景德镇开始烧制的，应该更多地重视福建、广东两省窑口的制品，我们可以清楚地证明。而且，中国陶瓷的出口早在中世纪就遍及亚洲和东非，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不管怎样，从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爪哇、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各地发现的数目巨大的中国陶瓷，说明了中国窑业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情况，同时还显示出陶瓷贸易的历史情况和陶瓷器对外国的影响。中国陶瓷的研究已经脱离了过去名品欣赏的范围，终于过渡到美术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阶段，并进一步登上了世界贸易史的"研究舞台"，这样说也不算过分吧！广义地说，这便是陶瓷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我认为：我们今后仍要经常关心从东南亚各地发现的中国陶瓷、泰国陶瓷和越南陶瓷，以利于我们的研究。

十 陶瓷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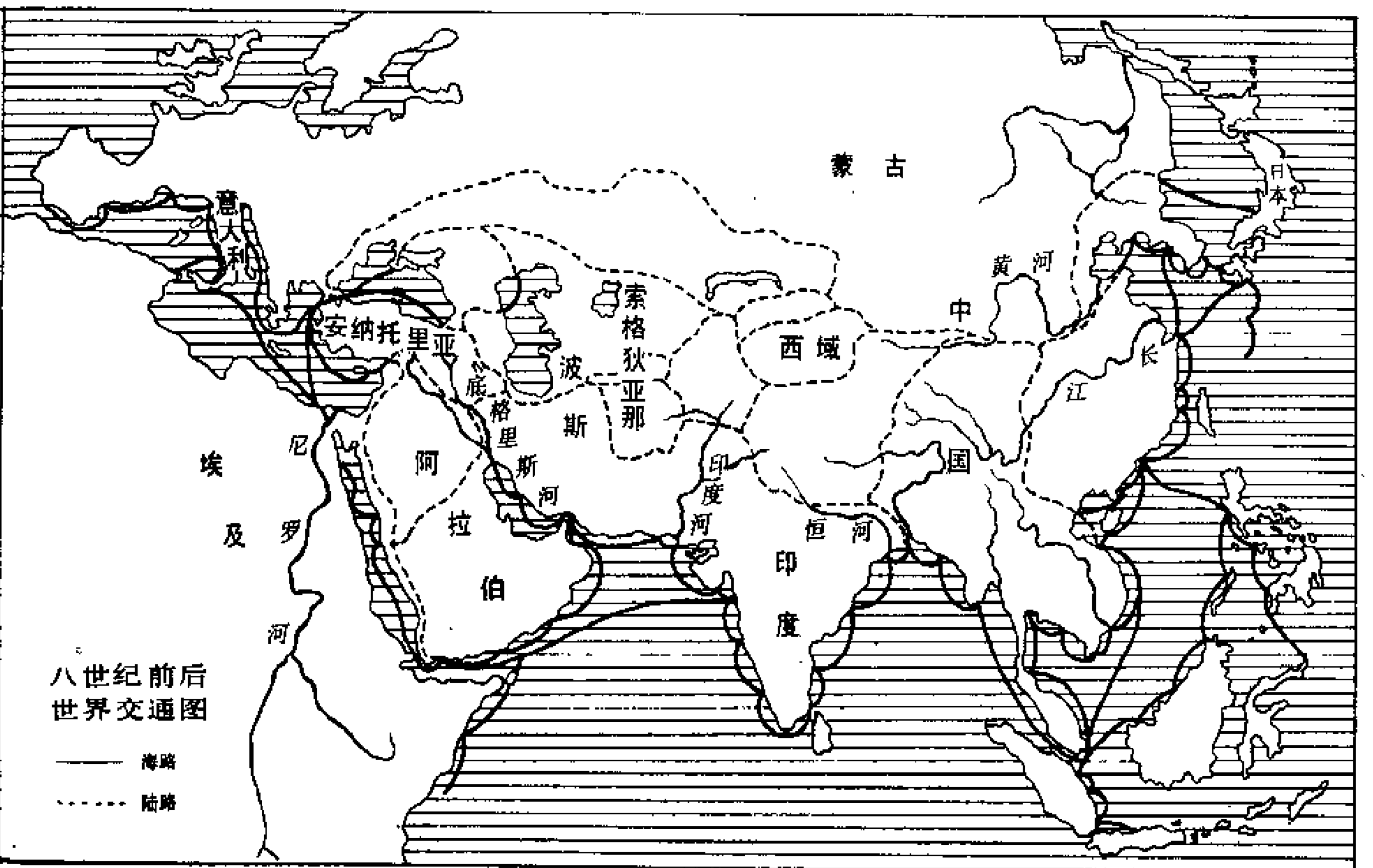
——中世纪东西贸易的象征

瓷片就象是一片片神奇的甲片，静静地沉睡在中东荒凉的城镇遗址和古窑址的各处。当我看到它那不加修饰的、可爱的身姿，便不由得伸出手去把它拾了起来。于是它内在的美便化作歌声轻扬，而藏在它身上的历史就涌现在我的眼前。

中国陶瓷的残片中，既有用柔和平滑的白色表釉覆盖着的白瓷，也有白里透青、淡雅的青白瓷。有时也能看到在朴素的黄青色的器壁上有着奔放的线刻花纹的越窑瓷。还有仿佛凝聚着蓝天之色的青瓷，以及给人以奔放、粗犷之感的黑褐釉瓷。此外，还有在洁白透光的瓷胎上绘着对比鲜明的钴蓝色图案的青花瓷以及稀有的用五彩缤纷的绘画装饰的五彩瓷器等。

伊斯兰陶瓷的残片，那真是千姿百态，构图丰满，色彩鲜艳。看起来，真好像是弄翻了百宝箱。

而且，它们都是些残片，没有完整器物那种使人难以接近的傲气，却有着随便能到任何


蒙古
日本
黄河
中
长
江
国
西域
索格狄亚那
波
斯
底格里斯河
印度河
恒河
印度
阿拉伯
安纳托里亚
意大利
埃及
尼罗河
海路
陆路

八世纪前后世界交通图

人手中的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从这亲切感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残片所特有的价值和美。因此，拣起的陶瓷片，只要我们和它一搭话，它就立即主动地把它的本来面目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我，这正是我所要寻求的，也是在完整器皿中绝对看不到的十分广阔的有待于探索的世界。夸张一点说，就好象和接触到面部残缺的唐招提寺木雕佛像、希腊雕刻的断臂胸像有相同之感。我之所以被陶瓷残片吸引，也就是因为有这种乐趣的缘故吧。

我对陶瓷残片抱有兴趣，起初还并不是追求这种乐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事古代、中世纪城镇遗址的调查时，是为了搜集考古学的资料而开始搜集陶瓷片的。至于发现陶瓷的美，那是在接触它的过程中对它有了感情之后的事。由于经常以它为资料确定遗址的年代，搞清陶瓷器的性质以及窑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接触中对中国陶瓷片产生了感情。

随着和中国陶瓷片接触的不断深入，使我认识到这个可爱的存在还有需要探索和衡量的更为广阔的一面，那就是从中国以外的遗址中所发现的中国陶瓷最能显示中国陶瓷的全貌。

一般说来，中国陶瓷从很近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各国开始，一直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岛，被广泛并且大量地发现。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更远的地方，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就不必说了，在此以西的西亚全区也都有发现。不仅如此，非洲的东海岸各处都出土了中国陶瓷。埃及首都开罗附近出土的中世纪中国陶瓷不仅数量多得惊人，它的质量也使世界上的陶瓷研究者们震惊。这不得不使人深思：中国陶瓷是怎样运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的呢？到目前为止，只是没有听说过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以前的遗址里出土过中国陶瓷。可是，如果在西

西里岛和西班牙查找，恐怕也会有的吧？从这些出土地点找到的不仅仅是中国陶瓷，而且还有泰国陶瓷、越南陶瓷。

这些在外国发现的中国陶瓷，当然是通过贸易运去的。虽然其中有的也许是由中国政府送给外国国王、贵族的礼物，但那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如此，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贸易的形式。

如果我们追溯这些中国陶瓷的踪迹，就可能查明中国和亚洲各地区以及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状况吧（且不考虑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这就是所谓东西交往的重要一面。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陶瓷给进口各国带来的工艺技术上的刺激或美术上的影响。这就和所谓东西文化交流问题有关。

提起东西交往、东西文化交流，这种说法是十九世纪末欧洲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日本是后进国，所以日本的学者们也附和着。这些说法虽然在表面上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却很空洞。

由于这些说法是欧洲人首先提出的，于是往往以“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或“西方文明东渐的未来”的形式出现。当然这是由于近代东西方力量的对比西方占优势，文化方面也是西方流向东方带来的影响所致。

然而，文化交流的主流果真总是“从西往东”吗？当然不是。尽管时代不同，交流的重心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两大地区的文化、物资的交流绝不会是单方面的，而是互通有无的。这样就形成了世界各个时代的特征。从古代到中世纪的中国丝绸贸易、中世纪以后的陶瓷贸易等，正是表明文化由东向西流传的很恰当的例子吧。

中西交往的中心一环是贸易。但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

须研究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贸易的实际情况，以及各个国家由于贸易的结果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和影响的程度。近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也都是采取这种研究方法进行的，所以也并不算什么稀奇。

但是在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交往和贸易时，这种基本方法反而不被重视，往往只是停留在贸易路线、贸易品种以及贸易方法的探讨上面。当然，贸易路线和贸易品种的研究也是探讨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仅仅研究这些还不能搞清楚贸易问题的历史意义，所以，在重新审定历史时不大起作用。古代和中世纪东西贸易的研究，往往被人们看成是为把各个地域或时代打扮得更为华丽的一种装饰品，恐怕就是由于这种缘故吧！

当然这与研究者对历史的看法和侧重点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从同情他们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由于没有足够的适当的史料，所以他们也就只能研究到这种程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考古学资料的应用。当然资料在质和量上都没有足够的发现，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比如说，中国丝绸尽管如何有名，但如果遗物极少，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这一点上，陶瓷器却有它的优越性，即使坏了也不会腐烂，它可以一直存留在遗址中，因而成为一种很难得的资料。然而即便是这样的陶瓷器，如果发现的数量很少而又不能全面地鉴定它的性质时，它的价值也就相对降低了。

在前面的各章中，我叙述过在印度和锡兰以西、东非以东的范围内的七十处以上的遗址中发现了从八、九世纪的唐代后期

一直到十四、十五世纪的元代、明初的中国陶瓷。但除了埃及的福斯塔特之外，出土的中国瓷片数量都不太多。

对这种情况又该怎么看呢？实际上陶瓷片数量即使不多，我们也可以从这些遗址的分布和陶瓷片的种类等方面了解中国出口陶瓷的市场范围与状况、出口陶瓷的种类以及贸易的年代等。然而，要弄清对输入国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只从单个遗址中了解是困难的。但总括起来观察，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接近基本研究目标的，当然，这是很不充分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第一章提到的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瓷片，在量和质上都很能说明问题，它们能够提供考虑基本问题的材料。

譬如，从八、九世纪开始到十五、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为什么把如此大量的优质瓷只供应给埃及呢？并且这些陶瓷又是怎样被使用的，它们对埃及文化又有什么影响呢？出土的陶瓷片对这些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提供有效的答案。

现在，从福斯塔特陶瓷片能够解答的问题中随便举几个例子。首先是一个中国国内的问题，即从唐末经过宋、元直到明代这个期间，中国陶瓷的生产量是怎样增加的，陶瓷的生产技术是怎么提高的，或者当时中国经济和贸易情况如何？出土的陶瓷片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答案。并且，这些陶瓷片还可以使我们推测出这些中国陶瓷能够运到遥远的南亚、西亚，甚至更远的东非，所采取的运输手段的进步与发达程度，以及能够参与上述贸易活动的中国、印度、萨拉森帝国等各国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周转状况。这些同连接中国和西亚、东非的海上贸易问题是有直接关联的。

最后，还能够对进口国埃及的接受情况如何，为什么埃

及能大量购买这种珍贵而高价的陶瓷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解答。

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章提到福斯塔特出土的元青花在量和质上都很突出时，曾简单地写到："甚至在中国都是很昂贵的元青花，运到相当遥远的埃及来，如今留下这么多的碎片，在这个遗址中发现。这是否在说明，或是当时开罗市民很有钱，或是他们过于珍视，或是他们喜爱中国东西，或是中国陶瓷的使用价值很高等等。是由于其中的某种原因吗？不！能发生这种出奇的事，一定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的综合。”上述看法只是针对进口中国陶瓷总体来讲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调查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瓷片时，在附近进行遗址发掘的美国研究中心的斯堪隆氏曾对我说过：中国陶瓷不只是从有限的少数房屋中出土，而是几乎所有房屋中都有出土。所以，在福斯塔特中国陶瓷一定是在相当多的家庭里普遍地使用着。并且从发掘队采集的碎片来看，优质的陶瓷是很多的。

总之，当时开罗的富足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所想象的高得多。由此可知，出现在《天方夜谭》故事里的开罗的繁荣富裕景象绝不是无稽之谈。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从八至九世纪开始，到十五、十六世纪，接连不断地进口了不同品种的中国陶瓷。只要新品种的中国陶瓷一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埃及马上就有它的仿制品出现。进口唐三彩后，马上就出现了所谓埃及三彩（多彩彩陶）。白瓷的仿制品有白釉陶器，越窑瓷的仿制品有黄褐釉陶器，青白瓷的仿制品有青白釉陶器，青瓷的仿制品有青釉陶器，青花瓷的仿制品有白地蓝彩彩

绘陶器等。青釉陶器以及白地蓝彩彩绘陶器等，如果只看照片，几乎和真的中国青瓷和青花瓷难以区分。而且，仿制品的数量的确也相当大。

中国陶瓷之所以被重视，当然是因为它确实是优质品，并且相当珍贵。至于数量巨大的仿制品的产生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喜好，受到普遍的欢迎，这完全说明在当时的埃及兴起了中国热，中国式样在埃及盛行。

这种热潮绝不只是在埃及，在波斯也是同样。波斯在八至九世纪左右，从中国输入了唐三彩、邢州白瓷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华丽的所谓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和白釉蓝彩陶器。只是基本采用了中国陶瓷的样式，而不是原样照搬，各个种类都加进了波斯的风格，这是由于波斯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的缘故。

从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大量进口了以精美的宋代青瓷为中心的中国陶瓷，波斯陶器的面貌也为之一新。把以前的陶器（初期波斯陶器）那种华丽的色彩和天马行空式花纹的风趣丢在一边，代替它的是单一颜色，成了青一色的世界了。器形也有不少是中国式的。茶碗、碟子、碗之类甚至出现了与中国陶瓷难以区分的仿制品。这些说明，受到了中国青瓷的决定性影响。

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影响，此后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波斯陶器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影响。如：波斯的米奈伊样式陶器（色彩彩绘陶器）对中国五彩瓷器的影响，波斯的白釉蓝彩陶器和中国的青花瓷、波斯的拉斯他（样式）陶器（铜釉彩绘陶器）和中国的釉里红的关系等，都可认为基本上是从西向东的技术传播。

总之，如果说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影响有如此之深，那么也可以说明在波斯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也兴起过中国热。在叙利亚也是同样。由此可见，陶瓷器方面的中国风格的流行，是波及整个中东地区的。

海上贸易

在这里，谁都会想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量的陶瓷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运到那遥远的中东地区去的？

众所周知，连结东亚和西亚、地中海世界的贸易通路一般称为丝路。它指的是从中国经过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翻山越岭到达波斯，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路。十九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带有一些浪漫的情调，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有“丝绸之路”才是古代、中世纪东西贸易的主要渠道。而实际上这条路被频繁使用的时间是到八、九世纪为止，自从八、九世纪之后，海上交通路成了东西贸易的主要路线。这正是从中国陶瓷出口贸易飞速发展的唐末开始的。

那么，连结东西世界的海上贸易路线是从八、九世纪才形成、开辟的吗？绝不是的！早在纪元一世纪前后就已经较多地使用海路了。根据明确的记载，西方世界在一世纪前后就已开始利用印度洋（厄利特利亚海）的季风开辟了从埃及通往印度的海路（《厄利特利亚海导游记》）。于是，在印度便出现了几个罗马人的居留地，罗马人把收集到居留地的商品运往罗马。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阿里卡美都遗址就是其中的一个居留地，当时好象被称为波都开（请参阅第八章）。

另一方面，在东部海上，从纪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之

间，又开辟了由中国东南部海港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到达印度东海岸黄支国(Kanchi现在的Conjereram）的海上贸易路（《前汉书·地理志》）。从东亚和中东地区两方面出发的海路，在印度衔接起来了。

由于这种关系，罗马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东亚。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上的奥克·埃吾（Oc-éo）遗址是公元二世纪至七世纪之间的港口城镇的旧址。从这里发现了金制品，可能是二世纪中期罗马皇帝安敦尼·皮由斯的金币，同时还发现了罗马玻璃的碎片。另外，在广州市郊区的横枝冈的汉墓中也发现了罗马制的玻璃碗和其他物品。1968年春，我亲眼看到了从菲律宾的民都洛岛出土的菲尼基（古代叙利亚）玻璃风格的小长瓶和蓝色的罗马玻璃碗（桑德斯氏收藏品）*。

公元166年(后汉桓帝延熹九年），自称罗马皇帝马克·阿留斯·安敦尼（大秦王安敦）的使者到达中国，进贡了象牙、犀角、玳瑁，这是有名的史实，它说明东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既然已经开辟了海路，自然中国商品也就运到了西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陈列着中国汉代制造的绿釉陶器和黑釉陶器，说明写着是从爪哇和苏门答腊出土的。实际上这些物品是不是从印度尼西亚各岛上发现的，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但是，既然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开辟了中国到印度之间的航路，那么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出土了二世纪左右的中国陶器也就不足为怪了。

---

* 三上：《西亚细亚的工艺和日本》，东洋美术，第六卷，工艺，朝日新闻社。

在泰国曼谷国立博物馆里陈列的当地出土的中国战国至汉代的玉制带钩和汉代紫色琉璃珠等，也可以作为上述事实的旁证吧。把这些出土品看成是汉代通过海路带到此地的，也不会有什么错误。

文献土的记载和考古学土的资料均表明：早在公元前后开始，海土通路就被频繁地使用着，它同丝绸之路一样，早就成为重要的贸易通路了。

后来，随着中国和西域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复杂化，给丝绸之路的通行带来了种种困难。这样，海土交通道路的重要性便逐渐增加。有许多事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只是来不及在这里详述了。

七世纪西方世界成立了萨拉森帝国，贸易开始兴盛，海路的重要性也增加了。萨拉森帝国的商人为了得到财富和商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九世纪后半期黄巢起义时，在南海出人口的广州就居住着超过十万人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波斯人和犹太人，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海运通航的盛况。

逐渐增长的对海上贸易的大量需求，在九至十世纪左右迸发了出来。从阿拉伯、印度方面，一只又一只的大船开进了广州、泉州、明州（浙江省宁波）、杭州等地，购得货物之后又西行归国，中国方面的巨船也驶向南海大洋。

海上贸易的兴起和当时航海术、造船术的进步有着密切关系。到了十一、十二世纪，中国已经能够造出可以运载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船，并将罗盘运用到航海方面了。

这样的史实是写不完的。总之，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得沉重易损的陶瓷器的出口变得比过去更加容易了。当然，这方面的史料也不少，但在这里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以上种种史实完全可以说明，九至十世纪以后通过陆上交通路线把若干中国陶瓷运往西方，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的主要还是依靠海上交通，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而向中东内陆地带的城镇运送陶瓷的中转站，可以考虑是近处的海港，这不仅是陶瓷，从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以及其他商品也一定是经过同样的途径运去的。

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贸易往来，成了打破中世纪各地区的孤立主义和给各地区带来了时代共同性的重要因素，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陶瓷就是这一事实的象征之一。

总之，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我想还是把这条海上的通路姑且称作“陶瓷之路”吧！

后 记

1964年，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蓑丰诸氏和我共同进行了开罗郊外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陶瓷调查。作为参加这项工作的规定份额，阿联政府送给我们176片该遗址出土的陶瓷片，在五年之后的今年夏天终于运到东京出光美术馆。

为调查埃及出土的中国陶瓷，我和松见守道、铃木八司、上野佳也、重松和男、杉村栋诸氏于1966年又一同去过一次埃及。现在重新把从遥远的埃及寄来的中世纪中国和埃及的陶瓷片摆在面前仔细端详，不由得想起了调查时遇到的种种往事，以及围绕着陶瓷而产生的种种人类历史的关系，顿时涌上心头，使我感慨万分。

引起我对于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和考古的极大兴趣和关心的，那还是早在四十多年前在旧制高等学校时开始的，在大学时代便决定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以后由于情况的变化，东北亚的古代、中世纪史成了我的专门研究课题之后，我的注意力就放到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广义的“相互接触”的历史，即所谓东西交往的问题上了。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陶瓷器。我想通过对陶瓷贸易以及陶瓷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试图查清东西交往的实况。

战后由于失去了中国大陆上的工作机会，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了解、研究运到中东地区的中国陶

瓷的实际情况。当时，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对西亚陶器不太精通。于是不得已而转入对伊斯兰陶器（所谓波斯陶器）的学习。在学习中发生了兴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速度都比较缓慢，在搞出了一些眉目之后，有人劝我写这本书。其实尚未搞清楚的问题还很多，所以说这本书也只能说是研究路程上的第一站。

东西贸易的问题，从世界史的主流来看也是很重要的，并且也是使人深感兴趣的课题。我想年富力强的研究者们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下一番功夫，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成果的。

和本题有关，还要请教各位读者，您如能把所知道的中国陶瓷在东亚、西亚的新出土地和情况告诉我，我当感到万分荣幸。

我本想着重写第十章“陶瓷之路”，可是由于前面写得过长，又受到篇幅和交稿时间的限制，已经力所不及，深感遗憾。另外，这是我第一次写作科学普及读物，文章不够通俗，也很抱歉。书中的照片，多是我自己拍摄的，有些有纪念意义的也放进去了。书中也采用了其他著录中发表的材料，一并在此致谢。为了说明问题，照片应当是越多越好，但由于这是科学普及读物，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对数年来耐心等待并时常激励我的岩波书店的高草茂氏表示感谢。

三上次男

1969年7月于北镰仓松冈不咸山室

附　　记

本书刊行之后，得到了多方面的诚恳指导。这里首先据水野清一氏的意见追加下列几处出土中世纪中国陶瓷的遗址。

伊朗——霍尔木兹岛及其对岸的米纳布古城遗址以及米纳布的卡累·萨拉旺等三处，出土了元代、明代的青瓷、青花瓷、白瓷、青白瓷、五彩、琉璃釉瓷等陶瓷片（吉田光邦、小山喜平：《西亚细亚的技术》京都大学，1966年，293—315页）。

阿富汗——巴尔库附近的德贝·扎尔卡朗出土了元代的青花瓷（大盘底的一部分）和青白瓷（水野清一《海巴克和克什米尔=斯马斯特》京都大学，1962年，56页及135图的1、2）。

此外，从我的日记中又找到了两、三处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只得有待于增订时再追加了。

追　　记

当再版之际，请允许我们以父母的名义把此书作送给最疼爱的女儿泉。当此书问世的时候，感到最高兴、最自豪的是女儿泉。然而，此书出版后不久，女儿便象流星一样消逝了。如今她已在那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默念着我们吧！

次男　　登美子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

译者的话

三上次男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学者。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出光美术馆顾问、东洋陶瓷学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会长，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国内委员。三上先生早年致力于古代和中世纪亚洲史的研究，对波斯陶器和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先后发表过《金代女真族的研究》、《古代东北亚洲史研究》、《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原始古墓的研究》、《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日本的美术——陶器》、《波斯的陶器》、《波斯陶器图录》等著名著作。三上先生还多次访问我国，并进行学术交流；在我国陶瓷界有较大影响。

《陶瓷之路》是三上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陶瓷，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陶瓷之路》不仅是一部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和研究古外销瓷的重要著作，也是对研究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在中世纪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0年三上先生访华时参观历史博物馆，与阔别二十多年的学生李锡经同志重逢，并送了一本《陶瓷之路》；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李锡经同志很快地把它翻译出来。1981年9

月，李锡经同志去日本参加日本外销陶瓷研究会第二次年会，与三上先生谈及发表之事，得到了先生的同意；1982年2月我去日本时，又向先生提出希望能得到书中的照片，先生在百忙中把大量的照片加以复制寄给我；不幸的是在我归国时，李锡经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了。李锡经同志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横滨中华学校校长，1952年归国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委员、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对于考古发掘，特别是对古外销瓷有较深的研究，可惜现在只留下了翻译的草稿，悲痛之余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承蒙有关方面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提到的是三上先生最近一次访华时，不顾旅途的疲劳不厌其烦地一一赐教，使我受益非浅，也为先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所感动；蔡伯英同志为本书校订了译文，出版社的沈汇同志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协助，借出版之际一并感谢。

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望读者指正。

高喜美

一九八三年十月